

粟裕冤案平反的曲折历程

——访粟裕夫人楚青

● 徐庆全

粟裕将军一生功勋卓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样一位将军,本应受到历史和人民的敬重,但是由于受到党内“左”的思想的影响,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却把粟裕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和斗争(另一位元帅刘伯承也被冠以“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受到批判),并涉及到萧克等军队高级领导干部。

这场冤案之后,粟裕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为了推翻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实之词,1979年粟裕向党中央提出重新审视这场冤案的要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粟裕没有看到问题的解决,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作为粟裕战友和夫人的楚青,则继续为丈夫申诉。在粟裕逝世1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发表文章,为粟裕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所受到的错误批判公开、正式平反。

今年2月5日,是粟裕将军逝世20周年的纪念日。为缅怀他,纪念他,我采访了楚青同志,她详细地介绍了为粟裕平反而经历的曲折过程。

我替粟裕写检讨

1958年5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整风和整编两大问题。但是,在会议开始不久,就有人提出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指责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粟裕“一贯反对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接着,对粟裕进行了批判。批判会议是在国防部长的主

持下进行的。其后,会议参加的人数扩大了(从500人扩大到1500人),对粟裕的批判调子也越来越高,粟裕的所谓问题也搞到了军外。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粟裕表现出他一如既往的坚强性格和可贵的坚持原则的精神,他戴着“态度不老实”和严重政治帽子的危险,在高压之下仍然对一些原则问题的事实真相作了必要的说明。但是,当时的局面下,粟裕的说明是无济于事的。他只能检讨过关。

谈到那时的情形,楚青仍有心有余悸的感叹。她回忆说:

1958年开军委扩大会议批斗粟裕,开始我全然不知。有一天早晨,我正准备上班,粟裕突然从内室开门出来,面容憔悴,神情忧郁地低声对我说:“我出了事,你今天可不可以请个假帮我个忙?”我这才知道,他已经挨了批判,并被上纲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为了写一份能过关的检讨,他已经在内室自我封闭了7天了。他把一堆会议简报交给我,沉痛并无可奈何地说:“你看看这些,帮我写个检讨吧,我自己下不了手。只要能够通过,怎么写都可以。”

我看了这些材料,大吃一惊。我担心不违心检讨要被划归到敌我矛盾的行列,就不顾实际代他写了一份检讨,把强加给他的罪名统统兜下来了。粟裕用这份检讨在大会上作了检查,果然过了关。但是,他心中感到非常压抑。回家后,他冷冷地对我说:“还是你有办法,写出的检讨让我过了关!”我当然能看出他极为痛苦的情绪。以后,他多次因实在控制不住这种痛苦的情绪而责

备我：“你为什么把我写成这样！简直不成样子！”我当然也很痛苦：“不是你说怎么写都可以，只要能过关就行吗？”接下来，我们就默然不语，相对而泣。这样的场面我们经历了多次。

不过，尽管这场批判中，粟裕被戴上了帽子，但一些参加批判会议的人，在当时就对这场批判不理解。据《粟裕传》披露，叶剑英曾找总参的一位同志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并且说：“我看粟裕最多是个骄傲问题吧！”不少人过去与粟裕浴血沙场，并肩战斗，许多事情是共同经历过的。虽然在“12级台风”下不得不加入“批粟”的行列，说一些违心话，但仍有人在发言中对粟裕的革命贡献、个人品德及在总参的作为，作出了一定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毛泽东也在关注着粟裕。军委扩大会议开始以后，有一次毛泽东找肖劲光谈话，问他对粟裕的看法。肖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点头表示赞同。在粟裕第二次大会检讨之前，毛泽东这样评价粟裕：“粟裕

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毛泽东的话，实际上是保了粟裕。粟裕第二次检讨后，领会了毛泽东意思的陈毅即走上前，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带头鼓掌表示通过。第二天，陈毅又在大会上说：“昨天他的检讨，我觉得很好……我个人表示欢迎。过去他在三野军事上的贡献是很大的，这是不能抹杀的，战场指挥搞得好的，主要是打胜仗的……他转了就很好，欢迎他这个态度。”

但是，这已无法扭转粟裕蒙受冤案的命运。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先在大会上批判，然后撤销职务，并把被批判者的“错误”传达到全党全军，但对受批判者又不作结论，不作决定，这样的做法开了党内斗争极端不正常的先例，也为以后粟裕的平反留下了障碍。

粟裕没能等到平反的这一天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得以恢复。劫后余生的粟裕，在1979年10月9日向党中央写出了申诉报告。他在澄清了强加给自己的种种“罪名”后说：

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我还看到一个中央文件上把我做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检讨等等，均已做为历史文件存档。二十多年来，它已成为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使我内心深为痛苦。但是，由于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中央对彭德怀同志的功过是非也已做出评价。我恳切恳求中央能对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使我在今后有限的余年



粟裕大将

终于能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更好地为革命贡献全部力量。

楚青说,粟裕写这份报告,是时任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提议的:

1979年8月,叶副主席邀请粟裕一起到烟台疗养。这期间,粟裕多次拜会叶副主席。有一天,粟裕与叶副主席单独谈话。回来后他兴奋地对我说:“叶副主席很关心我。他说:‘关于你1958年的问题,也该解决一下了。这件事我向小平同志说过,他也点了头。你给中央写个报告吧。’我当即表达了自己也迫切希望申诉的心情。”粟裕的兴奋是有理由的。在与叶副主席谈话之前,时任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同志,也曾当面指示粟裕,在适当的时候,在党的会议上,把1958年这件事说一下。现在叶副主席又郑重提议,粟裕和我当然很高兴。因此,回到北京后,粟裕就立刻写了这份报告,送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副主席”审阅。

粟裕的报告送上去后,叶剑英10月16日就作了批示。楚青至今对这份批示能倒背如流:

叶副主席批示说:前不久萧克同志看我时,也曾提到有关那次会议反教条主义的事。我认为五八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那次会议的错误,我建议总政组织力量,认真地研究,向军委提出实事求是的报告,以便在适当时候,妥善处理。

叶剑英将粟裕的这份报告批送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黄克诚、耿飚、韦国清、杨勇等人审阅。叶副主席办事非常细致,他指示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将批件送交粟裕看过。粟裕很激动,他要我将这份批件抄录一份。所以,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份批件,除了黄克诚、陈云同志因病未阅外,其他六位都画了圈。

尽管如此,但是,为粟裕平反的文件一直迟迟没有下文。根据楚青的叙述,其大致过程如下:

粟裕看到叶剑英的批件后,曾两次向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询问办理的情况,但未得到明确的答复。

1980年春节期间,粟裕看望了聂荣臻副主席,他汇报了自己向中央写了申诉报告和叶剑英已批示总政办理的情况,请聂荣臻为这件事说说话。聂荣臻即表态说:“这件事应该解决。那个时

候说话上纲都是很高的。但总政写的报告我还没有看到,等送到我这里,我会说话的。”稍后,粟裕又看望了徐向前元帅。徐向前也表示,这件事应该解决。3月初,粟裕又将给中央的申诉报告抄了两份,分别送给肖劲光和萧克。

叶剑英的批示已经5个多月了,仍没有音信。粟裕不免有些着急。3月10日,他再一次给陈云和叶剑英写信。在给陈云的信中,他说:“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我向中央写了这份书面申诉报告。我恳请您在不影响健康的情况下予以批示,促使我的冤案能早日得到解决,使我放下压在身上二十多年的沉重包袱,在有生之年能够心情舒畅地贡献出全部精力,为国防现代化作出微薄的贡献。”在给叶剑英的信中,粟裕写道:“听说您对我的报告作了批示,我非常感谢您老人家对我的一贯关怀。为了使我的问题能早日获得公正、合理的解决,我再次恳请您老人家能为我的问题再说一说话。”

叶剑英、陈云接到信后,向总政了解了一下情况。中办向粟裕转达说:据总政说,报告已写好,不久即可上报。

在南京的粟裕得知后,当即要求秘书向总政报告:“我要求总政在做出结论上报之前,将有关我的结论部分同我见面。”

6月12日,粟裕在上海见到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他向胡耀邦报告了自己申诉的问题。胡耀邦当即说:这件事要解决一下,要找个机会在中央的会议上议一下。

7月15日,因腰椎错位已入院的粟裕再次向总政了解情况。总政回答说:5月13日总政党委曾讨论一次,感到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涉及很多事和人,对会议本身如何评价应慎重,应由中央来作,对批评错了的同志应给予平反。当时就责成总政组织部和军纪委对批评错了的同志起草平反决定。现决定已草出,尚未讨论。讨论后上报前要送给粟裕同志看的。

到8月份,来自总政的消息说:总政党委讨论后认为,这件事涉及对军委扩大会议的评价问题,要等中央讨论后再定。

这一结果,使渴望看到平反决定的粟裕既大失所望又困惑不解。此后,平反的事也石沉大海。病中的粟裕已无力过问,而楚青为怕粟裕再受刺

激,也不敢再提此事。

楚青向中央申诉

1981年2月1日,粟裕脑溢血发作,此后又频繁发作脑血栓。楚青感到很痛苦。她知道,1958年对粟裕的错误批判,是粟裕心中永远的痛。她不忍心让粟裕背着沉重的包袱离开人世。为了不让粟裕受到刺激,她在反复思考后,决定自己出面替粟裕向党中央申诉。

1982年12月16日,我考虑再三,鼓起勇气给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陈丕显写了一封信。陈丕显同志曾长期和粟裕一道工作过,对粟裕比较了解。我在信中先追述了粟裕写信及中央有关领导对此事的意见。我说,我是相信中央、军委会为他作出公正的结论的,我也相信他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已足够为自己作出正确评价的。但是,作为亲人、同志,总是希望让他在尚能正常思维的有生之年,能够见到党的政策的落实;而实在不忍心让他终于背着沉重的包袱去见马克思。

楚青知道,为粟裕平反的事之所以搁浅,是因为总政认为会涉及到对1958年那次会议的总体评价问题。为此,楚青在信中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我要求考虑到他的病情实况,把他的问题同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全面评价分开处理,先行为他作出平反的决定,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对他的错误批判。我认为这是符合中央领导同志圈阅的,叶副主席1979年10月16日批示精神的。”

楚青并将一份“追记粟裕同志为1958年受批判向中央申诉的有关过程”的书面材料,一同报送陈丕显。

陈丕显收到材料后,附上一封信转给胡耀邦和杨尚昆。他在信中写道:“粟裕是自己的老领导,长期在一起工作,他对粟裕的政治品质和他几十年来为战争作出的贡献是了解的。希望中央能在粟裕尚能正常思维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胡耀邦考虑到自己对1958年那次会议的情况不了解,就将这份材料转给杨尚昆来处理。

以上情况,是陈丕显在电话中通知楚青的。陈并告诉楚青:“听尚昆同志的意思,似乎当时会议没有对粟裕同志个人形成文字结论,准备再看

一下材料,再研究一下,也许在适当的时候,由某位负责人同粟裕同志谈一下,说清楚中央对粟裕同志是了解的,像这类事情不存在了,已经过去了。楚青对此有自己的想法。她回忆说:

我向陈书记反映说:当时虽未做出文字结论,但会议文件,包括简报,那些诬陷不实的发言、粟裕同志违心的检讨等材料都已存入档案,军事科学院就有一套,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阅看,所以其流毒和影响至今还在扩散、传播。因此希望有个文字平反材料为好,要不然,在组织上同粟裕同志口头上说清楚时做个谈话记录,同原来的材料一并存档。丕显同志听了我的话,建议我直接同尚昆同志联系请示,希望能对这个问题早点有个结果。

按照陈丕显的指示,楚青在1983年2月2日有了向杨尚昆汇报请示的机会。她首先感谢杨对此事的关注,感谢他对粟裕的关心和信任,并请他理解粟裕痛苦的心情。杨尚昆说:“我同张爱萍、余秋里商量了一下,研究出一个方案,即宜粗不宜细,发一个文件,把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全部收回、销毁。收文件时可以派人去收。文件上可以写销毁也可以不写,待收回后再由办公会议作出决定销毁。另外,同粟裕同志谈一下,明确说这件事已经不存在了。要谈就是我去谈。”

楚青汇报说:“据我了解,粟裕本人没有设想过要逐项地甄别他的问题,这已是历史问题了,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但是我觉得如发文件收回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以注明‘撤销’‘销毁’为好,否则将弄不清楚。楚青并说:‘我这次申诉是背着粟裕的。因为现在他的病情已不可能由他自己催问或再申诉,而我对能否有结果也无把握,生怕如果得不到处理,将更使他受刺激。’

最后,杨尚昆告诉楚青:“你可以同粟裕同志说说。可以说你有这样的设想,也可以说是我的设想,听听他的意见,不算是最后定下来,他有什么意见我们还可以考虑。过了年我再找你来,你把他的意见告诉我,然后我来办。”

2月4日,楚青对粟裕说了自己给中央写信及与杨尚昆谈话的内容。粟裕冷静地说:“好!这件事了了,我也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了。”他要求楚青记录下他自己的意见,转陈杨尚昆:

一、衷心感谢您亲自主持来解决我的申诉,

衷心感谢中央、中央军委对我的关心。我因病不能前来当面致谢，要楚青替我向您表示谢意。

二、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一个历史问题，情况复杂，牵涉的人也不少，我完全同意按照宜粗不宜细的精神来处理。我也同意您的意见，不再就我个人的问题写文字的东西，而是把这次会议的问题一次解决掉。我相信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将大大有助于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光荣传统，并有利于肃清所谓“反教条主义”的流毒，加强我军的革命现代化建设。

三、对于起草文件有几点具体要求：

1、要求文件明确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不要使用“收回”字样。因为这次处理是政治上作出处理，如果使用“收回”，容易理解为是就文书档案作出的技术性处理，若干年后还会产生歧义。

2、撤销的范围，应包括文件、发言、简报、记录等全部会议材料，存放在个人那里的，由组织上收缴。

3、请求由中央军委办公厅派人负责收回全部文件、材料，并负责销毁。

1983年4月，粟裕的病情加重。4月30日，杨尚昆来医院看望他。看到粟裕被病痛折磨的样子，杨尚昆出来后对楚青说：‘粟裕同志病得这样痛苦，今天我就不对他讲那件事了，等他好些再谈吧。’

1984年2月5日下午，粟裕带着深深的遗憾告别了人世。

楚青继续申诉

粟裕离开人世，楚青一时陷入到悲痛之中。她知道，只有她才能继续为粟裕申诉了。

2月6日，正在上海的杨尚昆打来电话说：‘粟裕同志有个疙瘩，这件事我还没有给他办好。要在这次讣告中来解决。我同爱萍同志商量了。打算从正面讲，把一些流言蜚语，不实之词推倒。’

尽管杨尚昆有这样的愿望，而且在起草讣告的过程中，楚青坚持要加上1958年粟裕蒙冤的一节，但是在后来发布的讣告中，对于1958年的



1942年初，粟裕与夫人楚青在苏中

军委扩大会议仍未提到。

楚青对此很有意见，但也无可奈何。此后，她似乎觉得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楚青说：

在治丧期间，不少老同志要我向中央要求为粟裕同志平反，他们情真意切声泪俱下。我却难以表达自己的心情，也无法向他们陈述种种情况。郭化若同志为这件事几次来电话。他说：“中央说正面平反，无非是评价高一点。讣告是对外的讲不得反话。而平反是有反才平，只有承认原来撤销他总长的命令是错误的，至少是考虑不周，那才行。这个平反可以在内部传达。这次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没有机会了。建议您还是去找一下陈云同志。我是一个红军，是粟裕同志领导下的一个兵团干部，我随粟裕同志去的日子不远了，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建议。请把办的结果告我。”

肖劲光同志在粟裕同志去世的次日，就写下

了《悼念粟裕同志》一文。他在文章中正面提出了1958年的问题。当他将文章送给我征求意见时,我百感交集。肖公文中有这样一段话:“1958年所谓反教条主义时,他遇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与我谈话时,问我对粟裕的看法,我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同志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尽管这段话说得很温和,但我估计不一定能发表。后来果然报社提出要删去。肖公不同意。他们再次动员,说是中央精神,是上面让删去的。肖公就表示,文章我就这样写,删否由领导上决定。最后,发表时还是删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楚青决定,对1958年的问题不再提了,集中精力编辑粟裕的文集。但是,等到她看到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的“粟裕”条时,她又不得不再次为此事而苦恼。

粟裕和萧克在1958年都遭受到不公正批判,但是,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征求意见稿)中,在“萧克”条中写有“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批判而离职”,而在“粟裕”条中却一字没有提。楚青看到后,觉得很纳闷,为什么在“粟裕”条中不提?为此,她再一次求见杨尚昆,诉说自己心中的疑惑。楚青说:

1986年4月23日,杨副主席接见我。我说:大百科全书的条目中对萧克同志平了反,而对粟

裕同志却没有提,这岂不是要使粟裕同志蒙冤千古?我恳请杨副主席解决当前大百科全书条目中的问题,要求比照“萧克”条,在“粟裕”条中写上相应的内容。我向杨副主席反映了肖劲光同志《悼念粟裕同志》一文中被删节的情况。因为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编辑出版回忆粟裕的《一代名将》一书,胡耀邦同志题写了书名,其中收录了肖公的文章。我恳请杨副主席同意恢复被删节的那一段。杨副主席说:“大百科条目我找来看看。”“萧克”条写了,“粟裕”条也应该写。我看过后找他们研究个办法。肖公文章上的那一段,可以写上。肖公讲的,总不是假话嘛!

其后,经过了一番周折,1987年,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粟裕”条中终于写上了“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一句话。楚青感慨地对我说:“不了解情况的人难以想象,这淡淡的一句话也是多么来之不易啊!此后,我对粟裕蒙受的不白之冤能否得到真正的平反,已不抱任何幻想了。我把全部精力放在整理编辑《粟裕战争回忆录》和《粟裕军事文集》上,以此作为对他永恒的纪念,同时也平衡自己的心态。”

军委再次受理,粟裕的不白之冤终于平反



粟裕夫楚青和秘书鞠开(徐庆全摄)

转眼几年过去了,粟裕逝世10周年的日子来临了。粟裕的一些老部下对他所蒙受的不白之冤一直挂怀在心。1993年10月28日,粟裕的老部下、南京军区离休干部金冶、谭肇之、秦叔瑾、黄野松、黄亦凡5人联名给中央军委写下了《建议召开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座谈会的报告》。报告中说:

我们建议中央军委,通知南京军区(粟裕同志长期工作、战斗过的老单位、老地区)届时召开一

次“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粟裕生平事迹座谈会”，邀请原华东有关同志到会，并请中央军委一位领导同志出席讲话，和大家一起照一次相。……这次军委领导同志讲话中，能讲到粟裕同志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中虽受到了委屈，自己仍能正确对待。这就给他摘除了“个人主义错误”这顶沉重的帽子，消除了压在楚青同志（粟裕夫人）及其子女还有许多新四军和华东老战士心头的阴影。经过“粟裕同志纪念集”（纪念会或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文等）的发表，各种新闻媒介的传播，大家从军委领导同志讲话和纪念集出版的实际行动中，就会了解中央军委已用这样的办法，对粟裕同志的光辉一生作出了正确的评价，认真贯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倒了过去的不实之词，恢复了粟裕同志应有的荣誉。如果“纪念会”或“座谈会”都不方便召开，到粟裕同志逝世忌日（明年2月5日），请一位军委领导同志发表一篇纪念文章，以达到“平冤狱”、恢复名誉的目的，以慰革命先烈于九泉之下，粟裕同志的亲属和许多新四军、华东老战士，也都会由衷地感谢党。

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傅奎清看到这份报告后，非常赞同，并致信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于永波。信中说：

他们建议报告的中心是恳请军委撤销一九五八年军委扩大会议中对粟裕同志不公正的批判。那次军委扩大会议我也参加了。金、谭等同志报告中所列举的事实是实际的。为了恢复粟裕同志应有的声誉，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因此，我也赞成金、谭同志的建议请求。是否有当，请审定。

楚青在11月17日接到谭肇之的信后，才知道这件事。她回忆说：

于永波主任接到信后，立即批示总政宣传部研究。军委领导的批示说：以什么方式什么问题再定，先把事实搞清楚。总政宣传部找我和粟裕的秘书了解情况。1994年2月3日，我得到消息说，总政领导和军委首长对南京五位同志的报告很重视，一致认为应该解决，张震副主席很支持。关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决定以写文章方式。文章由谁署名尚未决定。赶在2月5日是来不及了，具体时间另定。

2月5日，粟裕逝世十周年。当时的中办主任来我家悼念粟裕。谈起这件事时我说：听说现在军委领导同志准备写一篇文章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渴望文章要明确说明粟裕同志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并且最好能由总书记署名。文章写好后能让我看到。中办主任当即表示说，一定把我的想法向总书记反映。

这天，张震副主席也来了。我也表达了我的想法。我说，粟裕现在不在了，其实文章再怎么写，他也不知道了。不过人总是有感情的，我总希望党能说一句公正话，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我这一辈子也就只有这么一个心愿了。张副主席说，本来文章在粟裕逝世十周年发表最好，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现在要考虑发表的时机。

其后，经过各方面的努力，1994年11月，这篇文章终于写好了。除了分送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审阅外，并报送了军委主席。军委决定，文章由军委刘华清、张震两位副主席署名。12月7日，中办主任打电话给楚青说：为粟裕同志平反的那篇文章，军委已经批发了。

12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刘华清、张震署名的《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文章除了对粟裕革命的一生作了公正全面的评价外，最核心的是明确指出：

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

谈起读到这篇文章的感受，时过10年，楚青依然不能自己：

这篇文章不是一般的个人纪念文章，而是组织上以文章的形式为粟裕平反的文件。粟裕蒙冤三十六年，终于大白天下。那时，我拿报纸的手都颤抖了，心情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想，尽管粟裕本人不能看到今天这个结局，但他若地下有知，必定同我一样歌颂我们伟大的党。我们党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克服历史上出现过的失误。

楚青告诉我，为纪念粟裕逝世20周年，一些老战友、老部下正在筹备纪念座谈会。愿此文能化作心香一缕，祭奠这位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的英灵。

（责任编辑 赵友慈）

1945 年烟台军民 反对美军登陆事件

● 王荣卫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与日伪合谋，从海陆空各方面抢运部队，抢占华北、东北。美军也打着盟军的旗号，派军舰进占华北各沿海港口，在占领天津、青岛、秦皇岛的同时，又把军舰开到了烟台海域，并企图登陆。由此，烟台市党政军民在中共中央和胶东区党委的领导下，与美军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的军事外交斗争，并以最后的胜利而告终。这一事件也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历史内容之一。

—

烟台位于胶东半岛东北部，北临黄海，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烟台港是北方地区的重要港口之一，是连接中原与东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把烟台作为他们的重要目标，于 1938 年 2 月占领，此后进行了长达 8 年的法西斯统治，直到 1945 年 8 月被胶东八路军解放。烟台的解放，巩固和扩大了胶东解放区，控制了西到蓬莱、龙口，东到威海的北海岸海口，对贯彻中共中央针对蒋介石政府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从速派主力部队从海上开赴东北开辟战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这却打破了蒋介石的抢占计划。于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美军第七舰队打着“盟军”的旗号，于 9 月 29 日，派军舰驶抵烟台市外的海面，并企图在

烟台登陆。

1945 年 10 月 1 日上午，美舰派一名海军少校和几个随行军官乘快艇驶抵烟台码头，要求拜见烟台军政当局。刚刚被胶东区党委任命的外事特派员兼烟台市代市长于谷莺闻讯后，立即带领翻译来到码头，在海关的一间楼房约见美舰军官。美舰军官称，他们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两栖特遣队的分遣队，分遣队司令官是赛特尔海军少将，他是赛特尔少将的副官海军少校舍尔托夫，奉令来此邀请烟台当局长官到舰上与赛特尔少将晤谈。并提出五项要求，大意是：一、为了减轻舰上的单调，请求允许士兵在烟台对岸的崆峒岛登陆游逛，并问及我岛上与海面设防情形；二、请求允许其少将赛特尔率参谋人员登陆，以视察美国财产，并会见烟市军政长官；三、要求当少将登陆时，借给汽车一辆；四、请求烟台当局和美国舰队以旗语互通讯息，附近航行船只，须是悬中国国旗；五、要求一张日本的烟台军用地图，以了解其防御系统。

美舰队准备在烟台登陆的企图，中共中央早有察觉。9 月 27 日，中央关于对美军在烟台等地登陆的对策，给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和山东分局的指示中指出：“美方有即在烟台、威海、秦皇岛登陆消息，延安已向美军观察组询问，并已告该地为我军占领，已无敌入，请其不要登陆，免干涉内政之嫌。”如美军登陆事发生，我军应避免冲突，以善意对待之，但我方行政、军、警，应照常维

持秩序，并望将美军登陆及炮击我地一切情形，迅速电告延安公布，以便采取对策。”同时，中共山东分局也要求胶东区党委派专人到烟台做外事工作，配合军事斗争，守住烟台。胶东区党委经过研究，决定派区党委海外工作部部长于谷莺到烟台任外事特派员兼烟台市代市长。

于谷莺来烟后，立即根据上级指示展开工作，成立了外事办公厅，并找到长期在烟台美国领事馆当翻译的杨荫樵做翻译。接着组织学习了我们党有关对外政策的文件，以及联合国的有关宪章和协定，明确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的形势、面临的任务和中央的“不排外，不媚外，不主动开枪，但也不丧失民族立场”的人民外交方针，研究分析了美军来烟企图和可能采取的手段，酝酿了斗争的策略。

同日10时许，于谷莺携翻译杨荫樵，登上赛特尔少将所在的旧金山号旗舰，双方举行会谈。会谈中，美方声称，他们是前来协助清除日军埋设的水雷和自杀飞机。我方指出，烟台已于8月24日被八路军解放，现在社会秩序安定，群众安居乐业，烟台军民自己能够很好地清除烟台港口水域的任何危险物。美方又提出一些其他方面的要求。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同意美军士兵在崆峒岛西部登陆游玩；允许其查看他的领事馆及财产；同意赛特尔少将与烟台市政府举行会谈。

二

10月2日上午，赛特尔带领他的副官和部分舰队指挥官及美联社、合众社的一群记者登陆回访。于谷莺等在市政府大客厅进行了热情接待。大厅内悬挂着中苏美英四国国旗。落座后，赛特尔先自称，他此来是代表分遣队全体官兵向烟台市民及其代表，致盟国盟军之问候，祝贺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胜利。然后又提出，允许他的水兵协助烟台市民清除日本投降前可能留下的危险物，允许上岸观光，都被于谷莺婉言谢绝。

最后，赛特尔提出允许他的水兵，到舰艇停泊处后面的那片沙草地上游乐一下。于谷莺答复，可以在取得烟台人民同意之后，满足水兵的愿望。但是，希望美国海军官兵遵守当地警哨所规定的活动时间和范围。并且指出，烟台市已经

没有什么可以烦扰贵分遣队的任务了，你们应该让水兵早回美国，去接触他们故土的气味，并和他们久别的家人团聚。

这时，随行的记者们要求提问，于谷莺没有拒绝，并简要作了回答。

会谈持续了五个多小时，到下午两点才结束。会谈结束后，我方代表于谷莺等在中兴楼设宴款待了赛特尔一行。

第二天，赛特尔偕其参谋长、副官和四五个美国记者，在我方人员的陪同下，又查看了原美国领事馆旧址及其他美籍房产，并对查看结果表示非常满意。

同日，经过我方许可，美军士兵开始在崆峒岛上打球游玩。至此，美我双方以礼相待，不失盟军盟国之情谊。

但是，美军并没有放弃在烟台登陆的企图。10月4日拂晓，崆峒岛前又增加了两艘美舰。上午10时，赛特尔和他的副官舍尔托夫来到外事办公厅，称奉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金盖德上将电令，前来送达一份通牒。内容大致是：美海军陆战队将在烟台登陆，要求十八集团军部队及烟台市政府：一、撤除沿海防务；二、撤离烟台市；三、将烟台市有秩序地移交美方接管。并当场把电文抄本一份交与我方。

于谷莺当即气愤地站起来说：“这简直是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是无理要求。为什么要中国人民军队从自己解放了的国土上撤出去？美国的军队为什么要中国人民已经解放了的国土上登陆呢？我们向美军提出强烈的抗议，并保留向全世界宣告美国海军的这一无理要求和侵略行径的权利！”

赛特尔走了之后，当天下午，于谷莺同烟台驻军政委仲曦东、市委书记滕景禄一起，详细研究美军通牒问题。一面迅速电告上级，一面组成了反对美舰登陆统一行动委员会，由仲曦东任书记，准备作进一步的斗争。

10月5日，崆峒岛前面又增加了许多军舰，远远望去黑乎乎的一大片。9时，赛特尔和巴贝中将军的副官来到市政府外事办公厅，邀请烟台市长到巴贝中将军旗舰路易维尔号上会谈。

为了不失礼节，于谷莺在和仲曦东、滕景禄等简单研究了一下对策后，便随美军快艇驶往巴

贝的旗舰。

谈判在舰上客厅进行。美方代表有巴贝中将、两栖作战司令罗克少将和赛特尔少将。可能是为了炫耀自己武力的原因,巴贝先请于谷莺听了一段美军在天津受降时的实况录音,然后参观了他们的旗舰,最后开始谈判。

巴贝首先发言:“根据美国政府与蒋介石委员长的协议,我奉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盖德上将命令,来渤海各港口登陆,请贵方军队撤出烟台。”

于谷莺当即予以拒绝:“巴贝将军阁下,烟台市早在一个月前就由中国人民子弟兵解放了,我们的立场,想必赛特尔少将也一定向您作了汇报。”

巴贝又提出:“我的海军陆战队和贵方部队在烟台共同驻军,如何?”

于谷莺反问道:“我不知道这种共同驻军对烟台市民有什么好处?”

会谈没有任何结果,美方提出下午与烟台军事当局举行会谈。

下午,巴贝带领罗克少将、赛特尔少将及若干海陆空军军官,还有新闻记者一行人,来到市政府外事办公厅,拜会我方。我方代表于谷莺、烟台驻军政委仲曦东等参加会见和谈判。一进会客室,巴贝就问:“今天你们两位朋友当中,谁是接待我们的首席主人?”

仲曦东说:“于市长是我们烟台的一市之长。”

于谷莺接过说:“仲将军是烟台市的解放者,也是我们烟台市民的坚强后盾,我们不讲什么席,我们说话都负责任、都算数。”

巴贝称赞仲曦东:“仲将军,我在大街上走时,看到你的士兵很精神,你很会训练部队。”

仲曦东说:“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战胜日本侵略者自愿参加人民的军队,久经战火考验,自己解放了自己,又解放了自己的国土,他们很自豪。我还可以告诉将军阁下,我们的战士听说,蒋介石在外国反动势力的援助下要前来夺取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他们都义愤填膺,决心与任何敢来侵犯的敌人战斗到底,不惜再和他们决战八年。”

罗克盛气凌人地插话说:“外国有大炮、飞

机、原子弹!你们呢?”

仲曦东回应道:“中国人民有反侵略的钢铁意志,有进行革命的钢铁意志,是任何敌人也征服不了的,飞机、大炮、原子弹只能吓唬那些意志薄弱的人。”

美方又提出登陆问题。

仲曦东反问:“你们为什么要在中国人民军队早已解放了的土地上登陆?”

巴贝辩解道:“你们第十八集团军部队进占日伪军阵地,中国政府蒋委员长是没有允许的。如果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烟台,蒋介石委员长就可以延缓派兵来烟台,这样就可以缓和你们中国内部的争执了,你们应该理解,我们对你们是很友好的。”

仲曦东严肃指出:“你们这是要为蒋介石打内战充当急先锋,要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侵略中国领土!”

巴贝又辩解:“我们不是干涉别国内政,不是侵略别国领土,我们是奉命在为中国和平采取适当的措施,所以我们没有请求烟台行政机构、警察撤出烟台,只是请求驻军撤出烟台。”

于谷莺插话:“将军阁下,仲将军是烟台市民的解放者,又是烟台市政府和人民的坚强后盾,烟台市民怎么会让它的后盾撤离烟台呢?”

美方又提出双方在烟台共同驻军。罗克还威胁道:“划定地区,指定时间,我要指挥我的海军陆战队很快登陆。”

仲曦东坚决地回答:“我可以再重复一遍,贵军要在我们早已解放的烟台领土上登陆,以及共同驻军,都是令人不能理解的,为了盟军友谊,贵军不宜在此登陆。”

罗克霍地站了起来,气势汹汹地说:“既然如此这样,我奉金盖德上将命令要在烟台立即登陆,为了避免发生意外,请贵军立即撤出烟台,撤往市郊。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执行命令。”

“我也是军人,我也懂得应当怎样保卫烟台使它不受任何敌人的侵犯。在长期战争的考验中,我们也懂得怎样对付侵犯的敌人,完成我们军人的职责。我要正告罗克将军,你要是敢于侵犯烟台,一切后果须由你负全部责任。”仲曦东也气愤地站了起来。

美方见我态度强硬,寸步不让,开始以比较

温和的态度提出再慢慢协商,同意双方都请示一下各自的上级再作决定。谈判气氛缓和了下来。美方在说了些烟台的街道很清洁之类的话后,又把话题引向解放区战场、我海岸军事设施等,问我方打算用多少兵力防守烟台、威海卫一线,我方巧妙地回答道,完全看情况需要而定。美方见无法通过谈判迫我撤出烟台,只好提出明天再谈便告辞。

三

与美方谈判之后,我方统一行动委员会经过充分的分析研究,最后决定:坚决拒绝美军登陆,誓死保卫烟台。一方面将意见迅速电告上级,一方面命令部队立即在美军可能作为登陆地点的海岸加强防御工事,进行充分的反侵略的准备,并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同时,重要的物资开始外运,非必要的工作人员也开始准备撤离。

第二天天亮之后,刮起了大风,海上波涛汹涌,美舰没有动静。

这天下午,烟台市党政军民在南操场召开了几万人的群众大会,抗议美军登陆。大会自始至终群情激愤。群众不断连声高呼:“反对美军干涉中国内政!”“坚决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八路军和市政府是人民的军队和政府,有权力和有责任管理烟台市!”“坚决拒绝美军在烟台登陆!”“侵略者滚回去!”等口号。

于谷鸞登上放置在群众中间的桌子,激动地向群众介绍了美军要求登陆的经过,郑重地宣布了政府的态度。他高度赞扬群众反对侵略、纷纷请愿的严正立场,也坚决地向群众表示:“现在的民主政府,不是国民党逃跑主义政府,而是有着严正的民族立场和实现人民意志的政府。现在政府的官吏也不是国民党自私自利、鱼肉人民的贪官污吏,而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中国人民争自由、民主、幸福,与日寇血战八年不怕牺牲的战士。我代表政府向人民表示:坚决反对和拒绝美军这样无理的要求。”

仲曦东也登台讲话。他说:“盟邦美舰停泊于烟台海面,无理地要求我们撤出烟台。我们答复,烟台是烟台人民和八路军共同从敌人手里解放的,我们有权力有责任保卫它。”

最后,各救会代表马仪代表群众表示,坚决反对美军干涉中国内政,和军队、政府紧密团结,战斗到底。接着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游行队伍经过东海岸时,群众对着停泊在海面上的美国军舰,挥拳高喊:“美国人敢登陆,就把他揍回去!”

四

反对美舰在烟台登陆的斗争,一直受到中共中央和十八集团军总部的密切关注,并多次直接做出指示。10月6日下午,胶东区党委又收到中央关于坚决拒绝美军在烟台登陆的电文,电文称:“美军在烟台登陆,我应表示坚决拒绝,让其强登陆,以便在全世界揭露美军无理干涉中国内政。”并明确指出,在交涉中可向美军作下列答复:一、烟台已无日军,美军在烟台登陆毫无必要。二、我军无上级命令,不能撤出烟台市。关于我军撤出烟台市事,请与我上级交涉。三、美军未得我方允许在烟台登陆,则发生冲突须由美军负其全责。”中央指示明确了斗争的方针和策略,并且极大地鼓舞了烟台党政军民的斗争信心。

10月7日凌晨,延安新华社播发了10月6日十八集团军叶剑英参谋长关于美军在烟台登陆问题,给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叶顿上校的声明。声明严词拒绝美军的无理要求,指出:“1945年9月27日,基于美军计划在烟台、威海卫登陆的消息,本人曾受本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之命,经过阁下向美军总部声明下述三点意见:一、如美军在上述地点登陆,十八集团军方面将发现难于了解这一登陆的目的。因为所有这些地方,均在十八集团军控制之下,附近并无日军。二、如果美军事前未经与十八集团军总部作任何协商和规定,突然在上述地点登陆,将引起中外人士怀疑美军干涉中国内政。三、因此,朱总司令致电美军,不要在上述地点登陆,并请求贵军总部予以答复,迄今已过十天,贵方迄今未答复。”声明在陈述美方来烟向我提出关于登陆的三项要求后,着重指出:“朱总司令接获上项报告,不胜诧异。特命令我向贵方作郑重声明下列意见:一、烟台市早于1945年8月24日为本军部队收复,烟台市之日伪军队,早经完全解除武(下转62页)

“四人帮”就擒后的上海市委

● 鲁 人 张 毅

1976年10月6日,被称之为“四人帮”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束手就擒,中国历史开始了转机。

“四人帮”中有三人是从上海发迹的:王洪文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海的一名工人造反派头头,后来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原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姚文元原为上海《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后来借助“文革”动乱之机,都爬上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高位。而江青呢,与上海也有着人所共知的极深的渊源关系: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当演员;揭开“文革”序幕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以及臭名昭著的“纪要”,都是她在上海酝酿而成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关系,“四人帮”发迹后就把上海作为自己的势力核心范围。上海市委那时的大多数领导,都是“四人帮”安排的。投桃报李,这些人也死心塌地追随“四人帮”。因此,1976年在10月6日突然没有了“四人帮”的消息后,上海市委“四人帮”的追随者一时乱了阵脚,其后竟然要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上演了颇为惊心动魄的一幕。

马天水被召赴京,上海市委负责人惶惶不可终日

10月6日,“四人帮”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束手就擒的。在上海,除了海军上将、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之外,谁都没有得到消息。这一天,竟是王洪文那个贴身秘书廖祖康,为自己举行婚礼的日子。喜气洋洋的廖祖康自然不会想到,他的首长王洪文在北京已成为阶下囚。当然,来参加婚礼的上海市委的领导人也一

样被蒙在鼓里。直到第二天,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被召赴京开会,他们才隐隐约约地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四人帮”就擒之后,7日,中央即通知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到北京,召开一个“打招呼”的会议。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也得到了通知。马天水当即就有异样的感觉。首先,按照以往惯例,中央若召开会议,上海市委在接到中央通知之前就会先从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那里得到消息,以及如何准备发言的指示,而这次却没有事先得到他们三人的通知;其次,以往中央来的电话通知中,多少都会说一些开会的内容,但这次却什么也没有说。当他问开什么会时,对方只是重述中央的通知,未加任何说明。

由于感到蹊跷,马天水在这天上午9点主持市委召开常委会,通报此事。参加会议的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听后也“都感到很突然”。会上商定,马到京后两小时就与上海通电话,通报情况。徐景贤在后来写的交代材料中说:“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马天水到北京后,自然立即参加了中央的会议,得知了“四人帮”就擒的消息。但他并没有如约经上海打电话回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情绪紧张,越发感觉形势对他们不利,感觉中央一定出了什么事。他们分别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打电话,但都没有接通。其后,他们又和“四人帮”的亲信迟群、谢静宜等人联系,自然也都没有结果。王洪文和张春桥留在上海的秘书廖祖康、何秀文又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咏等人,了解情况。电话倒是打通了,但于会咏等人电话中说:“不知道中央出了什么事,也没有见到王、

张、姚等人。

一天没有消息,徐景贤再也沉不住气了。晚上,他给于会咏打电话。于会咏没有什么消息,只是告诉徐景贤说: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是华国锋决定的。徐景贤又拨通了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刘湘屏则说:没听说中央开什么会,王、张、姚的情况不知道。

这天晚上,王秀珍终于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上了电话。马天水当然不能在电话中透露会议内容。因此,房佐庭推托说,中央还没有开会,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并说“马老在洗澡”。这样,王秀珍也没有和马天水直接通上电话。这样的情况,自然让徐景贤、王秀珍更加紧张。他们度过了惶惶不可终日的一夜。

10月8日的大清早,张春桥的夫人文静告诉王秀珍说,他们的儿子原定今天到北京去。所以,昨天晚上文静给张春桥打电话,但是电话打了一夜也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王秀珍听了以后,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自然是打不通的。

王秀珍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徐景贤。徐、王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肖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按照徐、王的意思,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徐景贤和王秀珍都急了。徐景贤又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电话。可是,鲁瑛没讲几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徐景贤感觉十分反常。肖木不无担心地说:“坏了,鲁瑛肯定给监视起来了!”

正在这些人一筹莫展之际,中央的两条指示来了。第一条,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第二条,中央台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

种种迹象已经使他们确定,形势对他们是不利的。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廖祖康一起在上海市委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徐景贤分析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

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此时,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军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还说了一句话:“我的老胃病复发了,在南京就开始患了。”

徐景贤分析说:“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复发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廖祖康说:“几个老师,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廖祖康说到这儿就打住了,但在场的人自然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几个老师可能已经指挥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下手了。”

徐景贤当即说:“极可能发生军事政变!”

王秀珍接着说:“老师动手了,右派上台了。”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徐景贤则说下午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



“四人帮”右起: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王洪文

责人吹吹风。

其后,徐景贤就把上海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找到“康办”(康平路办公室所在地)下指示。他说:“你们这几天要注意新华社电讯稿,如中央发出有关处理上海几个人(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决定,你们报纸不能登,电台不能广播。你们一定要听从市里的命令。”

为了能摸到详细情况,8日下午,徐景贤又给浙江省委一位副书记和福建省委一名常委分别打电话摸情况;王秀珍则给辽宁省委一位副书记打电话,还要他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下午3点,徐景贤在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小礼堂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介绍和北京联系的情况,研究对策。

参加会议的人一落座,徐景贤就说:“给大家通个气。马天水7日到北京开会,到现在通不上消息。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倒是有电话来说:‘我老胃病复发了,在南京就开始患了。’估计中央是出了事情了。与会者虽然没有头绪,但都议论,肯定北京出了事,对他们不利。”

会议结束后,王秀珍留下金祖敏的秘书,指示他到北京打听“四人帮”的情况,立刻打电话回来,并交代了通话的暗号:“如果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说‘我娘心肌梗死。’”

8日下午4点,徐景贤、王秀珍再次召集会议,参加者有市委常委冯国柱、王少庸等人,还有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以及公安局的薛干青等人,再次议论形势,提出对抗办法。徐景贤说,军委加强战备的电报提出要“防止内潜外逃”,估计军队在他们(意指华国锋、叶剑英等人)手里,对我们不利。冯国柱、王少庸说:“人家来接管怎么办?”徐景贤、王秀珍决定“加强战备”,积极准备力量。

晚上,徐景贤等人都集中在“康办”等候消息。金祖敏的秘书的电话回来了,就是那句“我娘心肌梗死”的暗语。他们不敢相信的事实终于发生了。

徐景贤又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咏、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

断了。

这时,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门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刘庆棠打来电话。徐景贤的秘书回来传达说:“刘庆棠在电话里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肖木突然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的。”于会咏”

肖木这么一说,现场一片混乱。人人都感觉大难临头了。稍后,冷静下来的徐景贤当即宣布:“第一,不再往外打电话探听消息了。第二,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商讨对策。”

策划武装暴乱的过程

10月8日晚上8点,在徐景贤、王秀珍的主持下,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人除常委外,还有朱永嘉、肖木、廖祖康、何秀文以及工会、民兵、公安方面的负责人。徐景贤、王秀珍说:“北京发生了政变,修正主义上了台,我们要对着干。”

市委常委、负责写作班子工作的朱永嘉说:“我们得准备战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布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或者先发一点语录,和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材料。他还说:‘春桥、文元培养了我们十年,我们所以有今天,全靠了张、姚。他们倒了,我们也完了。’”

王秀珍说:“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二千五百人,三万一千人待命,要发枪发子弹,连夜搞巡逻。舆论工作要抓紧,由朱永嘉具体负责,要赶快准备。”

王少庸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才能形成一个拳头。”

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他提议说:‘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冯国柱补充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廖祖康接着提议，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并自告奋勇地说，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办。

在这次会议上，还具体讨论了武装暴乱的一些细节问题：第一，设立指挥点的问题。会议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徐景贤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徐景贤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徐景贤当场执笔开列了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第二，徐景贤发出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手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交给王秀珍去执行。

会后，武装暴乱的策划活动就开始了。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对武装力量的控制。他们除了布置民兵外，要把军队的力量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当天晚上十一点多钟，他们召集市委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杨新亚、守备师师长李仁斋开会，进一步策划。徐景贤先介绍了所谓北京发生了问题的情况。接着，徐问张宜爱：“警备区部队怎么样，张回答说：一师、二师的情况你知道，只有警备师可以。徐又问：谁能调动部队？张说：调动部队要党委集体讨论。徐说，要是他们（指“四人帮”）被一网打尽，我们不都成了爪牙嘛，如果你成了爪牙，怎么办？张答：六十多岁的人了，还怕什么，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徐景贤又问李仁斋：你们究竟有多少部队？李答：都是分散值勤的。张宜爱问有多少部队可以机动！李一一作了回答。徐景贤还问一师、二师两位师长怎么样，问上海两边有什么部队，等等。谈完后，徐景贤便带着王少庸、张宜爱、李仁斋到丁香花园招待所，王秀珍带着另一批人到市民兵指挥部，这时已是9日凌晨1点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徐景贤刚休息了一会儿，就接到了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用红色的保密电话打来的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

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他如果同意的话，请告诉李师长一下。徐景贤当然同意。放下电话，他就写下了第二个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接着，徐让秘书叫醒了已睡觉的李仁斋，当面把手令交给了他。他在电话中分别给守卫电台的五连和守卫“康办”的三连，下达了徐景贤的命令。

与此同时，王秀珍率领冯国柱等来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二号指挥点。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也赶到这里来汇合。

在此之前，根据王秀珍的指示，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和钟定栋一起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8日晚12点，王秀珍、冯国柱两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大帮人到了民兵指挥部机关。施尚英和钟定栋向王秀珍、冯国柱两个汇报了所拟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3240人和摩托车100辆，卡车100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13000人，起用民兵101艇、15瓦电台15部。秘密指挥点就设在施尚英原来工作的地方上海江南造船厂和王洪文、黄金海原先所在的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选择了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9日18时以前，全部落实。

王秀珍认为，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这两个单位目标太大，指挥施尚英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作秘密指挥点。其后，施选择了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之后，施尚英、钟定栋等人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

从后来披露的材料看，这两个指挥点都处于临战状态。江南造船厂点设16人，其中有7个报务员，由施尚英、钟定栋负责。中纺机厂点设13人，其中有6个报务员。9日上午人员进点。在通

讯联络上的主要手段是(1)设立电台。江南厂点和中纺机厂点各设四部电台,各师和区民兵指挥部各设一部电台。拟了电报密码,和各台呼号。规定中纺机厂点只收不发。江南厂点可向五个师、十个区民兵指挥部直接发报,而各师、区只能向江南厂点发报,互相之间则不能发报。11日上午,江南厂点和中纺机厂点电台同各台互相沟通,还试通了电报。12日晚,这伙人还确定,有些没有电台的县和直属师团也要配发。有些单位还可利用工作电台。(2)秘密电台号码。规定江南厂点和中纺机厂点间可交换电话号码,江南厂点可同各师、区民兵指挥部直接联系;而各师、区民兵指挥部只能通过市民兵指挥部办事组长转告。中纺机厂点不能同各师、区民兵指挥部联系。江南厂点同康平路徐景贤、王秀珍联系也只有施尚英、钟定栋才知道电话号码。(3)派联络员。市民兵指挥部向十个区民兵指挥部各派了一个联络员。各区民兵指挥部只能由联络员电话告市民兵指挥部办事组长再转告江南点。(4)由于怕暴露目标,也议论了骑自行车联络问题。

与此同时,被要求待命的3260民兵全部武装起来,配备100辆卡车,200名司机。这些人脱离生产岗位,时刻待令。预备队伍35000人,一边生产,一边准备,暴乱令下,立即行动。

王秀珍、徐景贤等人多次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战备”,做到武器弹药要配套。钟定栋等人还密谋了暴乱发生后的武器弹药的补充问题,妄图一

方面到上海警备区仓库提取”,一方面利用造武器厂搞枪弹,加上两个弹药厂。

在武装暴乱箭在弦上之际,10月9日,王秀珍接到了马天水从北京来的电话。电话里,马天水告诉王秀珍,北京情况很好。王秀珍等人关心的“四位首长”的情况也很好。马天水说,尽管他并没有去打搅他们,但通了电话。而且“四位首长”让他向徐、王二人问好。

马天水这个轻松的电话,让徐景贤、王秀珍两天来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那些在忙碌着备战的王洪文的小兄弟自然也舒了一口气,这些武装暴乱分子放松了戒备。自然,他们不会想到,马天水这个电话是奉中央之命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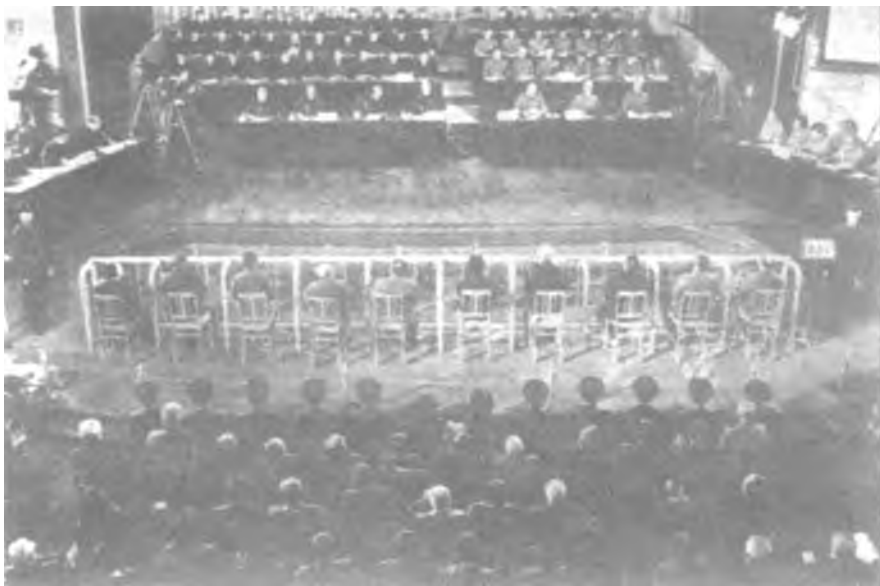
9日晚上,马天水又来电话,说中央要徐景贤、王秀珍10日到北京开会。

“四人帮”就擒的消息证实后,上海市委又继续谋划武装暴乱

尽管马天水那个轻松的电话让徐景贤和王秀珍舒了一口气,但是,从各方面摸到的形势来看,“四人帮”极有可能已经被抓起来了。徐景贤、王秀珍虽然不能怀疑马天水,但的确心中有疑惑。所以,10日上午临去北京之前,徐景贤表示,自己有“一去不复返”的心理准备,并说到北京决战也可以。他要求上海继续为武装暴乱作准备,并委托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三人负责上海工作。

10日、11日,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等人继续活动,聚集武装力量。但是,上海市委警备区的几个人却接到了南京军区的警告,不再参与此事。

到12日,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都证实“四人帮”已经就擒了。这天晚上8点,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召集朱永嘉、王日初(市委组织组负责人)、陈阿大、廖祖康、肖木、何秀文、马振龙、施尚英和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知常(市委写作组负责人)等人开会。会上,朱永嘉歇斯底里地叫嚣:“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之后,他又进一步建议说:“北京发生政变,我们要立即采取行动,立即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公路,阻止江、浙两省军队进入上海,造成上海生产瘫痪,同时,夺取电台,天亮之前广播宣言和告全国人民书,通知报社第一版等到十二点拼版,发表宣言。”

王知常来的较晚一些。他一到就声泪俱下,讲了所谓历次政变的历史:“北京现在发生政变,我们不搞也杀头,搞也杀头,可以像巴黎公社的巴黎墙那样用鲜血教育下一代。”廖祖康极力主张“马上暴乱”,肖木狂叫:“要就不干,干就要大干,越大越好。”马振龙还猖狂地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拎着头干,这次也要拎着头干。”黄涛、何秀文等也叫嚣,要大干,要张敬标、王少庸、冯国柱立即以市委名义作出决定,进行反革命武装暴动。冯、张、王表示,干,同意,等三位领导(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问他们到底什么态度,他们三人不干,我们干。会上决定,马上拟定武装暴乱的口号,向全市全国发布。

会后,根据黄金海的指示,起草标语口号,共拟了17条。其中有“决不允许苏联变修的历史教训在中国重演!”后来又加上了两条:“全市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全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共打印了103份,准备暴乱开始时散发。

在此期间,江南厂点的人再一次研究了暴乱实施计划。计划要求民兵要对康办、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上海分社和四个飞机场作为重点保卫,还提出对煤、水、电、重要桥梁,以及原来由民兵保卫的目标也要加强。各区民兵指挥部也要加强对重点目标的保卫。

钟定栋提出,上海同兄弟省市有六个口子,为了防止外面来干我们,要搞三个保卫圈。以上海为中心,沿江苏、浙江与上海交界的六个路口,形成第一保卫圈。浏河由宝山民兵指挥部负责,葛隆、安亭由嘉定县民兵指挥部负责,金泽由青浦县民兵指挥部负责,枫泾、金丝娘桥由金山县民兵指挥部负责。每个路口组织五百民兵守卫,

另备一千民兵的预备队。沿海六个县(崇明县除外)各组织一千民兵预备队。沿中山路、邯郸路,加上黄浦江形成第二保卫圈。按行政区分片包干,每个路口都要布置民兵,并由渔业公司民兵团派出六艘渔轮在吴淞口巡逻。沿北面到十道桥,南面徐家汇路到启家浜路,西面从乌鲁木齐路、石门路到不道桥一圈,形成第三保卫圈,由有关部门分片包干。

这些计划拟定好了,已经是13日凌晨了。这时,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从北京打来电话说,马、徐、王上午都要回来了,并要求去机场迎接的人要少一点。张敬标半信半疑地说:“可能是个骗局,看看马、徐等下飞机后是否有解放军来,防止诱捕在上海的其他一些人。另外要看看他们回来的情况怎么样,是否投降了。如果是,就把他们抓起来。”

尽管这些人气焰还是这样嚣张,但是由于马、徐、王很平静地回到上海,以及当天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也抵达上海,上海的局面很快稳定下来。

当天晚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根据中央的指示向上海市委常委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并作了言不由衷的检讨。参加会议人明白,几天来酝酿的武装暴乱计划,只能束之高阁了。

10月28日,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苏振华,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

“苏振华兼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虽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依然坐在主席台上,不过会后他们就从上海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留给他们的任务是,老老实实在“文革”中种种倒行逆施以及策动上海武装暴乱的罪行。

(本文根据叶永烈《王洪文传》所披露的材料以及新华社当年的调查材料写成)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真相

● 赵锡骅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着重指出：“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中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

四川是民盟的发源地，解放前在民主革命中牺牲的盟员烈士有59位，约占全国盟员烈士的一半。解放前后在民盟地方组织中盟员人数最多，活动也较多，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冲击也最大。

笔者于1945年，经成都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老共产党员李相符教授介绍参加民盟，解放后长期在民盟四川省委会机关作专职干部，1957年任宣传部副部长，在机关反右运动后接着进行的整风运动中（也是反右的补课）被划为“中右”，受降职处分。经历了这个历史时期的全过程，和许多当事人以后长期都有联系和交谊。有时一起回顾那段经历，无不感慨万端。而今他们多已作古，我也已年届八旬，深感对那段历史负有责任，我再不写，后人很难弄个清楚确切。

一、民主教授潘大逵

1936年，青年教授潘大逵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被捕下狱后，潘大逵等17位著名爱国知识分子曾追随宋庆龄到苏州自请入狱，营救七君子。1945年11月25日，昆明各大、中学学生在西南联大操场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邀请潘大逵、费孝通等四位著名教授主讲。开会时反动军队、警察、宪兵、特务包围了会场，如临大敌。潘大逵最后讲话时，特务突然截断电源，全场灯光熄灭，扩音器不响，枪弹横飞。

但潘仍正气凛然，从容不迫地发表他的反内战演说，激情满怀，声震夜空。群众高呼口号，热烈鼓掌，使这个讲演会成为昆明反内战运动的动员会和誓师会。

1946年，潘大逵教授从昆明回到重庆，应聘去重庆大学，消息传出，同学们在校园内挂出红色横标，大书“欢迎民主教授潘大逵莅校执教”。

1949年9月，潘大逵因避反动派迫害，转移成都，利用原有社会关系，做策反地方将领的工作。重庆比成都早二十几天解放，昆明时期的老战友楚图南教授被北京民盟总部派驻重庆任西南盟务特派员，电邀他速返重庆。他立即将起义将领邓锡侯送他的路费银元留一半给重庆来的两位盟员同志，坐上邓送他的吉普车奔向重庆。车到离重庆还有几十公里的青木关时抛锚，他没有耐心等待修理，便截了一辆货车，跳上驾驶台旁边的踏板，用手攀扶着车门，像“赶黄鱼”的小伙子一样冒险搭车进城，急切如雀跃的心情可以想见。

到重庆后，他任西南行政区文教部副部长，分管西南地区高等教育工作，还兼任其他一些要职。他虚心学习，积极工作。当时对爱国民主人士强调“安排照顾”，一些人士至今回忆及此，犹叹羨是“黄金时代”。

二、赵秘书长被推派赴雅安搞调查研究惹了祸

1954年大区撤销，潘大逵奉调四川省，回到故地省会成都，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和民盟四川省委会主委等职。

1957年4月,毛泽东主席提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潘大逵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召开的鼓励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的会议,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会上号召党外人士要向党提真意见,不要讲“政协话”(一味肯定的恭维话),就是“骂娘”也可以的,其诚意十分令人感动。中央的政策和号召,解除了大家的顾虑,为国为民献计出力的积极性普遍被调动起来,许多人欢呼“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了”。潘大逵怀着欢欣鼓舞的心情回四川传达中央精神,鼓励大家帮助党整风。

与此同时,为了帮助党整风,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题,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地方组织,在中央统战部和地方统战部的推动帮助下,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四川省统战部帮助我省各民主党派协商怎样开展调查研究工作,首先是选点。当时成都四川大学农学院新迁到雅安市建立四川农学院,师生新到中等偏小的城市,有许多不方便和意见要求,思想比较活跃;此外,民盟在该院有一个盟员较多的支部,在该市又有一个民盟市委是解放前建立的老组织,盟员人数较多,于是便商定由省民盟去那里搞调查。

5月13日,由省民盟赵一明秘书长任组长的调查工作组,在省统战部党派处杨建成副处长的陪同协助下来到雅安。民盟雅安市委召集全市盟员请他们讲话。赵秘书长向大家传达了民盟中央四月工作会议精神,鼓励盟员帮助党整风,积极提意见。调查工作组的调查题目:一、盟的基层组织如何在大学、中学进行工作的意见;二、盟的市、县组织如何搞好地方政协工作的意见。会后与雅安市统战部和市政协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到各个学校的民盟支部参加组织活动,拜访有代表性的盟员,联系群众,了解情况。经过两周时间,在回成都之前两天,杨副处长请赵秘书长安排工作组成员、省民盟宣传部干部张声明写一份如何推动地方政协工作的意见

的汇报材料。杨看了这份材料后对张声明说“写得很好”,给予肯定。回到成都,省统战部李宗林部长看到这份材料后,高兴地说:“你们这次立了大功劳。”予以表扬。

然而仅仅过了十来天,政治风云突变。在反右斗争中,省民盟田一平副主委在一次揭批赵一明的发言时,竟将这份材料列举出来作为赵一明反党的证据。顷刻之间,变化何其大也。

7月5日《四川日报》刊载了记者刘某写的专文《赵一明在雅安“试点”干了些什么?》,说赵在雅安“提出了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在雅安具体实施的方案”。这篇文章口气很大,出语惊人,但文章的内容十分空洞。

刘文说:“赵一明在专职干部会议上制定章罗联盟反党纲领实施的具体方案”是“不遗余力”的。对具体方案如何,却没有具体指出。当时民盟专职干部共四人,除一位副主委外,只有陈敦泮、朱仰东和张联楨三人,运动中陈、朱划为右派,张划为中右。他们经过小会、大会的揭发批判,即如生活细节或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暴露无遗,如真是在基层贯彻执行赵一明的具体方案,毫无疑问会被群众揭发出来,而刘文对此无任何反映。

刘文说:“盟市委一些专职干部在赵一明走后,也到各基层叫喊‘要发展,要发展’,批评雅中支部发展盟员太胆小,批评小学小组发展盟员太迟缓。”参加联系基层工作的专职干部只有上



1946年周恩来在重庆与民主人士合影(后二排左四为章伯钧、左六为罗隆基)

述三人,陈当时分工联系雅中支部,曾说过雅中支部盟员已经达到饱和,不主张再发展。从雅安民盟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1952年发展43人,1956年至1957年发展23人,一贯都是稳步进行的,盟员的素质也较好,以后也没有查出一个不够条件的。在反右前夕,发展的人数还最少。他们扪心自问,当时不可能叫喊“要发展”之类不符合实际的话语,刘文是否将一些报道凭主观臆断硬搁在他们三个专职干部的头上了?

雅安是个较小的城市,一时竟被渲染为章罗联盟反动纲领的试点。

三、“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在雅安的具体实施方案”的真相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两天后又发表了社论《工人说话了》,社论说:“这两天,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许多职工纷纷举行座谈会,愤怒谴责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敏感的赵一明意识到风向大变,便在15日省统战部召开的谴责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座谈会上,以《坚决同一切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修正主义思想划清界限》为题,作了长篇系统的发言:“对章伯钧、罗隆基同志的修正主义思想进行了驳斥”,说潘大逵同志“受了不良影响”;“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上,加倍地强调知识分子的特点,还颂扬了某些知识分子的骨气。”(6月16日《四川日报》)

赵一明还揭发说:“章伯钧同志甚至荒谬地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只有两个是靠自己起家的:民主同盟靠走中间道路起家,第三党(农工民主党)靠反共起家。’”(实际章伯钧没有说过这句话)

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据叶永烈《反右派始末》一书说,毛见到赵一明所揭露的东西后,于16日给彭真、李维汉写信,要他们查询是否已在四川的报上发表,如已发表,要新华社转发。果然《四川日报》16日发表后,《人民日报》18日便作了转载,新华社也予以转发。(见该书256页,1995年出版,书中所载毛泽东给彭、李信件全文,因未注明出处,本文未予转引——作者)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

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着重指出“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中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赵一明的揭发,是否更加激起毛泽东点名痛斥这两个党派;抑或毛早已有了明确的判断,这个揭发为他补充了材料,就不得而知了。这篇社论将反右斗争推向了高潮,史良在民盟中央的会上说,民盟在全国已处于“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地位了。

当时任四川省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的熊扬晚年谈及当年的有关史料时说:“当时中央统战部电话通知省统战部,要批判雅安调查。省统战部李部长接电话后很惊诧,因为雅安调查原是统战部推动帮助民主党派搞的,但也只有照办。当时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政委李井泉亲自抓反右斗争工作,要求省统战部熊副部长和省民盟党盟交叉(既是共产党员也是民盟盟员)的田一平副主委每天晚上到他那里去汇报工作。李井泉说,要赵一明交代揭发到雅安搞调查的问题,交代揭发得好,可以不划他的右派。”

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下,赵一明写出长篇系统的交代检查后,又进一步交代揭发潘大逵说:“四川盟内确有一个‘无形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是:潘大逵、胡克林、赵一明、舒军、李康、冯克熙、韩文畦、张松涛、刘堃南、李源澄、杨复全、戴星如、张声明等。这个组织的核心又是潘大逵、胡克林、赵一明、舒军、李康、冯克熙等六人。”潘大逵这个点的作用是:把上面章伯钧、罗隆基反社会主义的主张带下来,把这个组织的情况、关系反映上去,这样盟中央有人说话、支持,下面有潘大逵提出后大家动手干。”(7月29日《四川日报》)

所谓“无形组织”成员名单上的人,先后全部划了右派。

熊扬副部长向李井泉汇报请示时说:“赵一明已经交代、揭发了,是否就不划右派了?”未料李井泉说:“运动才开始,怎么能不划?”

赵一明得悉仍要划右派后,独自骑着他的新自行车离家到一家小饭馆喝了些酒,然后红着眼,向百花潭的南河中走去……群众发现后将他救了起来,派出所打电话通知省民盟将他接回机关宿舍,又从派出所借调了一位干部来住在宿舍

内能望见赵家的房间,经常关心着他的安全。赵的夫人本是一位优秀的中学教师,受他牵连,也被划为右派。《四川日报》的标题是“夫唱妇随”。

四、潘教授没有料到竟做了“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的头目

6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潘大逵是全国人大代表,曾经许诺要带未到过北京的昆明时代同过甘苦的夫人同去北京,此时没有在意在成都初步受到的一些揭发和指责,仍旧带了她同去。潘没有料想到,这次全国人大小组会一开始就反右,更没有料到,他所在的四川代表小组点名批判的,第二个就是他。

第一个被批判的是章乃器,他的态度特别强硬,对批判仅报以“造谣”、“诬蔑”、“卑鄙”,不屑于回答。朱德总司令是四川人,也编在四川组,休息时间问他受得了么?章回答说:“没有什么。”潘大逵自愧不如,轮到批判他时,就不知所措。一些莫须有的事情,越辩越辩不清,只好逆来顺受。虽耿耿于怀,仍然讲了些不实之辞。为了自己过关,还把一些错误乃至莫须有的事情,都推在清华时代的学长、昆明民主运动中的战友罗隆基身上。人大代表中的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周新民和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邓初民对潘很关心,鼓励他作一次深刻的检讨发言,使一些问题让人了解,从而得到澄清。潘将发言稿先请周新民看了,大会发言后不少代表鼓掌以示认可。周新民和邓初民也认为讲得比较深刻,说回四川后再检讨一下就可以过关了。二位的话对他有所安慰,但他在会场过道上老远望见罗隆基时,便急忙转身躲避,盖愧对老友,良心不安也。直到晚年,还留下文字自责道:“这次假检讨”,“实在可鄙、可悲而又是在无可奈何之中造出的罪恶。”

但他没有预料到,回到四

川以后,风雨更加狂暴,对他的揭发批判愈演愈烈。他既是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四川省人大代表,回川以后,便参加省人民代表大会,在小组会上接受批判。省人大闭幕以后,省民盟整风领导小组接着又组织集中学习,成立几个“帮助组”帮助右派分子,第一组主要就是帮助潘大逵的。

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四川的右派群丑》一文,揭露批判了以潘大逵为首的“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群丑的言行。9月1日《人民日报》用大号黑体字通报:“章罗联盟四川分店——以潘大逵为首的右派阵营,在人民群众上下夹攻、内外会攻之下,已全线瓦解。”所谓“章罗联盟四川分店”便如是产生,潘大逵也被加上了这个分店头目的头衔,并据此被进一步追查批判。

潘大逵在接受追查批判中,感到就像他在北京揭发批判罗隆基一样,一些被批判中的右派,也把一些莫须有的、他自己一点都不知道的问题,强加在他的身上,而且性质更加严重,说得也更加具体。所谓“无形组织”,即是无中生有,所谓其中成员,有的并无联系接触,有的根本不认识。潘虽然也作了一些违心的假检讨,但他还不是那种干脆把问题包下来,对自己臭骂一通以争取“表现积极”而求得宽大处理的那种人。他已经是头面人物,不能将问题往下面的人身上推,

甚至强加给下属。他的交代检讨离揭发、批判的要求还很远,认为他避重就轻,躲躲闪闪,企图蒙混过关。一位帮助组召集人是从大学调来的政治课讲师盟员,指责潘大逵是“滚大案”的。省民盟整风领导小组专门开会帮助潘大逵,有一位负责人告诫潘说:“你的问题,论罪行是该‘敲沙罐’的了。”

所谓“滚案”,是指旧社会有的惯匪、惯盗,犯案被拘后搪塞抵赖,拒不认罪。被释放再度犯案被捕,仍旧搪塞抵赖,如是再三,称为“滚案”。潘大逵并非惯匪、惯盗,怎不深受侮辱。

所谓“敲沙罐”,是指用枪



1941年张澜69岁时摄于重庆

弹击碎头颅。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有些人戏称枪决反革命罪犯是将他们“敲沙罐”。这样的戏噱令潘大逵反感,且涉及“沙罐”,也不能不令他担忧危及生命。也许这个情况汇报到李政委那里去了,李在一次批判右派的会上对潘说:“不要怕,你的职务多嘛,党的政策要包下来,还要给你保留几个职位。”潘大逵这才吃了定心丸,感到李政委对他手下留情,有所照顾,相信可以免“敲沙罐”了。但对于“滚案”“敲沙罐”的告诫,他始终耿耿于怀,直到晚年还向我谈到过不止一次。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文化精神。事后多年,他对反右中曾经受到的批判和处分都不计较了,只有这两次有伤人格尊严的“告诫”难以忘怀,是可以理解的了。

划为右派的赵秘书长等机关干部,每天照常上班,但已不做机关工作,主要是监督劳动,包揽机关的卫生、种菜及其他杂事。潘大逵是省级上层人士,原来除了到机关主持会议,平时也不上班,有工作可以在家里做,干部有事汇报请示也到他家里去,被划为右派后没有参加机关的劳动。待到1958年“大跃进”热火朝天,有时还要加夜班,称为“夜战”,右派的劳动有所加强,潘大逵也被通知参加劳动了。任务是送肥,将城里阴沟的污泥掏出,用架子车运到西门外的农村去支农。安排解放前作经理时掩护过民盟同志的杨善辅拉中杠,解放前是中学老教务主任的杨达纲和潘大逵拉“飞蛾”。拉中杠的是主力,两边拉“飞蛾”的是助力。潘大逵虽然从清华到留学美国时起,打球、游泳、跳舞甚至骑马都在行,但却从未参加过生产劳动。现在突然要这位年满56岁的名教授参加既脏且累的送肥劳动,对他的家属和社会都有所震动。潘自信身体好,对劳动也有认识,但读初中一年级的儿子坚决要去代父拉车。拉出城后,杨善辅坚持要小潘回去,说明拉“飞蛾”不费劲,他们会照顾他父亲。小潘比较放心了,这才依依不舍一步一回头地含泪离去。送掉肥料回城时,杨善辅要潘坐上车去,潘也就顾不得脏了,随便垫一点什么,坐在送肥架子车的平板上,让二杨拉回来了。这也是他晚年不止一次向我们讲过的故事,大概是难忘二杨的真切关怀罢。

十年浩劫中,大右派潘大逵的工资多数被

扣,每月只按一家四口每人生活费15元的标准,外加书报费5元,共发65元,长达八年之久。妻子陈瑞璜量入为出,从不超出告借,其勤俭刻苦可想而知。待到苦尽甘来的日子在望时,她已心力交瘁,与世长辞。潘大逵伤心悲痛至极,晕倒在地。

爱国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历朝历代,多少年来,为了祖国和黎民百姓,他们外抗强敌,投笔从戎,内呈丹心,铮言直谏,不做假事,不说假话。然而不幸的1957年,他们的精神支柱被扭曲了,甚至被压碎了。40年代的著名民主教授潘大逵,面对反动军警特务的横飞枪弹,仍大义凛然,而今却作了一些违背良心的假检讨。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幸,更是祖国的不幸。

五、尾声

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以后,真正的春风舒缓而持久地吹起。1980年中共中央下发60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宣告对27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问题,经复查后有22人得到改正,潘大逵是其中之一。文件指出:“章罗同盟”(后称“章罗联盟”)“在组织上并不存在,在批判‘章罗同盟’时提的‘军师’‘谋士’‘代理人’‘骨干’‘分店’等组织性的帽子应予以取消,当年所谓‘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的组织性帽子,赵一明‘提出了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在雅安具体实施的方案’问题,也就一风吹了。赵一明和夫人以及雅安陈敦泮、朱仰东的右派问题,张联桢的中右问题,1980年已经改正。”

潘大逵不但恢复了过去的全部职务,还增加了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的新职和不少名誉头衔。他反思以往,面向未来,积极建言献策,据实铮言直谏,党内外对他都很尊重,亲切地尊称他“潘老”。他在省级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中,率先请退。1988年,民盟全省代表大会通过同意他不再担任民盟省委会主委职务的决议时,全场掌声雷动,久久不息。

(责任编辑 李 晨)

出版档案揭示的 《红岩》问世波折

● 卢 淼

《红岩》是部享誉国内外40多年的长篇小说,从问世以来,已经累计发行千万册以上。以小说为依据进行的文艺再创作,包括电影、电视、话剧、歌剧等,早已风靡全国,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红岩》及其所表现的历史场景、所描绘的故事和人物为几代国人耳熟能详,它以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和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把文学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道亮丽景观。

该书的出版单位——中国青年出版社从1957年4月《红旗飘飘》丛刊开始向作者约稿到1961年末问世,经历了从真人真事到艺术创作的阶段:一是1958年2月,在《红旗飘飘》第六期发表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二是1959年2月,出版了经补充、增订后的单行本《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三是1961年,从年初到年终,经过为期一年两易其稿、反复加工整理后的小说《红岩》出版。作者和编辑出版工作者打造出《红岩》这部传世之作。

革命传统教育催生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红岩》着力表现的是重庆解放前夕,我地下党开展武装革命和在渣滓洞监狱中进行斗争的历史。据作者之一、也是大屠杀幸存者的杨益言同志回忆,在渣滓洞被关押的时候,由于特殊的环境和革命者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当时他就想要是狱中会写作的老同志能把这些写出来就好了。但是在1949年重庆解放后,由于被囚禁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革命者大都被反动派杀害,他所认识的

些狱中会写作的老同志没有一个幸存下来的。后来,杨益言参加了烈士追悼会的筹备工作,接触了更多过去根本没有办法了解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事迹,这些使他加深了对集中营里曾经发生过的历史的理解。在烈士追悼会上,杨益言又碰到了同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刘德彬和罗广斌,这三人在追悼会结束以后,就被分配在重庆做青年工作,但正是这个工作,促使他们了解了更多的情况,迫使他们去思索、酝酿,最后终于拿起了笔。

在解放之初的镇反、抗美援朝的运动中,为了对青少年进行阶级教育,重庆团组织决定以牺牲在重庆集中营里的烈士的斗争事迹为题材,具体地进一步宣传。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都被指派为参加这一工作。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广大青少年对革命先烈的事迹反映强烈,热烈希望他们把烈士的事迹写出来。在1956年春,这三人就联名向组织提出了报告,希望把材料整理出来。中共重庆市委批准了这个报告,并给他们两个月时间进行这一工作。烈士狱中斗争的片段素材整理由此拉开了序幕。

1957年初,共青团四川省委决定在全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并通知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到成都、自贡等地作报告,青少年对这段历史的热情终于督促他们拿起笔,写了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1956年夏天,中国青年出版社为了编辑对青年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读物,在第二编辑室(即文学编辑室)里建立了传记文学组,并为此创办了一个新型刊物《红旗飘飘》。全组共张羽、黄伊和王扶三个人。到了1957年,在他们安排第二期稿件的时候,收到四川省长寿县的读者赵山林的一

封来信。信中反映了四川群众的意见：他们听了罗广斌同志介绍的解放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血录，受到很大的教育，希望中国青年出版社收集资料，通过写小说的形式出版发行，以便收到更好的效果。于是，由王扶向罗广斌约稿，请他写一篇“中美合作所血录”回忆录。

半年以后，收到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位作者根据报告整理而成的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这篇副题为《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难的烈士们》的回忆录，共分六节，即《魔窟》、《考验》、《意志的闪光》、《挺进报》、《望窗外已是新春》、《最后的时刻》。它以短短的1万多字的篇幅，揭露了蒋美反动派在重庆歌乐山下的“罪犯集中营”里犯下的血腥罪行，书写了一曲革命先烈奋勇斗争的悲壮诗篇。张羽在做了文字审定后，交付《红旗飘飘》第六期发表。

艺术创作中孕育出《禁锢的世界》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红岩》诞生的曲折过程，我专门拜访了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这位70多岁的老编辑对这本书的创作和编辑过程还保持着清晰的记忆。他回忆道：“在1957年底，我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回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时候，得知《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发表后，社会反映强烈，三位作者的生活素材还有很多，建议他们再把内容写长一些。不久，中国作家协会为迎接建国十周年，成立了文学作品出版规划小组，由邵荃麟和严文井同志负责。1958年7月，我从作协‘献礼’小组的一份简报中，发现四川的材料中有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作写的一部长篇作品《禁锢的世界》。回到机关，我便请肖也牧同志（原编辑室副主任，被错划为‘右派’，但当时仍在编辑室工作）给三位作者写了信，特别叮嘱他问清楚《禁锢的世界》是长篇小说还是长篇革命斗争回忆录。得悉不是《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材料充实、篇幅扩大，而是创作小说，我就把它列入‘献礼规划’中。”

1959年4月11日，张羽到重庆。得知罗广斌、杨益言已经从2月起，经重庆市委批准，得到了三个月的创作假，正在埋头创作，而刘德彬由于

在1957年鸣放中说过“错话”，1958年整风补课时，说他犯了“工团主义”的错误，刚受到留党查看的处分，马上准创作假不合适，就没有参加。在正式写作以后，罗、杨面临的创作愿望和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数不胜数。经过大半年的突击写作，废弃的稿页早已超过百万字以上，但是他们总是觉得结构不连贯，感觉少了点什么，又说不出。他们从这批稿页中选中了30多万字，作为初稿排印出来，送给青年出版社和有关方面征求意见。青年出版社决定由王维玲和江晓天先看。

王、江很快看完，认为作品的整体框架大致可以了，有一定的基础，只是通篇还显得比较粗糙，文章的思想内容、主题意旨上还需要深化，尤其是艺术上的提炼和人物个性的塑造，还要下较大的力气。这一稿的署名是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这样一直到1959年秋天才改完。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长篇小说已经来不及了，但是中青社仍将其作为重点书稿，加紧进行出版策划，并决定由出版社付款，请作者在重庆就地找印刷厂排印一批作为征求意见本。

第二稿的题目仍是《禁锢的世界》，作者还是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随后，就准备进行第三次修改。考虑到定稿前的编辑加工量较大，中青社请有多年编辑工作经验且赏析能力和文字工作水平较高的陈碧芳参加进来。在1960年初通知作者来北京交换意见。5月中旬杨、罗二人来到北京，住在炒豆胡同的团中央招待所，刘德彬没有同来。

谈到这里，江晓天老人停顿了一下，因为以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是他没有想到的。他因为在一封给安徽老家的信中提到了对当时家乡饿死人事情的不满，而遭到了持续五个月之久的批判。江老继续道：“当时（1960年6月），我遭到批判，但我还是以党性对事业的负责，强压抑个人情绪，认真仔细地谈了对《禁锢的世界》的总体评价和具体的修改意见。前后一共谈了六七次，每次半天。因为我几乎天天要接受批判。于是批判会上午开，我就下午谈；下午开，就上午谈。当时对于第二稿提出来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思想要深化，艺术要升华。所谓思想要深化，就是指整个小说的基调要斗志昂扬。不能把渣滓洞、白公馆写成从肉体到精神的‘禁锢世界’，认为书名不好，一定要换。所谓艺术要升华，就是要摆脱真人真事回忆录的痕迹，不

能局限于生活原型,合理的虚构是不可缺的创作手法,尤其是细节描写、人物的心灵世界、情感活动,作者在不违背总的历史真实和特定时代、环境中的生活逻辑下,可以自由创作。”好在两位作者都乐从江晓天的修改意见,这对提升《红岩》的主题思想和艺术水平自然是大有裨益。正是有像江晓天这样一批忠诚于文学事业和编辑业务的出版工作者《红岩》的创作和编辑工作才得以有条不紊和循序渐进,我们也从中体会到老一代编辑身上所具有的敬业精神和无私品格。

作者和编辑经年累月的协作中出版的《红岩》

1960年秋,中青社原五编室属于人物传记、回忆录的部分工作归入二编室,即文学编辑室。曾负责《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编辑工作的张羽返回二编室。《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发表后,他就和三位作者认识,经常有联系,也一直关心《禁锢的世界》的写作情况。因此,编辑室决定,由他担任《禁锢的世界》责任编辑,负责审读、修改、加工、定稿。

1961年1月15日,作者把重新构思、认真修改过的《禁锢的世界》第三次稿的第一部分寄到北京。第二、三部分的稿子也陆续寄来。张羽在审读后,先后写信和作者沟通,并希望罗广斌、杨益言来北京定稿。

3月7日,罗广斌和杨益言来到北京,修改作品。从3月8日到9日,编辑室同志和他俩接连开了两天的书稿讨论会。主客5人各自发表了意见。作者从重庆带来的名字和编辑室提出的名字一共有几十个,如:《地下长城》、《红岩朝霞》、《红岩巨浪》、《红岩破晓》、《激流》、《地下的烈火》、《嘉陵怒涛》等。其

中与红岩有关的就有好几个。于是最后一致商定,取名《红岩》。因为重庆的红岩村,曾经是党中央代表团住过的地方,是中共南方局所在地。取名《红岩》就意味着这本书的主题是揭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后方人民和蒋美反动派展开的一场错综复杂的殊死斗争。党的光辉指引着人民在各种困难下,艰苦奋斗,夺取胜利。而牺牲的烈士,就是他们的光荣代表。小说定名《红岩》,从宏观上说,对全稿起到了高屋建瓴、画龙点睛的作用。

从3月10日起,经过一百个昼夜的努力,小说第四稿的清样于6月19日全部送齐。至此,《红岩》的第一稿正式诞生。为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书稿质量,文学编辑室的有关同志又对小说进行了一次讨论。6月27日晚,罗广斌和杨益言带着小说清样,乘车回川,听取四川有关同志的意见。

6月29日晚,罗、杨到成都。马识途到车站迎接并几次和两位作者深入交谈,对稿件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意见。沙汀当时正在省委开会,也专门请了假,赶来看完了稿件。他们认为,这次修改得不错,加工一下就可以出版了,不必再拖延了。随后

罗广斌、杨益言在重庆、成都听取了不少意见,集中起来认为要修改的地方有:(1)开头要改写,使之成为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2)结尾两章要修改;(3)关于地下党活动要加强;(4)主要人物——许云峰、江雪琴应塑造得更加丰满;(5)叛徒的加强;(6)后两次“红旗”的改写;(7)加强全书人物之间、事件之间、章节之间的有机联系。他们同时请美协的李少言、牛文等同志集体创作了插图。

9月中旬,罗广斌和杨益言带着川渝两地众多同志的意见,再次来到北京,住在出版社宿舍,准备对书稿做最后一次修改。当时的责任编辑张羽为了便于和



80年代任中国文联研究室主任时的江晓天

他们交流情况,及时解决问题,也搬到他们的宿舍和他们一起工作。当时编作三人、三床、三桌,依次摆开,进行流水作业。每天晚上是最紧张的时刻。三盏台灯照着三张桌面上铺开的稿纸;三个人悄然无声,埋头写作。一般的情况是 杨益言先改出第一遍稿,交给罗广斌修改;罗广斌改定后再交张羽加工处理;张羽对稿件进行推敲、订正、删削或润饰后,再交罗、杨传阅;三个人都认可后,即作为定稿。等待发稿付排。每日每夜,三人都是通宵达旦,彻夜工作。直到天亮以后,才各自上床,蒙头睡觉。

第五次修改的重点,首先还是开头的一、二章。2万多字的原稿,经过一二周的时间,几乎是重新写过。张羽对其中那些堆砌式的材料又做了删节;对有新鲜感的补充篇幅做了加强,补充了几段文字。在第二章主要删掉了不符合学校斗争的描写和过分粗野或者过分暴露的描写。经过反复修改后,新的第二章充满着斗争的激情。通过对实际生活的描写,在解剖甫志高思想的变化上,也有了新的深度。罗广斌大量删掉了甫志高对陈松林的评论,删掉了大段带有重复性的交代。修改后,这一章节节奏紧凑,思想明快,生活面开阔了;对甫(上接57页)常被夸大“个人主义”“精神贵族”知识分子相对地说接触书本知识多,对世俗社会缺乏深切的了解,在行为方式上往往“书生气十足”“认死理儿”,有些人甚至不知天高地厚的喊出“从道不从君”“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也”之类的疯话,留给领导的印象:“十分狂妄”。知识分子的上述特点决定,碰到与领导有意见分歧,特别是重大问题的看法有分歧,那时便往往被“上纲上线”,当成敌对分子。在有了以思想划阶级的错误理论以后,知识分子顺理成章的被划为资产阶级,几乎统统成为革命的对象,并被赶出上层建筑的舞台,于是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的惨痛悲剧。

这里,我想讲一讲“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并不一致,如有的认为“‘一致’就是中央怎么想,我就怎么想;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有的一听有不同意见,就上纲为与中央不保持一致。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与中央保持一致呢?我认为,政治上保持一致,就是坚决拥护和贯彻党的基本路

志高的描写有了新的开掘,较以前深化了。

在最后两章定稿的时候,杨益言因有事情先回重庆,就只剩下罗广斌和张羽两人。在定稿的最后日子里,罗广斌和张羽交叉修改,一直到12月9日黎明,全卷改完为止。粗略估算一下,这一次的稿件除一般性修改的章节外,重新构思、重新写作的部分约有10万字,可见修改工程之大。

在1961年年终前《红岩》终于出版问世了。小说一出,洛阳纸贵。北京所有的宣传机构几乎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纷纷著文介绍,形成了开国以来少有的对一部小说进行宣传的热潮。全国各地出现了《红岩》热”。同时《红岩》的影响超出了文艺界,超越了国界,很快销售到越南、印尼、柬埔寨、缅甸、老挝、尼泊尔、斯里兰卡、日本、蒙古、联邦德国、瑞士、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古巴、巴西、委内瑞拉等国家。作为国内外广大读者认识旧中国黑暗政治、理解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红岩》所发挥的跨越时空的影响仍在我们这个时代延续着,今天的许多年轻人仍在它的影响下思考着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肯定是《红岩》的作者和出版者备感欣慰的。

(责任编辑 萧 徐)

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思想上保持一致,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思想路线。至于在若干具体问题上,领导与被领导,中央与一般党员,干部与群众,由于所处的地位、思想水平、了解情况等方面的差别,出现这样那样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能随便扣上“不一致”的帽子。

从认识论上说,全党的认识状况总是处于又一致又不一致,由不一致到一致的过程中。问题在于,大的政治行动必须坚决贯彻中央的决议,全党统一行动,努力使认识上的不一致,通过学习、讨论,逐渐达到或接近一致。有些认识上的不一致,应当允许其在行动上不违反决议的条件下,保留意见,通过实践去解决。我想,只有这样认识“与中央保持一致”,才能有助于创造一种更加民主的空气,调动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全党的凝聚力进一步提高,全党的工作日臻完善。

(2003/10/27)

(责任编辑 杜 晋)

闽西根据地 “社会民主党”冤案

● 王 勇

悲剧源于一句喊错的口号

1931年初,闽西的红十二军(注)召开了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列宁等共产国际领袖的大会。在当时,开会时振臂喊口号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全场与会者都会跟着喊,谁不喊谁就有问题。至于喊的什么口号,当时是不加思索的,只要有人领头喊。在这次会上,偏偏有一个战士高声领喊出一句口号:“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大家跟着喊完了,才有人发现这个口号有问题。这个喊错口号的战士叫吴拙哉。他根本不明白什么是第二国际,什么是第三国际,糊里糊涂地喊错了口号。

有人向在场的一团政委林海汀汇报吴拙哉喊了“反动口号”,林海汀认为这只是喊错了口号,没什么大惊小怪。那个人又跑到闽西苏维埃政府报告了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林一株立即率领肃反委员会的委员们到红十二军把吴拙哉和林海汀抓了起来,一共抓了十几个人。在肃反委员会的审讯室里,林一株摆出各种刑具对吴拙哉实施肉刑。开始,吴拙哉至死不招,林海汀也是坚强不屈,他们一口咬定,自己不知道什么是社会民主党,什么是卢森堡,什么是李卜克内西,至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是什么组织更不清楚。但是,几天几夜的严刑拷打,使林海汀等十几个人死去活来,林海汀和吴拙哉两人为首犯,为了活命,两人就屈打成招了,并且把罪责加在了已被

开除党籍的傅柏翠身上,说傅柏翠是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自己是宣传部长。他们往自己身上加罪,只求速死。

有了特委书记,又有了宣传部长,肯定还有其他委员。继续严刑拷打林海汀和吴拙哉等人,于是在苏区工作的许多干部们都被他俩封了职位,还供认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主张是二五减租、劳资仲裁、开国民会议。”

林一株以肃反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出裁字第一号、第二号通告,号召各级政府集中火力进行“肃清社会民主党”工作。3月1日,在虎冈召开了“闽西工农审判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分子代表大会”,林海汀等17名主犯被判处死刑。“肃清社会民主党”冤案就这样发展为闽西的一场运动。

枪毙了林海汀等17名所谓“社会民主党”,算是运动的第一阶段,也是更大运动的开端。在这第一阶段中,尽管肃反声势造得很大,但由于闽西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之类的“反党派别”,株连的人不算太多,只涉及到红十二军中少数几个青年战士。闽西苏维埃政府还比较慎重,枪杀林海汀等人也上报了福建省委。福建省委正好接到四中全会决议案,于是接着就作出了《对四中全会与党内斗争问题的决议案》,派人到闽西直接领导,才把“肃清社会民主党”冤案向纵深发展下去。这场冤案的性质之所以极为恶劣,就在于使用了残酷的逼供信,这就为后来招供出60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人打开了

方便之门。

肃反扩大化，直至滥杀无辜

为什么会发生这场“肃清社会民主党”的运动？这和当时的王明“左”倾路线有关。

早在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时期，福建省委个别人强令新组建的红十二军远离闽西苏区，去攻打广东东江地区，结果遇到广东军阀余汉谋顽强的抵抗。红十二军在战略战术上采取死打硬拼，招致仗仗皆败。部队越打越少，战士大批逃跑。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国民党闽南漳州的张贞和广东的香翰屏从南部杀来，闽西苏区首府龙岩很快失守，地主还乡团在苏区骚扰破坏，企图全面颠覆苏维埃政权，闽西形势日趋紧张。

正在此时，邓发来到闽西。他是来苏区传达六届三中全会反立三路线决议的。六届三中全会是受共产国际指令专门解决李立三盲动路线的，然而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错在哪里，为什么是“左”倾，根源是什么，中央并没有做任何解释，甚至说李立三并不是“左”倾，而是“消极的右倾”，故三中全会号称反李立三路线，实质则完全相反，派往各地传达三中全会的代表们本身都是立三路线的拥护者，邓发就是其中之一。邓发到闽西后，不去从根本上纠正李立三“左”倾的影响，而是用比李立三更“左”的眼光和观点看待闽西苏区。他来闽西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下令开除了傅柏翠的党籍。

傅柏翠是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在1928年曾经领导过闽西蛟洋暴动，在创建闽西根据地斗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称得上是老资格的红军根据地创始人。在执行中央各项政策过程中，他与中共闽西特委发生了矛盾。邓发不问青红皂白，不分是非曲直，给傅柏翠安上“右倾”的“社会民主党”的帽子，开除了党籍。

邓发巡视闽西根据地各个机关后，主观地认为“有些地方的苏维埃甚至被富农、流氓和反动政治派别的反革命分子混迹其间，从中把持苏维埃的工作。”

邓发到部队去，认为红十二军“军纪废弛，战斗力很弱，在龙岩战斗时，和敌人一遭遇就垮下来，乱得一塌糊涂。”他不去分析部队为什么没有战斗力，而是主观臆断地说闽西没有真正的工农红军。

苏维埃政府被“富农、流氓和反动分子”把持着，军队又无战斗力。邓发认为有必要对闽西红军和苏维埃来一番彻底改造，“建立真正的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正是由于邓发此种思想认识，所以他机械盲目地照搬共产国际要中国党开展对社会民主党及资产阶级派别斗争的指示，一场拥护共产国际指示和路线的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不可避免拉开了帷幕。

1931年4月4日，中央代表团进入闽西苏区，带来了六届四中全会对闽粤特委的指示信。信中说：“敌人积极从各方面来向苏区红军进攻，普遍的白色恐怖，积极地打入党的组织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闽西的社会民主党，江西的



闽西龙岩根据地

‘AB团’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必须肃清内部的红军中、政府中、党部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站在阶级立场上用最严厉的手段镇压”。

中央的指示很明显:“对一切反革命分子,站在阶级立场上,用最严厉的手段镇压”,这就等于大开杀戒。闽粤特委随即召开各种会议,在土地革命、军事斗争和肃反等方面实行比立三路线更加“左”倾的方针政策,提出“整个地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富农”等口号。

各地方为执行命令,立刻行动起来,先杀闽西区域内的地主、富农,然后又捕杀准备和已经逃亡的一部分小商人、小业主、小资本家。真可以说是站在了阶级立场上。

对此中央还不满意,仅凭一些不真实的报告否定了肃反方针,说他们右了;“左”得不够。说闽西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时期:“社会民主党”等反动派别已经普遍地打入党内和红军内,闽西苏区目前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必须“对一切消沉、悲观、失望、逃跑等等的观念给予无情的打击”。

中共中央这封指示信错误地将党内所谓“右倾”分子与反动派别混淆在一起作为打击和清洗对象,扩大了肃反的打击面,加剧了苏区的混乱。

虎冈枪杀林海汀等17人,给后来的“肃社民党”运动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各区各乡的苏维埃政府纷纷仿效,层层召开审判大会,滥加杀戮,造成令人恐怖的气氛。且看下面的新花样:

十毫子运动:毫子是指当时苏区通用货币,谁拥有了十个毫子,谁就是土豪劣绅,杀之;

食烟大同盟:几个人在一起互相递支香烟,对对火,说说话,那就是参加了以食烟为接头暗号的反动组织,杀之;

姑娘姐妹团:年轻姑娘在一起形影不离,说说笑笑,更有亲密者曾拜干姐妹的,杀之;

恋爱团:一男一女通过搞恋爱,想组织社会民主党,甚至男女之间互相交谈说了些话,也被当作“恋爱团”,杀之;

膳食委员会:整天讲吃喝,聚在一起研究今天中午晚上吃什么,无论男女,杀之;

……

就这样,不仅错杀了根本无中生有、想当然的“组织”现象和大批无辜群众,而且还把人们普通生活中正常的自由交往当作“社会民主党”行为,将当事人杀掉。至于根据逼供信屈打成招出来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更是残酷地屠杀。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错误或者表现不好、或者有过落后情绪和行为的更是无一幸免。在他们报功的记录上写道:“这些分子,虽然不是社党分子,但实质上是社党的表现,是社党发展的对象。”为绝后患,也被杀掉。还有一些犯了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也成了肃反的对象。对于一些出身阶级成份不好的革命同志,也根据“地富子弟,在斗争中必然会背叛革命”的荒谬逻辑,进行了清洗。

在屠杀之前,肉体刑罚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单凭肉刑罗织口供,肉体消灭”的政策。在肃社党高峰期间,全苏区党政军机关和一切团体都投入运动,没有侦察立案,没有调查研究;“以捕人最多处决人最快为坚决”。有的肃反委员竟然亲手处决人。法律又回归到封建社会时代,公开恢复苏区曾禁止的肉刑:杀头、老虎凳。

红十二军是闽西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由于四中全会点名要在红军挖出社会民主党分子,于是红十二军更不能幸免。连以上干部半数被处决,有的连队刚刚上任两天的连长也被处决。有的连队换了四次干部。

群众之间,也不能幸免,受到株连的家属更是无计其数。总之到处都是社民党。

全闽西苏区专心一项工作——肃反,形成了闽西的“肃反中心论”,在这“肃反中心论”的指导下,造成人人自危,干部和群众强烈不满和极端恐慌的现象,各地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反抗高潮。

“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垮台!”

1931年5月27日,杭武县三区第三大队长李真和副政委张纯铭,为反对上级胡乱抓人,为保护自己,营救已被指控为“社会民主党”分子而关押在区苏维埃审讯室的区委书记何登南等200多名干部群众,率领第三大队包围了区苏维埃政府,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后,救出了被捕人

员。这一事变当即被宣判为“反革命暴动”，受到红十二军围剿。李真、何登南、张纯铭等第三大队和被释放人员在大军追剿下被枪杀或重新逮捕后处决，几百人尸体示众后掩埋。杭武县第二区、虎团、滨南等地，也发生过反抗，但都遭到红十二军镇压。

但是，始终没被镇压下去的有一支队伍，就是傅柏翠。傅柏翠作为闽西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与张鼎丞、谭震林等一起战斗过。他被闽西特委告状后，邓发开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紧接着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来临，他成了“社会民主党”的特委书记，肯定是在镇压之列。他出于保护自己，利用在苏区人民中间的威信，毅然决然地拿起武器反抗肃反。响应者与日剧增，那些害怕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被打成“社会民主党”的人们拥戴傅柏翠上了山。他公然打出旗号：“欢迎社民党到这里来。”

他占据山林，垒墙筑壁，建立城堡，与闽西根据地对着干。红十二军派兵进行围攻，攻了几次都不能拿下傅柏翠的“城堡”。后来，肃反停了下来，他也未能归队。

红军长征走后，各地都有红军游击队活动，但他都井水不犯河水。国民党几次“清剿”都没有把他搞掉。抗日战争时期，他的部队被改编为保安队，接受了国民党的指挥，但就是不下山，国民党也无可奈何。

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大举进山追剿，傅柏翠率部起义。解放后，傅柏翠担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1985年5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发出通知，为傅柏翠平反，推翻其所谓“社会民主党领袖”的不实之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反抗肃社民党的干部群众都被当作“社会民主党”加以消灭。错误的“肃社党”运动给闽西党造成严重的损失，大批干部群

众蒙冤受难，红军元气大伤。闽西苏维埃执委35名中被肃掉了一半，闽西近6300人被错杀。闽西党组织的党员人数由8000人减到5000人。共青团组织受到的破坏更加严重，全苏区30个区委，一年后全部瘫痪。

到最后，林一株和杨全康等人竟然把“社会民主党”的罪名扣在闽西苏维埃主席张鼎丞头上，组织部长罗明也被怀疑。

邓发发现闽西因“肃社党”竟然把苏区肃得满目萧条，到处都是喊冤哭骂声，不得不承认肃反严重地扩大化了。为了恢复闽西正常的革命活动，必须采取措施转变这一严重局势。鉴于林一株为主席的肃反队伍在人们心中留下的仇恨，闽西苏维埃政府决定撤销这一机构，另行成立以郭滴人为处长的政治保卫处，林一株降为副处长。这根本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闽西党政机关并未真正认识到肃反的错误，致使这一运动还在发展。

张鼎丞、罗明、郭滴人留守上杭，根据群众控告，认为林一株、杨全康等人利用肃反大权滥杀无辜，为非作歹，便以“社会民主党人”的同样罪名于1931年9月把林一株等人枪毙。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临时革命政府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郭滴人、张鼎丞向毛泽东主席和苏区中央局任弼时汇报了闽西肃反的错误做法和严重后果。毛泽东非常气愤地说：“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垮台。”决定立刻停止“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平反冤案、错案，并给了5000多银元作为善后救济费。

由于周恩来的到来，使闽西还在发展的肃反运动得以制止。周恩来针对中央苏区反“AB团”和闽西“肃社党”运动造成的损失，严厉批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指导



张鼎丞

方针的错误,基本上刹住了这股歪风。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经粤东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他于12月中旬到达闽西后,沿途目睹了“肃社党”运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于18日致信中共中央,报告闽西的情况。周恩来说:“闽西解决社党所得的恶果非常严重”;“他们处理方法之错误,如中央历次所指示的殆过之无不及。”周恩来给中央的信,为进一步改正“肃社党”运动的错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月后,中央专门就肃反问题给闽粤赣省委以指示,让他们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改正思想上的错误。

闽西特委在中共中央、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的强令干涉下,下决心改正错误,停止“肃社党”运动,并在后来的工农大会上对过去一年来大规模“肃社党”的重大错误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总结了沉痛的教训,从而基本结束了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肃社党”运动。

由于当时正处在王明“左”倾路线开始时期,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和闽赣省委、闽西特委虽然结束了这场残酷的运动,但却认为“肃社党”是必要的,其错误主要是方针政策、方式方法上的错误,根本没有认识到这是一场天大的冤案,应该从根本上加以推翻。

延安整风期间,邓发通过清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左”倾路线的危害时,认识到“肃社党”运动的错误根源和危害,否定了这一错误运动。由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此案牵连人物十分广泛复杂,虽提出过要平反,但没法落实。

1985年第5期《党史通讯》发表了《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的文章。文章中说:“经调查核实,福建省委认为,闽



郭滴人

助。

按照已平反昭雪两次合计,人数为6352人。6000多人被错杀,这是多么大的数字!如果论及这一冤案对革命造成的损失,那教训就更为惨痛了。

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们党的历史上发生过多‘左’祸,但愿我们能永远记住这些历史教训,记住小平同志这段话!

(注:红十二军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地方红军,1930年6月红一军团成立时,红十二军改编为红四军第三纵队。之后闽西地区又组建了地方部队,番号仍为红十二军,一般后人称为新十二军。本文中的红十二军是指新十二军。)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从战士到贱民的奇特经历

——直言获罪(二)

● 徐 孔

1957年5月上旬,我轮换回到北京军区宣传部,分配到宣传科。按当时的通例,回国以后有一段假期,假期长短由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自定。

当时我心境很好。仗打完了,国内一派升平景象,经济建设蒸蒸日上,文艺创作也很繁荣。文学系的一些同学像徐光耀、鲁煤、陈淼、黎白、以至二班同学鲁芝都写出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我也应该尽力争取条件,把反映朝鲜战争的长篇小说写完。

我向杨成武司令员提出请创作假的要求,得到了批准。在黎白的安排下,把我借调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并和创作室的几个作家一起,住到北戴河进行创作。

时间不久,反右斗争全面展开。报纸上一篇篇社论和批判文章义正辞严,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种种言行触目惊心。创作室的几个作家奉召回京参加运动,我因不是创作室在编人员,仍留在北戴河,但我有些写不下去了。那时候我的政治热情很高,虽然在刚过去的肃反运动中挨过整,而且整得不轻,但政治热情仍然不减。我希望利用现在的好的条件把小说写完,但总不该只埋头写作,对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反右运动的大事置身事外啊。我给黎白写信,问我该怎么办,是不是回去参加运动。黎白回信要我安下心写小说,不接到通知不要回来。黎白当然比我更了解情况。我继续住在北戴河写小说,心里总是不踏实。

过了20多天,接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的通知,要我返京。我和黎白一起去找创作室主任虞棘,虞棘告诉我,军区通知,要我回军区参加运

动。我马上到军区宣传部报到,宣传部办公室告诉我,到文化部参加运动。

我很奇怪,我编制在宣传部,为什么到文化部参加运动?答复是:这是部长们商定的。我想可能因为我在文艺界熟人较多,自己又正在写作吧。

我只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到文化部文艺科办公室参加小组会。小组会正在揭发批判一个姓鲁的大尉助理员,看样子是重点对象,人们的发言挺激烈。我对这位助理员的情况一无所知,开头的两天只能坐在一边听。几天以后,一言不发总不好,对他自己交待的言论批判几句,基本上是旁听。

会议休息期间,文艺科的人常常谈论一些北京文艺界和作家协会反右斗争的情况。我最关心北京的一些同学和老师的情况,就给在作家协会工作的李兴华打个电话,问陈企霞和他的情况。李兴华说:前两年定的丁、陈反党集团问题,中央已经复查纠正。可是反右运动一来,丁、陈又成了批判的重点。作协叫他揭发陈企霞,陈企霞是老师,给学生们讲的都是正面的道理,他没有听到陈企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没有什么可以揭发的。他们的领导韦君宜对他比较了解,没有对他穷追不舍”。他没想到的是,陈企霞自己交待了和周延珩居的问题。

我听了以后,感到非常惊讶。在我的印象里,陈企霞一向作风严肃、正派,对学生要求严格,甚至有些严厉,他怎么会和自己的学生做出这种事?周延原是西南联大毕业的,1945年到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学习,我们是同班,戴着一付高度近视眼镜,作风稳重,她年岁较大,对我们这

些年轻些的同学像大姐姐一样和善而关切。周延并不是轻浮的女人呀。我这个人对男女关系问题有很重的传统观念,觉得师生之间发生这种事情实在有伤风化。可是陈企霞是左联时期的老党员,生活腐化,政治上还是久经考验的。所以就对李兴华说:“陈企霞和周延的事实在不像话。不过,就像一个苹果,烂了一块,不等于整个苹果都烂了。”李兴华同意我的看法,说:“文艺界的名人有风流韵事的不只陈企霞一个”。

我担心文艺界同学和老师的情况,一点也没有考虑自己的问题。因为,鸣放期间我埋头于写东西,一句话也没有鸣放。从朝鲜回国到军区宣传部报到,一天班没上,请准创作假就到了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到创作室以后,各写各的东西,我又大部分时间住在北戴河,和大家很少接触。可以说,从鸣放到反右,我是圈子以外的人,别人想反我,也没有什么可反的。我丝毫也没有意识到,此时此刻,反右利剑已经悬在我的头上了。

10月上旬,我参加军区文化部反右会议大约两周后的一天,主持会议的文化科王科长对我说:“你准备一下,明天你在会上谈谈自己的情况。每个人在反右运动中都应该有所提高。另外,你在文艺界的老师、同学、熟人较多,谈谈和他们的关系。”

第二天参加会议的时候,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这里是文化部的会议,可是今天文化部参加会议的只有两个人,除了原来主持会议的王科长,还有一个上尉助理员。其余的全部是肃反运动中批斗我的二十兵团宣传部的原班人马,只有回国后分配到外地的郭游等人不在,其余的全来了,而且仍是韩部长坐阵指挥。形式是文化科的王科长主持会议,实际和肃反时一样仍然是张山根据韩部长的授意在操作。

我心里明白,这是肃反运动的继续,可是现在形势和肃反运动中大不相同。肃反需要有组织、有行动,需要真凭实据,而反右根据几句话、甚至一句话不说,单凭思想也可以定性。思想是抽象的东西,说的话可塑性也很大,多增两个字减两个字,甚至加个顿号就可以改变原来的意思。掌握权力者是决定因素。肃反运动中整了我好几个月,没整出问题,韩部长被迫向我道歉,憋了一肚子火,这次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我。

我感到压力很大,但并不害怕。我自己最了解自己的思想。我对党是忠诚的,从未做过,也从未想过做对党不利的事情。

对我的批判持续的时间很长。我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总认为不深刻,没有检查出思想本质,没有交待出重要问题。

当时追问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和陈企霞的关系;二是攻击肃反;三是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和陈企霞的关系似乎是重中之重,追问的最多。认为我是陈企霞的得意门生,文学系一班那么多学生,为什么陈企霞只把你们7个人留在文学戏剧创作组?难道不能说明你和陈企霞的师生关系不同一般吗?你到朝鲜以后,陈企霞还按月给你寄《文艺报》,为什么他在北京还想着你这个远在千里之外朝鲜战场的学生,难道不能说明陈企霞对你的特殊关爱吗?在全国文艺界愤怒批判陈企霞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时,你竟说陈企霞“就像一个苹果,烂了一块,不等于整个苹果都烂了”,公然替他辩护。难道不能说明你们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相同吗?等等,等等。追问的问题很多,不能说追问者都是捕风捉影,但多是逻辑推理,并没有揭发出具体的“罪行”。

批判我的人,对我和陈企霞的关系并不了解。文学系毕业以后把我留在创作组。抗美援朝期间《文艺报》聘我为通讯员,给我寄刊物,都是事实,但这两件事不一定是陈企霞决定的。我和陈企霞的关系,简单地说,我尊敬这位老师,但感情上并不亲近。当然,首先是尊敬,觉得他知识渊博,政策水平很高,佩服他。1945年我入文学系不久,在一次时事讨论会上,我在发言中提到苏联红军在鞍山和沈阳抢老百姓的东西,奸污妇女的事情。在场的大多是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苏联红军在他们的心目中一向是革命的化身,崇拜的偶像,听了我的发言,都认为我是造谣,诬蔑红军就是诬蔑革命,向我展开猛烈的攻击。我则坚持说,这是我亲眼所见。我没有说红军都不好,大多数对老百姓很友善,但有的确实很粗野,纪律很差,老百姓,特别是青年妇女听说红军来了就逃就躲,影响很不好。大家仍然不信,说少数的也不可能,红军是革命的军队,不可能侵犯群众的利益。我这个人很倔,不知道的事情不说,亲眼

所见的事情绝不改口。双方争得很激烈。

后来陈企霞到会上做了总结,他说:“什么事情都有个别现象。个别不能代替整体。个别红军违犯军纪是可能的,不能因此就影响对整个红军的看法,徐孔在发言中也说了,大多数红军对老百姓是友善的,这是红军的主流。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人民利益的保卫者,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

这是我入文学系以后第一次听陈企霞讲话,觉得他讲得很全面很深刻,不是用空洞的道理训斥人,而是用事实的分析说服人。对他很佩服。

在以后的教学和文学系的领导工作中,陈企霞都显示出卓越才能,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我对他始终很敬重,为什么在感情上和他并不亲近呢?这可能和我的个性有关。我这个人,对合得来的人,推心置腹,无话不说;对合不来的人很少接触,尤其对上边的人,从不高攀,对老师也不例外。我总觉得陈企霞的面孔很冷,对人态度傲慢,和他说话受拘束。不像文学系另一位老师萧殷那样和善,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所以,学习上有疑难问题,我就找萧殷或严辰,谈思想问题找熊韬,很少去找陈企霞。

尊重不等于感情上亲近。我调到部队工作以后,没有给陈企霞写过一封信。1950年我调到北京军区以后,曾到《文艺报》编辑部去过一次,当时陈企霞和萧殷都在《文艺报》当主编,我不是去看陈企霞,是找萧殷。我写的一篇短篇小说,萧殷在他主编的《光明日报》文艺副刊上给发表了,给我写信说,这个短篇写得不错,尤其是语言,活泼、有特色,有可读性,但主题的发掘不够深刻,叫我有时间到他那里当面谈谈短篇的写作问题。我很高兴,接到信以后,马上就到位于东总布胡同的《文艺报》编辑部去找萧殷,萧殷很热情,从分析我那个短篇开始,谈起短篇小说的立意、结构、人物塑造,特别是人物语言的性格化问题,谈了很多。陈企霞和萧殷在一起办公,我见到了陈企霞,但只握手问候一声,没有说什么话。

1955年我从朝鲜回国休假的时候,丁陈反党集团问题经中央复查,对陈企霞已解除监管,他住在《文艺学习》的办公楼里。李兴华对我说,企霞近来心情不好,你最好去看看他。我敬重陈企霞,当然也关心他。但我们多年不通音讯,见面

时很不好讲话。就请李兴华陪我一起去。李兴华和陈企霞的关系较好,有他在场,可以使两个人见面时不致尴尬。见到陈企霞的时候,他果然情绪低沉,脸上阴云密布,很少讲话,不停地大口吸烟。我向他问好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脸上露出一丝灿烂的笑容,但很快又晴转阴。他只简单地问了几句我在朝鲜工作的情况,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大部分时间是吸烟。我对他的问题,文艺界上层的斗争,不便发问,只希望他保重身体,至多不过五分钟,我和李兴华就告辞了。

在批判我的过程中,我知道曾几次派人到作协和有关单位调查我和陈企霞的关系,大概都没有什么收获,所以才盯住几个问题死追硬逼。当时批斗的人们引用最多的是我说的“就像一个苹果,烂了一块,不等于整个苹果都烂了”那句话,用尽讽刺、挖苦甚至侮辱的词汇,企图从这里寻求突破,其实那只是我根据自己的了解说出对陈企霞的看法,并没什么“丰富”的内涵,批来斗去,除了我自己讲的,并没有找到新的“罪行”。

批斗的第二个重点是攻击肃反的问题,参加会议多数是肃反运动中参加批斗我的人,火力特别猛烈,但揭批的内容就是我在肃反当中对某些人某些作法提出的意见,加以“充实”、分析,扣上可怕的大帽子,揭不出新的罪行,军区文化部参加会议的两个人始终没有发言。会议温度虽高,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倒是关于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的批斗和争论耗用了不少的时间。

1949年解放战争基本结束以后,好几次对我的鉴定里都有一条:不安心本职工作,要求从事文艺创作,有个人主义的成名成家思想。对于这一条我思想上始终搞不通。我是学文学的,毕业以后,希望从事我学习的专业——文学工作,可是1948年前方需要随军记者,我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分配,而且努力工作,兵团领导是满意的,杨成武曾对政治部的负责人说:“徐孔这个记者成绩不错,小有名气嘛。”1949年兵团部进驻天津以后,我曾向宣传部长沈图提出,希望把我调到文艺科。沈部长说:“新闻报道更需要人。”我又无条件地服从了。朝鲜战争期间,我作为东线记者组的记者,冒烟突火在枪林弹雨中深入第一线采访,因为成绩好,获得军功章。朝鲜停战以后,我又向兵团政治部副主任丁莱夫提出,希望

到文化科工作。丁主任说《工作通讯》的主编秦江调走了,找不到合适的人代替,决定你到《工作通讯》去主编这个刊物。我又服从了。我觉得一个人总会有自己的志愿,这并不是什么错误,关键是当个人志愿和革命需要相矛盾时采取什么态度,在我都是无条件地服从了工作的需要,我错在哪里呢?说我愿意搞文学就是想成名成家,也不是事实,当记者不是同样可以出名吗,而且可能出名更快,我不愿当记者愿意从事文学写作,和我学习的专业有关。也和我的性格的缺陷有关。当记者需要有广泛的社会活动,而我的生活圈子比较狭窄,很多人我不愿接触,我当了多年记者,接触的面并不宽广。搞文学写作也需要广博的知识,但更需要深入某一个生活领域,熟悉这个领域的人和事,才能更深刻更本质地展现这个领域的生活,写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这可能更适合于我。我愿从事文学写作,主要出于个人兴趣,并未想到成名成家,我知道自己的水平,不过是文学战线的一名小兵,离成名成家还远得很。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期间,我和文学系同学陈森都在大会秘书科工作,陈森当时是丁玲的秘书,他提议我把近几年写的战地通讯和短篇小说、散文搜集起来,选择一下,由他拿给出版社出个选集。我说:“我那些粗制滥造的东西,够不上出选集的水平,不必浪费纸张。”我并未想到出书扬名。而且,想成名成家的也并不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名”和“家”本身并不具有阶级属性,并不是资产阶级所专有。关键是你写作的出发点——为什么写、怎样写。如果你写的是人民大众,写得很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因而出了名,成了家,那是人民的作家,有什么不好呢?资产阶级有名人、名家,革命队伍里也有很多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美术家、音乐家,军、政、文化、教育各界有很多声望卓著的名人。所以不能说想成名成家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我这些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认为我是“诡辩”,是“有意地混淆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用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做党的驯服工具”的理论批判我,说:“你表面上服从了

工作需要,服从了组织决定,可是内心顽固地坚持搞文学写作的愿望,其实质就是用服从工作的外衣,掩盖你搞文学写作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小王国。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自觉自愿地做党的驯服工具,党的需要就是个人的需要,党的意志就是个人的意志,决不能三心二意,更不能表里不一。党需要你搞新闻报道,搞编辑工作,而你坚持想搞文学写作,这种和党的需要相对立的志愿难道是无产阶级的吗?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的思想无不打着阶级的烙印,和党的需要相对立的“志愿”,是个人主义的志愿,个人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在批判会上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则,批判者的意见即使是错的也是对的,没有人更正,更不许被批判者反驳。被批判者的意见即使是对的也是错的,只要批判者认为你的意见不对,你就得老老实实地接受批判。

当时我非常苦恼,我知道的想到的问题全都交待了,很多我不同意的意见不容我申辩,会议持续了一个多月,总也过不了关。文化部的反右会议,几乎成了我这个“外来户”的专场。这是怎么回事儿,如何了结呢?



反右前夕,作者和夫人合影

我很想找个熟悉的人谈谈我的苦恼,能给我一些点拨。可是几个要好的同学黎白、李兴华、徐光耀、陈森等都牵扯到了、陈的问题,不能联系;北京军区的人我不熟悉;二十兵团轮换回国的一些人,因为我回国后一直没上班,不知他们分配在哪个单位;兵团宣传部的几个人正在批判我,无法和他们谈。想来想去,想到了参加会议的军区文化部的王科长。我初到文化部参加反右会议的时候,王科长是会议主持人。转入批判我以后,王仍是主持人。可能因为他对我的情况不了解,参加批判我的主要是原二十兵团宣传部的人,带领这些人的是张山,又有韩部长坐阵指挥,实际上批判我的会议是由张山主持。王科长很少说话,偶尔发表一些意见,也是以理服人,从不乱扣帽子,我觉得这个人看问题比较公正,对我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决定找他谈谈自己的苦恼,听听他的意见。

王科长静静地听我说完以后,说道:“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你的情况我不了解,很难提出具体的帮助意见。我想,你是否把思路放宽些,不仅要你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也想想内心里曾经想过些什么。人总是有思想的,知识分子思想更复杂些。对自己的前途、事业、家庭、个人生活等等,都会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有的是对的,有的是不对的或不健康的,通过运动清除那些不对或不健康的思想,也是提高,可以避免以后犯错误”。

王科长的话开阔了我的思路。回去以后我就回想自己曾经有的思想活动。我这个人思想比较简单,特别是长期处在战争环境里,很少想到理想、前途等比较遥远的东西。对家庭的事倒是想过,我爱人已转业到湖南工作,有了小孩,两下里相距几千里,总不能长期过牛郎织女的生活。军区已同意把她调到北京,我希望尽快安个家,最好能分配给我两间房,一间住人,一间可以供我写作用。至于家具,我没有多少钱,也不懂得购置什么样的摆设,我想使用公家的床铺、桌子、凳子就行了。倒是我用于写作的那间房,能买个便于放置资料和手稿的写字台,再买个书架。我不喜色彩艳丽的东西,写字台和书架最好是米黄色的,陆续买一批名著,写作之余,欣赏一些文学名著,真是惬意的生活。

我说出这些想法,实在出于无奈,两个多月了,总也过不了关。交待不出大的问题,小的问题上尽力想些新情况,像王科长说的,把思路放宽些,把内心活动都摆出来,供大家更深刻更具体地了解自己。

我这次检查理所当然地又遭到了迎头猛击。说我在“写小说”,把自己描写成置身世外的文人雅士。在阶级社会里从没有超阶级的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就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你不是不关心政治,关心得很,而且政治嗅觉敏锐得很,反右运动刚刚开始,你就到杨司令员那里钻了个空子,请了创作假,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时候,你悠然地在海滨散步,心里高兴得很,你错估了人民的觉悟和力量。

这可是天大的冤枉,我找杨司令员请创作假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反右这回事!可是不容我把情况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说:“你不要诡辩,别人不是傻子,你心里想的什么,做了什么,你心里明白,我们也明白,你再别想蒙混过关。”

就连我想买米黄色的写字台和书架的事也成了讽刺、批判的资料,说了很多刺耳的话。

我越来越清楚了,不论我怎样检查也过不了关,因为我还没有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确实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绝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给自己乱扣帽子。

1958年春节是我有生以来过的最烦闷、最痛苦的一个春节。满城张灯结彩,爆竹声声;家家欢声笑语,喜迎新春。我一个人闷在屋子里,无亲友可访,也没有心情看文工团的演出,只有看书,却又看不下去。烟卷成了我消烦解闷的惟一伙伴,吸了一支又一支,一天功夫差不多吸了两盒。

人人都在喜迎新的春天。新的春天带给我的将是什么呢?

肃反中因“挽救”我不成被迫向我道歉的领导,反右中终于把我“挽救”成右派

春节过后的批判会出现了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张山发言了。张山是批判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和在肃反运动中态度一样,每次开会只

记录别人的发言,自己却从未发过言。现在他率先发言了。他笑着(别人是严肃甚至于是严厉的)对我说:“徐孔同志,大概你是担心把你打成右派吧,老是不敢大胆地交待问题。谁也没有说你是右派。你应该打消顾虑,敞开思想把自己的问题交待出来”。接着他就系统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几个“可是”下边做的文章。他说:“我和徐孔同志相处当中,发现徐孔同志身上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学习。徐孔同志在战争中很勇敢,可以说在枪林弹雨中从不畏缩。可是你自己说过‘朝鲜战争比国内战争更残酷、更激烈,也就有更丰富的创作素材。这是你真实的思想,你参加朝鲜战争是为写出成名的作品,在你勇敢表现后面隐藏着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思想’;还有,徐孔同志性格直爽,说话坦率,可是你说的话很多是对领导的不满,对工作不满的,你那些坦率的话正是你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观点的自然流露,说明你的立场、你的观点本质上和党的领导和革命工作的需要是对立的……”可是,文章总有七、八条,根据这七、八条,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且是善于伪装的深藏不露的右派分子。

我当时真是目瞪口呆。我没有想到张山这篇“可是”文章做得这么“精彩”。肃反以后,饮酒当中他推心置腹坦露的心迹,言犹在耳。可是今天竟变成这个样子!我一向以为张山并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他有自己的独立思维,也有做人的良知,只不过注意观察形势,注意保护自己就是了。可是从今天这篇“可是”文章看,我对张山的理解太肤浅了。张山不但善于领会领导意图,而且善于掌握战机,挽弓待发,一箭中的。不但善于消灭敌人,而且善于在消灭敌人当中保存自己。在“可是”文章里,他引证的全是别人的话或者我和别人说的话,他和我在饮酒当中说的那些掏心窝的话,一句也没露。尽管那些话没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但用反右中的技巧略加整理就可以构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即使是我讲的,他也脱不了干系,所以干脆不露,难道这才是真实的张山?

下一次批判会就直截了当地给我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一次韩部长亲

自出阵了,他说:“我们一直没有说你是右派分子,并不是你罪行不够右派分子,是给你留有时间,叫你自己坦白交待,争取宽大处理。可是你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拖延狡辩,始终不肯老实交待。警告你,放明白点,定不定右派,你自己说了不算,是由组织定性的。你的那些罪行,拿出哪一条都可以定你右派。我们的等待是有限度的,你必须端正态度,马上交待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再拖延只能罪上加罪。”

会议限定了时间,只给一天时间写出书面交待材料,隔天在会议上作全面彻底的交待。

至此,我的问题完全清楚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我是铁定戴上了。

当初,韩部长带领二十兵团宣传部的人马参加批判会的时候,我已经预感到这一次我可能难逃厄运。但总还存在一些幻想。我的思想言行不能说没有错误,但和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在文化部批判会议拖了很长时间,也使我给自己的幻想找到一些依据。文化部是反右派斗争的重点单位,批了几个人,批了很长时间,但最后一个右派也没划,说明领导上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掌握是很严的。从批判会上人们的态度看,虽然这一次也是韩部长坐阵指挥,但和二十兵团宣传部肃反运动的情况不同。批判中也有“加温”现象,但没有打骂等暴力逼供行为,基本上是说理的。说明在军区文化部开会,不能不考虑军区文化部对运动的态度,批判的时间拖得很长,可能是为了掌握充足的证据,否则不会轻易定性。

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又错了。反右的政策,划右派的标准,全国都是一致的。但谁执行这个政策,主持批判,其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划我右派,早已列入指标。批判的时间很长倒可能和在文化部开会有关,会议的主持者不愿在文化部显出自己粗暴的形象。

军区的反右运动到1957年底已基本结束,我可能属“补课”范围。会议已经明确限定明天做全面系统的交待。而且韩部长点明,不论写不写交待材料我都逃不脱右派分子这顶帽子,但是必须写,不但要承认,而且要白纸黑字写成书面材料,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承认这一点是痛苦的,落

在书面上更加痛苦,我拿着笔的手直发抖,怎么也写不下去,我确实没有反党思想更没有反党行为啊!

回想过去,1945年我和几个同学从北平到解放区,要通过国民党(包括国民党收编的伪军)几道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到解放区初期,我对革命的很多事情还不太理解。但经过联大学生会和张家口市参议会的竞选、选举,亲眼看到了解放区的民主生活,使我欢欣鼓舞。以后又参加了涿鹿县、获鹿县和束鹿县的三次土地改革,农民分得土地后的喜悦和为了保田保家,父送子、妻送郎参军的热烈场景使我深受感动,对党的领导由衷地信服了。那以后,不要说中央的声音,就是上级党委的决定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总是坚决执行。部队入朝的时候,我只带了一支小牙膏,有人提醒我,朝鲜战场供应很困难,你为什么不带一支大的。我说,一支小的足够了。我是随军记者,我懂得战争。朝鲜战争是两个力量集团一场实力悬殊的大搏击。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我毫不怀疑,但为了胜利必将付出重大的生命代价。我也很清楚,在我们面前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战胜敌人,一个是牺牲在战场上,绝不能带着战败的耻辱回到祖国人民面前。这是神圣的使命,个人能活多久,并没有作多少考虑。所以,在那场残酷的战争里,我的心态始终很平静。不论是在战火纷飞,冒烟实火、向敌人冲击的时候,或者敌机带着刺耳的啸音飞临上空,炸弹落向身边的时候,确曾产生一霎时的恐惧,但仅仅是一霎时,炸弹爆炸以后,或者冲过封锁线以后,心态马上恢复平静,照常做战场上需要做的事情。因为从踏上朝鲜战场就把生死置之度外,那一霎时的恐惧仅是求生本能的反映。总的说来,精力始终是旺盛的,毫无消极畏避的思想。

不论是战争时期还是恢复建设时期,我对党始终是忠贞不二,我把自己看成是党的一个细胞,党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党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我神经上又没出毛病,我为什么要反党,反对我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事业呢?

我从来不讲违心的话,可是这个罪是党组织定性的,不承认就是自绝于党,我不能自绝于党,只能低头向党认罪。我没有犯罪,这个交待材料

怎么写?只能“要什么给什么”了,按大家在批判会上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丁、陈反党集团的走卒,攻击伟大的肃反运动,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思想等等。

这一夜我几乎没睡,快天亮的时候迷糊了一小会儿,早饭只喝了半碗稀粥,昏昏沉沉地走进了会议室。

这一次到会的人很多,不仅有二十兵团宣传部参加批判的全部人马,还有文化部的很多人,从未参加会议的文化部部长刘佳今天也来了。

昨天写交待材料的时候写得很艰难,今天念交待材料的时候更加艰难,我看着我写的那一条一条的罪行,怎么也念不下去,念不到一半就哭出来了。

如果是在敌人的法庭上,我会有一种浩然正气,怒目相对,据理反驳,大不了是个死,被敌人处死还落个革命烈士。可是我现在面对的是共产党,是我无限信赖的共产党啊。共产党整共产党员。满心赤诚信赖党,却要承认反对党;全心全意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却要承认反对社会主义事业。有话没处说,有理不能讲,只能掩埋自己的良知,给自己泼污水,那滋味真比被敌人处决还难受!

我念完交待材料以后,会场上没有人讲话。过了一会儿,文化部长刘佳用沉重的声音说:“人不伤心不落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毛主席说只有两种人——已死的或没有出生的不会犯错误。犯错误改了就好。”

我注意到了韩部长,真可谓是神采飞扬,脸上带着得意、讽刺的笑容注视着我,一字一板地说:“你现在哭已经晚了。肃反的时候我们就想挽救你,可是你态度嚣张,不但拒不交待你的问题,反而在肃反结束以后要求我们向你道歉。我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今天终于使大家看清了你的反动本质。我们的政策是宽大的。只要你老实地认罪,接受改造,仍然给你出路,我们仍然在挽救你。”

“挽救”这两个字像两根浸毒的钉子钉进我的心里。

韩部长是怎样挽救我的?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住在军区招待所,文化部的老人向我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反右时,文化部本是

重点单位,但一个右派也没有打出来,文化部长刘佳当然要承担责任,压力很大。当时政治部的部长们在一起吃自费小灶,吃饭说话中间谈到文化部的反右情况。韩部长建议说:“我知道一个还没有批判的铁定右派,他一贯对领导不满,攻击肃反,还是陈、丁反党集团主将陈企霞的得意门生,和陈企霞关系密切,他是轮换到宣传部的,可是一天也没有去宣传部上班,回国就请了创作假,借调到总政创作室写小说。他是军区的人,把他的组织关系从总政创作室调回来,到文化部批判正对口。”当时正在反右高潮当中,韩部长建议马上被采纳。

韩部长此举可谓一举两得,既帮助文化部完成了右派指标,又实现自己的心愿。肃反时他想“挽救”我,没有成功,还被迫向我道了歉,这一回终于把我“挽救”成右派,而且在他面前低头认罪,讨回了他一贯正确的领导尊严。我的心在发抖,想不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竟有这样披着“画皮”的人物。

会后不久,文化部党支部通知我,政治部要召开全体干部参加的批判大会,要我准备好在大会上的交待材料。

开大会以前有人好心嘱咐我:“在会上无论批判你什么,千万别反驳,会场外边有武装,你若是抗拒,就可能把你抓起来。”对此我并未经心,因为我根本不会反驳。到了会场,叫我上台,我就上台。有人推过一把椅子,叫我坐下,我就坐下,叫我看着台下,我就看着台下。台下坐的人当中有不少兵团轮换回来的,来了哪些熟人我也没看清。好几个人来到前台发言,讲了些什么我也没听清。若干年以后我爱人来到北京,军区文工团一位好朋友告诉她:反右对徐孔处理那么重,是因为徐孔太骄傲,批判大会那天,他坐在台上,显得满不在乎。其实,这位同志是把我估计太高了。那时候我哪里还骄傲得起来!心里是一片迷茫,只听从摆布罢了。

批斗会后不久,文化部党支部书记李冀陪我到直政部组织科去看结论。

结论在列举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以后,“定为极端右派分子”。

我不解地问:批判时说划为右派分子,怎么又定成了极右分子。

回答是:因为你一贯反党,而且批判中认罪态度很不好。

我心里明白,结论已经做出来,争辩也没用,就在结论上签了字。

组织科长又拿出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的判决书叫我签字。

判决书上有开庭日期,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起诉人是李冀,被告当然是我,判决书在起诉人列举的罪状后边写道:“被告对以上罪行供认不讳”,判决是“开除军籍,剥夺大尉军衔”;“如被告不服本判决可在×日之内上诉”。看判决书的日期,早过了上诉期。

我莫名其妙地问李冀:“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没有出过庭啊,你是起诉人,你是否出庭了?”李冀态度很坦然,说道:“这是履行法律程序,对你的处理是党委决定的,但开除军籍和剥夺军衔需要经过军事法院的这道程序。”

我明白了,军事法院是按党委的决定办事,不开庭,也可以作出判决。

我在北平读书的时候学过法律,觉得从法律的角度去看,这真是不可思议。明明没有开庭,却赫然写明某年某月某日开庭,而且有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起诉人,被告明明没有出庭,却写明出庭,而且“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这样做,法律还有一点权威性和严肃性吗?

但也许李冀的态度是对的,党委的决定是必需服从的,军事法院按党委决定履行法律程序,个人则必需无条件地服从军事法院的判决。就像对待党的结论一样,结论所列的罪行明明与事实不符,但你必须按所列罪行做“坦白交待”,在结论上签字同意。大约军事法院就是按着这一原则行事的。按法律规定,被告有上诉权,但我看到判决书的时候,上诉期限早已过了。说明军事法院根本没有考虑被告的上诉权的问题,判你有罪就是有罪,没有可能上诉,否则罪上加罪,如此而已。

组织科长郑重通知:领导指示,近几天不准请假,不要外出,作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1958年4月,我被发配到河北省黄骅县一个劳教农场,开始了我20多年的右派改造生涯。

(本文据作者回忆录摘编)

(责任编辑 萧 徐)

江青折腾我拍“样板电影”

● 严寄洲

1963年，广州军区剧作家赵寰，根据1962年台湾当局派出九股武装特务，窜犯大陆沿海骚扰，被大陆英勇的海防民兵一举歼灭的故事，创作了一部多幕话剧《南海长城》。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出后，广大群众反应强烈。

1964年《南海长城》奉调进北京演出，6月19日，毛泽东和江青观看了演出，毛泽东对该剧予以肯定。之后江青又和剧团领导及作者赵寰谈了进一步修改的意见，据她说有的是毛泽东的意见。

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陈播拟将《南海长城》搬上银幕，并决定由我出任该片导演。此时我正在广东湛江地区拍摄《带兵的人》，巧的是这部影片也是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出的同名话剧改编的，编剧是广州军区的作家肖玉。

在这段时间，被人称为“旗手”的江青，先后“呕心沥血”搞出了八个样板戏。不过舞台演出毕竟观众有限，影响面不大。江青一直有想拍“样板电影”的念头。当她获悉八一厂要根据《南海长城》拍成电影，正合她意。为了了解我的导演业务水平，江青在海南岛三亚地区的大东海疗养地调看了我所导演的大部分影片。江青一直对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电影界与戏剧界的艺术创作人员存有戒心，因为这些人了解她在上海时的老底。而八一厂的创作干部都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老八路，使用起来不怕露了她在上海时那些见不得人的丑闻。

赵寰专程从广州来到北京，把一份江青对话剧《南海长城》的意见交给了陈播厂长，并传达江青指示：同意八一厂把《南海长城》改编成电

影，并说剧本由你们自己去改，请严寄洲多多费心吧。

我拍完《带兵的人》返回厂里，接受导演《南海长城》的任务时，同时获悉此片将由江青出任艺术指导，不免心中窃喜。心想，江青懂电影，而且长期在主席身边工作，对我拍摄这部片子，将会有极大的好处。谁知道我的这种天真，到后来却成了可怕的悲剧。

1965年7月19日，江青在中南海的丰泽园召见我们，这儿是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们商议国家大事的地方。这次被召见的有总政文化部陈亚丁副部长、陈播厂长、故事片室主任冯一夫和我，江青一见大家便兴致勃勃地说：“这部戏是毛主席看过的，一定要拍好。”继而又讲了很长时间如何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话（那时还没有发明“三突出”一词），要形象高大，对剧本修改和剧情的安排都要以此为中心……说是座谈讨论，其实是她一个人演讲。

江青参予拍摄《南海长城》，一是想打开拍“样板电影”的局面，但主要的是想借军队这座尊神，帮她通过文艺界走进政界。她对我说：“这些年我是攻来攻去攻不动，看来只有依靠解放军。”

我以最快的速度，突击写出了《南海长城》的“分镜头剧本”，并将“导演阐述”送呈给江青审阅。

过了几天，江青办公室的柴秘书打来电话，说江青要和陈播厂长谈事。以往江青的作风总是恣意行事，今天在电话里却突然讲起了组织纪律性，她说：“我直接找你们谈话，组织手续不太合

适。是不是请你们向总政说一下,再开会。最好请军委罗瑞卿,总政哪一位主任一起来谈。”

过了几天,江青发话要讨论我写的分镜头剧本了。这回到丰泽园参加讨论的人除了陈亚丁、陈播、冯一夫和我,还有罗瑞卿总长、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等人。这是讨论我的分镜头剧本规格最高的一次了。

江青看着到会的这些头头脑脑,十分高兴。会上只听她一个人说,没有插嘴的余地。分镜头剧本是供摄制组人员拍摄用的,不搞这行的人看不明白,特别是那些“远、中、近、特、推、拉、摇、跟、渐隐、渐显、叠化”一类术语。“导演阐述”也是供摄制组拍摄中作为依据的蓝图。

江青说了一阵,小陈护士来请她去吃药。江青一走,罗总长皱着眉头对我大声说:“严寄洲呀!你这个本子是怎么搞的?看也看不懂。”抗日战争时期,我就和罗总长熟识,说话很随便,我说:“罗总长,这分镜头剧本是供拍摄时用的,你当然看不懂,你只要把那些术语跳过,单看内容就行了。”

江青服完药回来了,她翻了翻本子问我:“严寄洲!你为什么在‘导演阐述’中提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话?他的表演理论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今后再不允许提这个名字。”我的心一沉,斯氏体系是一门科学,哪有什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可是嘴上却没敢说出来。谁知江青还要把这“旨意”印发全国各文艺团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再也不提了,可是表演不沿用斯氏体系又用什么呢?无奈中只好变着法儿,把一出戏、一部电影的“最高任务”改称“终极目的”,把全剧的“贯穿动作”改称“串连线”,把“交流”改称“触电”,令人啼笑皆非。

江青的滔滔大论讲完,罗总长说

了几句,他说:“江青同志很懂艺术,她来领导你们工作应当很幸福嘞。不过江青同志呀,你身体不好,有些事你就不用操心,交给我们办好了。”罗总长的讲话,江青还不便顶撞,没再说什么。偏偏陈播厂长也跟着罗总长的话表态:“对,对,有些事情江青同志你就不用管了,我们来办就是了。”江青一听脸一沉,冲着陈播说:“怎么?是你们找我来管的,不要我管,那我就不管算了。”此话一出,弄得大家十分尴尬,会议也就此草草收场。

本来,江青看重的是我这个老八路对她那30年代的历史不知道,便于她指挥和操纵。后来她突然了解到30年代我也在上海,顿生疑虑。一天,她让柴秘书通知八一厂说有事找我去谈,我忙不迭驱车来到丰泽园。见面的时间到了,江青姗姗而来。我问江青:“怎么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呀?”江青笑答:“每次大家来,尽听我一个人说,今天想单独和你谈谈,也听听你的意见么。”接着她随便地问:“严寄洲,自从我头一次见到你,我就有一个疑问,30年代你不是也在上海吗?我好像在上海早就见到过你。”我说:“不,我不认识你。”江青说:“你在上海是哪个文艺团体呢?”我说:“我不是搞文艺的,我在上海世界书局印刷厂当练习生。”江青又问:“你在上海是哪年入的党?”我说:“在上海我还不是党员,只是在党的外围组织。我是1938年到了延安在‘抗大’入的党。”



拍摄《南海长城》时,作者(右二)为演员说戏

接下来谈拍摄问题了。其实这开场闲谈,恰恰是她今天谈话的重点,也是她的一块心病。现在一块石头落地了,她的脸上有了更多的笑意。江青首先问我片中的男女主角准备选谁来扮演。我回答:“男主角区英才准备用本厂演员剧团的赵汝平,他曾在《烈火真金》、《碧空雄师》、《英雄坦克手》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影片中担任重要角色。女主角阿螺一角则借调上影厂的王蓓担任。”江青皱了皱眉头说:“赵汝平气质倒是不错,像个渔民。但要他扮演区英才,缺少英俊挺拔的气质。”我问:“那你说谁最合适?”她想了想说:“你们厂里那个张勇手行不行?我看过他的《英雄虎胆》、《海鹰》、《赤峰号》,都是你拍的片子,他的形象还可以,不过缺乏渔民的气质,让他到渔村去体验生活。”回到厂里,心想怎么跟赵汝平说呢?我总不能抬出江青来当挡箭牌吧。我只好歉意地找赵汝平谈了此事。赵汝平说:“没什么,角色换人常有的事。”这样张勇手便调到了摄制组。我试拍了他的一场戏后,送给江青审看。江青看完样片摇了摇头发话了:“张勇手渔民气质不行,你还是把赵汝平换回来吧。”首长一句话就是“圣旨”,我只得又找张勇手道歉,换了赵汝平。我心想总算主角确定下来了,可以安心筹备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几天后,江青又打电话来了,她说:“还是换张勇手吧。”我的老天爷呀!我的脑袋几乎要炸了!这样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叫我怎么干呀?谁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隔了几天,江青又来电话说:“王蓓演阿螺不合适,小家碧玉,没有渔家妇女那种粗犷气质,要换。”我一听又蒙了,怎么办?王蓓是我费了好大劲才从上影借调来的,眼下又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心中不免有些怨气。我当即打电话给柴秘书,要他报告江青,要求面谈。很快得到答复,让我去丰泽园。见了江青,我单刀直入:“我认为王蓓还是合适的,我想不出还能找谁。你如果有合适人选,我可以去调来试戏。”江青看出我的情绪说:“既然如此,那就定王蓓吧。”我叮了一句:“定了?”江青扫了我一眼:“看你这个严寄洲!定了!不过你一定要好好排她的戏。当她政治上觉悟之后,拿起枪进入女民兵队列时,那种飒爽英姿一定要表现出来。”我连忙说:“一定,一定!”

江青的作息时间与与众不同。她夜里办公,十

点钟起床吃早点,午餐是下午四点。现在已经过了四点钟了,她邀我共进午餐,谁知道席间她又来花花点子了。她说:“影片作曲要换,换瞿希贤,插曲要马玉涛来唱。还有,摄影要换李文化,他拍的《早春二月》拍得美,有意境。”我心中虽不快,但我认为她对艺术在行,比我站得高看得远,虽然干涉太多,出发点还是为了拍好影片么。

那年头,八一厂只有办公室和各级领导家里才能安装电话,我接电话要到隔四户人家的管理科科长家去接。江青打电话每次都在三更半夜,苦了我和那个管理科长不得安生。

李文化是北影厂的摄影师。当时他正在拍摄《煤店新工人》,接到厂里命令立即风风火火赶到八一厂我家里,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把江青点名要他来的事儿说了一遍,他欣然接受了任务。然后我领他去丰泽园见江青,江青一见就说:“李文化!你拍的《早春二月》拍得不错嘛,色彩也很好,画面也可以。不过,你那是为资产阶级拍摄的,现在我要你来为无产阶级拍摄,怎么样?”李文化诚惶诚恐,连连说:“是!是!是!”我很纳闷,一个摄影师根据导演意图,把要拍的内容用摄影机拍下来,哪有什么阶级之分呀?

在试拍阶段,我们使用的是阿克发彩色胶片。这种胶片彩色还原层次差,鲜艳有余,中间色调反映不出来。江青找我说:“每次看样片总觉得色彩不好,不是偏红就是偏黄,你最好把胶片换美国的伊斯曼,拍摄低密度曝光效果特别好。”我说:“每年各厂只能分配到一两部重点片用伊斯曼,我们厂已经没有了。”江青一挥手:“那好吧,胶片问题你别管了。”第二天,罗瑞卿总长突然通知陈播厂长和我到钓鱼台,见了面罗总长说:“昨天晚上,江青同志打电话来,说什么胶片怎么着?你们知道吗?”我连忙说:“江青同志说,现在我们用的胶片不好,要换美国的伊斯曼,厂里没有这种胶片,须用外汇去买。”罗总长说:“你要用多少?”我说:“一万米,一块美金一米,一万美金。”罗总长说:“那好吧,我跟总后说一下,以后这些事你就不用找江青了嘛,找我好了。江青她懂艺术,你要好好听。不过不对的话就不要听嘛。”罗总长的最后一句话,当时我并没有在意,我政治上迟钝,没有领会。

胶片问题解决了,我可以高枕无忧了。谁知

半夜三更又来电话了，江青在电话中说：“严寄洲呀！我们拍的是无产阶级的彩色片，演员的皮肤不能像资产阶级少爷小姐那样白皙粉嫩。从明天起，你要让演员都去晒太阳，把皮肤晒得黑红黑红的。”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让演员去晒太阳，遭到化妆师的强烈反对。他们说太阳把皮肤晒暴了皮就没办法化妆了。至于皮肤的颜色完全可以用底子油彩解决。我觉得化妆师说得在理就不吭声了，可是这天半夜里又来电话了，江青问：“演员晒太阳没有？”我支吾地说：“明天开始晒。”第二天我只得让演员都到院子里转了几个圈搪塞。这件事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我抗拒江青指示的一条大罪状。

演员定下来了，作曲家瞿希贤、摄影师李文化也都来报到了。下一个阶段就是由剧作家赵寰带领大家去广东汕尾渔村体验生活。

过了一些日子，我们乘火车到达广州，广州军区文化部一位领导已经等候在月台上，一见到我便说：“总政文化部电话，亚丁部长命你立即返回北京，有要事商量，这是飞机票。”我只得从火车站直奔飞机场飞回北京，在飞机上我心中直嘀咕，肯定是江青又出什么馊点子了。到厂后，我和陈播找到陈亚丁问个究竟。陈亚丁说：“还是阿螺那个角色问题。”我说：“最后确定用王蓓是江青同志点了头拍了板的嘛。”陈亚丁无可奈何地说：“既然江青同志要换，你就执行算了。”我说：“换谁？江青要换谁我马上去借调试戏。”陈亚丁摇了摇头：“她说，你是不是试一试田华？”我问：“是不是江青的意见？”陈亚丁说：“不是，是罗总长提的，这样省得你被动。”我对陈播说：“田华现在棚里拍《秘密图纸》的内景，怎么办？张勇手已去南海渔村，没人跟田华配戏，摄影师李文化也去南海了。”陈播说：“《秘密图纸》可以停拍几天，让王心刚配一下戏，摄影师也临时请《秘密图纸》的摄影师帮个忙，回去我马上通知《秘密图纸》摄制组，你就在他们的内景棚里拍好了。”

拍完了田华和王心刚的一场试戏，等样片一冲洗出来我立即请江青来看。她一连看了两遍，好像已经忘了今天看样片主要是看田华扮演阿螺的戏，开口就说：“你看，王心刚的形象什么角

度都好看，区英才就换王心刚吧。”我一听吃了一惊，阿螺的角色还没定下来，怎么又冒出让王心刚把张勇手换下来，我非常气愤，但嘴上却只说：“那阿螺呢？”我在放田华样片同时把王蓓的样片也一块放了，以便有个比较和选择。当时江青反问我：“你看两人谁合适？”我说：“从目前这两个人来说么，王蓓比较合适。”江青想了想，又说：“那好吧，王蓓就王蓓了，你们军队上的事你还得请总长来定。”翌日，罗总长来厂看了样片后问我：“江青同志怎么说的？”我如实汇报说：“江青同志看了两遍样片后问我，两个人谁合适？我说，从目前两个演员来看，还是王蓓合适，她说要你来决定。”罗总长说：“嗨！这个江青同志，她来定就算了么。”我又说：“男主角江青同志确定换王心刚。”罗总长说：“好吧！女主角用王蓓，男主角用王心刚，定了。”角色总算确定了，可是我还得去南海渔村做张勇手的工作，唉！

我又重新调整了分镜头剧本，修改中我总是觉得政治性强了，人情味差了。一号人物区英才概念化，缺少戏，所以我重点加强了剧中第二号人物阿螺的戏，这样影片更具人情味和戏剧冲突。谁知江青看后发火了。她狠狠地冲我说：“你这是搞中间人物呀！区英才才是剧中的一号人物，应该突出他的戏，把他写得高大才好。比如他与匪首王中王在悬崖顶上搏斗，王中王纵身跳海逃跑，区英才手中不是拿着匕首吗？他可以把匕首含在嘴里，纵身跳海追击，那画面该多么精彩呀！”我实在按捺不住了，脱口说：“那不行，那么高的悬崖，含刀跳下去，惯性会把他的嘴震豁的。”江青把脸一沉说：“这是艺术真实嘛！”我不便再反驳，心想由你说去，我拍摄时再想点子，你奈我何。为此，“文革”中给我定性是抗拒伟大旗手的“滔天大罪”。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频繁接触，江青那种盛气凌人的作风实在令人难以承受。我心想艺术上的探讨应当是平等的，为什么非要全听她的“一言堂”不可呢？不过我对她的特殊身份还是比较尊重的。而且那个时期江青搞样板戏尚是初露峥嵘，还没有后来在“文革”中那样嚣张狂妄。我则误以为和她在艺术上可以探讨甚至争论，殊不知到“文革”中她会对我下毒手。

1965年冬，我率领摄制组全部拍完外景回

到北京。正因为我拍摄的这部电影是江青亲自挂帅的所谓我国第一部“样板电影”，我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努力工作的，自我感觉也良好。返厂后陈播厂长告诉我，江青正在上海开会，要我携带样片到上海请江青审看。我立即飞抵上海，才知道她在上海召开一个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会的仅是少数几个部队领导人员，有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宣传部长李曼村、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加上一个上海市委副书记张春桥。他们住在延安饭店，江青住在锦江饭店，每天看国内被点名批判的影片，以批“黑线”为名，把江青的个人意见、观点灌输给与会者。后来把《座谈会纪要》冠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字样，以示这个“纪要”非同一般。

我住进延安饭店，第二天就高高兴兴去给江青审看，江青一连看了两遍样片，紧绷着脸半天没吭声。我心里直打鼓，知道要出问题了。果然，江青开腔了：“这个演阿螺的王蓓根本不合适，没有女民兵那种气质。她是上海30年代的人，要撤换，班子要调整。我让你拍成‘大江东去’那种气概，你却拍成‘小桥流水’。我建议把主创人员都调来，大家一块儿谈谈。”我一听懵了，怎么又蹦出个30年代人物来？噢！我恍然大悟，从开始江青就反对用王蓓演阿螺，那是她自个儿贼人心虚。30年代王蓓在上海，一定知道她的底细，所以反对用王。其实王蓓早年在上海拍《乌鸦与麻雀》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此外，江青指责我把她要求拍成“大江东去”，拍成了“小桥流水”，此话我从未听她说过呀！以往，只要是她的每次谈话，都要整理成文打印上报和存档的，她从来没说过这话。而且从拍摄的外景样片看，李文化拍得很有气势，把南海渔村拍得非常优美，富有诗情画意，扯不上什么“小桥流水”。再说，李文化是她亲自点名从北影借调来的。另外，她提出要主创人员来上海，所谓主创人员除了摄影师，全都是剧中扮演正面人物的演员（当然王蓓不在其中），而扮演反面人物的主要演员全没份儿。我心想，在影片中不论扮演好人还是坏人，全都是演员么，为什么演反面人物的演员都没有资格参加呢？我向陈亚丁部长提出这个疑问，回答是：“江青同志怎么指示，你就执行好了。”

人马到齐，江青在锦江饭店召集开会。她说：

“样片我看了两遍，心情很沉重。有些问题想和大家商量商量。这部电影，是由话剧改编的，主席和我都看过这出戏。所以一定要把它拍好，拍成‘样板电影’。从现在的样片看，差距还很大，扮演阿螺的王蓓不行，小家碧玉，要换。还有那个扮演女特务‘大光灯’的演员，太漂亮。这是阶级感情问题，你们要重新调整班子，重新去体验生活，和渔民实行‘四同’。外景重拍，怎么样？有信心就拍，没有信心就算了，责任由我来负。”

我听了她这套武断言论颇不以为然，不用王蓓是她的阴暗心理作怪就不去说了，可是说“大光灯”太漂亮更没道理了。剧中“大光灯”使用的是美人计，美人计如果人不美是个丑八怪，那怎么行呢？可江青的话是“金口玉言”，没法扭转。我问：“那这个阿螺换谁来扮演合适呢？”江青想了想说：“祝希娟演《红色娘子军》的琼花不错。还有我最近看了一出歌剧，那女主角也不错，都可以借来试戏么。”圣旨一下，我不敢怠慢，马上派人去商借。一了解情况，祝希娟怀孕四个多月，根本不可能参加拍摄；而那个歌剧演员，由于作风问题，剧院已经准备处理，不可能再借来试戏。江青的建议落空了，怎么办？此时的江青，心中也没个谱。无奈之际，她突然发现我身后站着一个年轻的女演员，这是我从部队文工团借调来扮演片中另一个不太重要角色的，由于她扮演的是“正面人物”，所以有幸前来参加这次接见。江青好像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指着那女演员说：“她怎么样？你要培养培养青年演员么。”旁边那位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走到我面前说：“你们这些当导演的，满脑子只有白杨、秦怡。”我当时还不知道他是谁，便说：“我从来没有请白杨、秦怡拍过戏。”此时，江青也不知道哪来一股子邪劲，三脚两步走到我面前，冲着我双腿一并，装模作样地说：“我代表全国的青年演员求求你们啦！培养培养她们吧！我向你鞠躬。”说着她表演似地对我深深鞠了一个90度的躬。又说：“我向你作揖。”说时双手合十向我连连唱喏。我忙说：“我一定试，一定试。”当时我窝在沙发里竟然没有欠身站起来，确实有些不太恭敬，弄得在座的刘志坚副主任、李曼村部长、陈亚丁副部长和演员们目瞪口呆。

闹剧散场了，我小声问陈亚丁，刚才那个说

白杨、秦怡的是什么人？陈亚丁告诉我：“他是上海市委文教副书记张春桥。”

后来，江青可能发现对我过于苛刻，于是当着演员们的面和我套近乎。她说：“严寄洲呀！拍完《南海长城》你准备下一部拍什么呀？”我说：“还没考虑。”江青说：“有一部小说《战斗在滹沱河上》不错，还有《欧阳海》里的童年部分也很好么。另外《三大战役》也应该拍呀。”我脱口而出说：“我年纪大了，准备以后不拍军事题材的影片了。”江青一听话音不对，立刻眉头一皱，两眼一瞪恶狠狠地说：“怎么？你对我有意见呀？有意见我可以不管么。”我连忙解释：“不是的，我实在是觉得年龄大了，拍军事影片有点儿力不从心了。”这件事到了“文革”又列入了我的罪状。

在上海这段时间里，我实在感到头脑发胀，无所适从，根本没法进行艺术创作。江青看出了我的情绪，单独召见我谈话，我连忙赶到锦江饭店，等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举着温度表测定屋内温度合适了之后，江青姗姗而来，身后跟着柴秘书和小陈护士。落坐之后先是谈了一通她对影片的设想，接着进入正题。她问我：“严寄洲呀！你今年多大了？”我答：“四十九岁。”江青说：“噢，我比你大三岁。”又问：“身体状况怎么样？”我答：“没什么毛病，只是经常有些偏头痛。”江青回头说：“柴秘书，你联系一下，上海哪家医院好，让严寄洲去看看病。”我连忙说：“不用，现在工作正忙，以后再看吧。谢谢江青同志。”江青又问：“你一个月薪金多少？”我答：“一百七十块。”江青说：“啊，我比你多三十块。够用吗？”我答：“够，我爱人是剪辑师，她也有薪金，足够了。”江青又问：“你家还有什么人？”我答：“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上海还有一个老母亲，住在我妹妹家，由我抚养。”这次谈话，我还很受感动。其实她是为了稳定我的情绪，好为她的“样板电影”卖力。

不久，根据江青指示，我和摄制组主创人员再去渔村体验生活。就在此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奉命返回北京参加运动。开始我还以为只是开几天会，讨论讨论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谁知道一场大灾难临头了。

“文化大革命”实乃“大革文化命”。八一电

影制片厂作为一个文化单位首当其冲，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各式各样的战斗队组织起来，厂内生产全部停顿。

一天，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见文艺界的“左派”讲话，她在长篇大论中突然冒出一句：“严寄洲这个王八蛋不听话。”这一句话不要紧，八一厂的“左派”们如获至宝，立即专门组织批斗我这个被江青公开点了名的“黑线人物”。大会上把要演员晒太阳阳奉阴违不执行、宣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当面向江青撂挑子；气得江青向我鞠躬作揖等等，全都端出来上纲上线；“控诉”我的“反革命罪行”。我被强迫坐“喷气式”，又弯腰又搥脑袋，整得喘不过气来。突然我不知道哪来一股劲儿，摔开拽住我的打手，大声喊道：“我不能说话？”造反派头头以为批斗起作用了，说：“好，你就交待你的黑良心吧。”我说：“王八蛋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江青同志只说了我一句话，凭什么要批斗我？”

沸腾的斗争会一下子好像被泼了一瓢凉水。造反派头头气急败坏地慌忙宣布：“今天严寄洲的态度很坏，滚回去！”

造反派可没有就此罢休，他们继续上报我的所谓“黑材料”，说我把江青30年代的风流事儿到处散布。这可是天大的冤枉，我在上海时经常见小报的“花边新闻”，可是我从来没说过，因为我认为江青是毛主席身边的人。

过了不久，江青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文艺界造反派的讲话中，突然插上一句：“八一厂那个反革命导演严寄洲抓起来没有？他很坏，他在拍《南海长城》时，在我病中折磨了我整整三个月，我指示一次，他反对一次。”这下可定性了！完了！我一百张嘴也没法说清楚了。

我从1966年7月被揪出后直到1972年6月，批斗、关押、辱骂、毒打、劳改，受尽了折磨达六年之久。1972年6月，我刚回到八一厂，谁知“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1973年1月，江青突然窜到八一厂来，她在全厂大会上讲话中又捎上了我，说：“你们那个导演严寄洲抓起来没有呀？要专他的政。”女皇一声令下，半夜三更一批如虎似狼的喽啰又把我抓了起来，关押在本厂桃园内的一间小工具房内，一直到1974年12月底才放回家中。（责任编辑 李晨）

怀念公安战线优秀的领导者徐子荣

● 凌云

徐子荣是公安战线上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曾长期担任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对公安工作有很大的贡献和建树。“文化大革命”中，砸烂公检法，徐子荣是公安部几位副部长中第一个被隔离审查关进监狱的（公安部还有四位副部长 杨奇清、汪金祥、凌云、严佑民在文革初期也先后被关进秦城监狱），1969年6月，在狱中被迫害致死。

子荣同志早年投身河南农民运动，1927年入党，随后参加了杨靖宇领导的农民暴动。1932年在北平被捕，移送草岚子监狱服刑，是所谓“61人叛徒集团”的一个成员。他和薄一波、廖鲁言、胡锡奎、刘锡五等同志一起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极其艰苦残酷的斗争。子荣同志出狱后党组织派他去山西，先后任中共太原市委委员、山西工委秘书长、太行区党委组织部长。在解放战争中，他曾是皮定均旅、十三纵队和六十一军的政委，转战中原、华东，立下赫赫战功。他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转变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是我国公安战线上一位令人怀念的优秀领导者。

我认识子荣同志比较晚。从1952年初我奉调到公安部起至“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到来，我们先后被隔离、被关进秦城监狱，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13年，时间不长也不算短。他对于公安队伍和公安工作的建设作出的贡献，我是有深切了解的。1959年秋谢富治接任公安部长后，我逐渐意识到，子荣同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处理领导集体间的关系困难多了，在对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估计和处理方针上，他和谢富治之间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并逐渐显露出来了。

“大跃进”刮起“浮夸风”、“共产风”，天灾加人祸，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特别在农村，众多的农民忍饥挨饿，生活异常困难。反映在治安问题上，群众性的乱拿乱摸、偷盗、农村人口外流，以及哄抢粮食事件，使公安部面临着一大堆极为复杂而又非常棘手的问题。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子荣同志认为，困难时期所发生的治安问题，大多数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应当按照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给以正确处理。子荣同志对群众闹事问题说了三句很发人深省的话：“可解不可结，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这三可三不可，合情合理，浅显易懂，是积极疏导的方针，就当时的局势而言，对付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不使激化，这是惟一可行的办法；不这样做，势必越治越乱。这不是轻率得出的结论，而是他经过亲身的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提出的正确主张。然而，谢富治恰恰相反，坚持要采取“紧的方针”，就是要抓紧阶级斗争，靠打击、镇压等强力措施来解决问题。两种主张，南辕北辙，完全背道而驰，谁对谁错是明明白白的！

在“大跃进”引来的困难时期，农村中的小偷小摸行为相当普遍，成为一个群众性的问题，反映了人们基本生活资料的匮乏，度日的艰难。子荣同志非常关注这种现象，认为这不应是公安机关处理的事，更反对有的地方公安机关和乡村基层干部采取罚款扣饭，游街禁闭，以至捆绑吊打等激化矛盾的错误做法。对于有偷摸嫌疑的人，他采取古人的说法：“赏疑从予，罚疑从去”。主张既是嫌疑并无实据，就不应追究。他给我也给不少人诵读过唐代大诗人杜甫《又呈吴郎》这首诗，诗文是：“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

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杜甫的诗表述了对一个无食无儿贫穷彻骨的妇人的“扑枣”行为(也就是偷摸行为)的同情心和处理的态度,不仅不要去增加贫妇的恐惧,更要亲和地对待她。说的是一个人,实际上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景象。我们的时代同杜甫的时代已是两种天地,不好类比,但历史是可以借鉴的。子荣同志一再以杜诗示人,正是说明他懂得人民的疾苦,关怀人民的疾苦,他提出的处理群众性偷摸行为的原则和方法,是切合实际,利国利民的。

三年困难时期,河南省是“浮夸风”“共产风”危害最烈的省份之一。1960年冬,他率领公安部工作组到河南信阳地区考察灾情,处理善后。在“大跃进”年代,信阳地区农民因缺乏最基本的口粮因而饿死的人数超过百万。他目睹那里人民的苦难,如同身受。他忍住了心灵的创伤和痛苦,在那里工作了不短的一段时间。回北京后他绝口不谈“信阳”,而是更多地关注着农村公安工作中的诸多政策性问题。事隔多年他已不在世了,我才得知他信阳归来曾和他的亲密伴侣孟松涛同志,在谈起信阳农民困苦时,俩人抱头痛哭了一场。这是椎心之哭,是为受难人民而哭。

“文革”前的一段时间内,党内斗争的暗涌迭起。子荣同志作为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要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非常不容易。江青对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界的一些人怀有积恨,处心积虑要向文艺界开刀,曾经几次找子荣同志谈话,说30年代过来的上海左翼文化人中隐藏有不少叛徒和特务,要求公安部彻底查究。子荣同志感到非常为难,他知道这是江青为了泄私恨而故意整人的。这种无中生有的案件怎样“查究”?只好拖着不办。他向有关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反映。他几次对我说:“欠下这笔账没有还,也还不了”。“文革”中江青对文艺界一些人的诬陷迫害,完全揭穿了她那早已蓄下的罪恶用心。

1965年冬林彪一手制造了罗瑞卿冤案,子荣同志和我都无法理解,也非常不安。当时还传言罗瑞卿和公安部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那里安放窃听器,子荣同志奉命和有关省领导及大军区负责人进行有无窃听装置的检查。检查结果揭穿了有关这一切流言的虚假。事后他说起这件事,心



60年代初,徐子荣与夫人孟松涛合影

情还是紧张而痛苦的。子荣同志心系着党和国家,怀着深深的忧虑,走向“文革”动乱的年月。

“文革”乱起,谢富治完全投入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怀抱。子荣同志首当其冲,所谓“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件”“彭真、罗瑞卿内奸集团案件”,种种诬陷迫害随之而来,他是公安部副部长中第一个被隔离监禁的。从此我们再没有见面。等我出狱归来,他在监禁迫害下已经早离人世。可以告慰于他的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这个集团的主犯康生、谢富治等已经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是这样想的:近一年,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倡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施政要“以人为本”,并采取了一些如改“收容”为救助等的改革措施和其他亲民措施。按照这条路走下去,政通人和,前景大好。感奋之余,想起了徐子荣,想起了写这篇文章,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快要湮没的史事,作为历史的借鉴,应是有益的。

(2003年12月7日)

(责任编辑 方实)

王匡同志在国家出版局的岁月

● 宋木文

12月18日上午,我突然接到王匡同志的女儿王晓吟同志从广州打来的电话。我预感可能发生我不愿意听到的事情。不出所料,我敬爱的老领导王匡同志于2003年12月14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不幸的消息,虽在预料之中,却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王匡同志晚年安居家乡广州。我每次去广州,都到他家看望。我翻出在广州同王匡同志在一起的照片,凝视着王匡同志的热情、宽厚、睿智的面容,想起25年前,即1977年5月到1978年7月,王匡同志主持国家出版局工作期间,那一段短暂而又难忘的岁月。

1977年5月,中央决定王匡同志主持国家出版局工作,随后被正式任命为国家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1978年7月离任,到香港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长。他在国家出版局任职也只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这时“四人帮”被粉碎了,为清理“文革”错误路线创造了重要的政治条件,一大批恢复工作的老同志要求纠正“文革”错误,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两个凡是”还束缚着广大干部(正式文件上还有“巩固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提法),全党拨乱反正的大气候尚未形成;“左”的思想影响还相当普遍,被搞乱和颠倒了的思想路线是非还未清理,一大批出版业务骨干还没有从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政治帽子和枷锁中解脱出来,大多数建国以来出版的图书还被封存着。王匡同志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做出了几项对出版事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决策。

王匡同志来到后首先要做的是清查“四人帮”及其在国家出版局的影响。这项工作开始不久,王匡同志即考虑在出版工作中如何消除“文

革”造成的恶果问题。他决定成立出版工作调研小组,由陈原同志主持,范用同志和我协助,以国家出版局研究室为工作班子,另调李侃、张惠卿、倪子明、谢永旺等老同志参加。主要清理“左”的思想在出版工作中的表现,弄清路线是非。调研工作持续了3个多月,最终形成了清理出版工作路线是非若干问题的意见。这次调研为当年12月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作了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在王匡同志亲自指导下,从调研小组到局党组,形成一个共同看法,要纠正出版工作“左”的影响,分清路线是非,扭转出版工作窒息、萧条的局面,一定要批判、推倒写入中央1971年43号文件中的关于出版界的“两个估计”,即建国以来出版界是“反革命黑线专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统治地位”。这两个估计“像两座大山压在出版界的头上,难以翻身解放。而这个中央文件是毛主席批示同意颁发的,又是周总理主持召开的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给中央的报告。当时囿于“两个凡是”,对毛主席发动“文革”虽多有议论却难以正式提出讨论,而要批判“两个估计”又必须同周总理划开。经过调研和查阅有关档案材料,查清“两个估计”是“四人帮”对抗周总理指示炮制出来的;要批判“两个估计”又不要指向中央1971年43号文件(1979年国家出版局报告中央撤销43号文件)。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在1977年12月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在王匡同志的报告中,在会议的讨论中,批判了“两个估计”,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王匡同志指出:“这‘两个估计’从此成了‘四人帮’在出版战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的两根大棒,打击革命干部,打击知识分子,颠倒敌我,颠倒是非,随心所欲,胡作非为。谁要稍微表示不同意见,马上就给你扣上‘回潮’‘否定文化大革命’等大帽子。这个反革命的‘两个估计’是地地道道镇压广大出版工作者的紧箍咒,一直影响到现在”,必须彻底批判,把“长期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广大出版工作者解放出来”。会上也有不同的意见,会后还有人向中央报告了。当时中央分管文化出版工作的吴德同志曾过问此事:“是否批了周总理、毛主席?”王匡同志找我商量,决定以《出版工作情况反映》(增刊)的形式向中央汇报,主要说清楚:会议一开始,我们就明确表示过,集中批“四人帮”塞进文件中的“两个估计”,而不涉及整个文件,更没有批过毛主席、周总理。应当说,这次会议对“两个估计”的批判,限于历史条件,没有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极“左”路线紧密联系起来,但还是在全国出版界(甚至文艺界,因当时文艺界对“文艺黑线专政论”尚未进行批判)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王匡同志还决定恢复在“文革”中停止的稿酬制度,并报请国务院批准后于1977年9月发

文实施。报告指出:“由于王、张、江、姚‘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这个关系到加速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促进科学理论研究、繁荣文学艺术创作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完全不给稿酬,对作者也造成了许多困难,这种情况不宜继续下去。”当时曾为此事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由于“文革”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造成的紧张心理尚未消除,有的受“文革”迫害的文学界老同志也不明确表示赞同。可见,王匡同志下此决心的勇气和胆识了。这次恢复稿酬是低标准的,后来曾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指责,1980年4月国家出版局报请中央书记处批准提高了稿酬标准,然而我要说当初能迈出这一步的确是很有胆识的拨乱反正之举。

王匡同志另一项有重要影响的决策,是调动全国出版、印刷力量,集中重印建国以来出版的35种中外文学著作,主要是:五四以来现代文学10种,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的代表作,以及《红旗谱》《铁道游击队》等;中国古典文学9种,有《唐诗选》《宋词选》《古文观止》《东周列国志》《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外国古典文学16种,有《悲惨世界》《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牛虻》《一千零一夜》,以及契诃夫、莫泊桑、莎士比亚、易卜生等大家的作品选集等。在此之前,也曾重印《红岩》《青春之歌》《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等少数几种,但那都是报请中央政治局分管出版的领导同志批准的。所有这些在“文革”中惨遭厄运的中外古今文学名著能够重见天日,无疑是对“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禁锢政策的否定,而广大读者在各大城市(只能先供应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新华书店门外通宵达旦排队和在店堂内摩肩接踵抢着购书的前所未见的景象,则表明国家出版领导机关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文化政策的举措是深得人心的。在当时,这可是个大举动。可以说,这是批判了“两个估计”之后在出版实践中一个大突破,既有思想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又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严重书荒,初步满足了广大读者如饥如渴的需求。

王匡同志这期间还直接领导和策划了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出版工作。1975年11月1



王匡在伏案工作

日,毛主席对周海婴关于鲁迅著作注释出版问题的信作了批示。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一重大出版任务未能顺利进行。为了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纠正编选工作的错误指导思想,完成毛主席生前批准的鲁迅著作出版计划,在王匡同志主持下,国家出版局于1977年9月11日向党中央报送了《关于鲁迅著作注释出版工作的请示报告》。王匡同志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对编选新版鲁迅全集的领导,建议请胡乔木同志过问全集的编选工作,掌握方针和对注释中的重大问题加以指导和审定(乔木同志提出注释中的重大问题要请示中央审定);将“文革”中受“四人帮”迫害,尚在江西一工厂劳动的林默涵同志(“文革”前任中央宣传部分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调回北京主持编选工作,并借调冯牧、秦牧同志来加强原注释工作的班子;约请郭沫若、沈雁冰、周建人、王冶秋、曹靖华、李何林、杨霁云、周海婴同志担任鲁迅著作注释工作的顾问。二是确定全集收书范围和编选注释原则,除1958年版的内容外,拟增入全部书信、日记,辑录古籍和译文的序跋,以及1958年以来所发现的全部佚文,并附鲁迅年谱和注释索引于末卷。新版全集注释以1958年版为基础,原注释凡能用的尽量采用,错误的加以改正,不足的加以增补,繁琐的加以删减,体例不一的加以统一。总之,力求准确、简明、通俗易懂。人们不会忘记,对1958年版《鲁迅全集》“四人帮”在“文革”中颠倒黑白,横加指责,特别是以一条关于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注释向周扬、林默涵同志兴师问罪,大举挞伐。王匡同志主持的国家出版局报请中央批准,由林默涵同志主持新版全集的编选工作,以1958年版全集作为新版注释的基础,这也是一项重大的拨乱反正。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了新版《鲁迅全集》(16卷本),这是学术界、出版界有关专家卓有成效工作的结果,而王匡同志对此事的策划与决策所起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

1996年2月1日,王晓吟在给我的信中转述了王匡同志对1977—1978年那段历史的回顾。信中说:“您寄来的贺年片和您用特快专递寄来的文章都收到了,而且都交给了我的父亲。父亲看到您还在惦记着他十分感动和欣慰。他让我告

诉您,这些事不是他一个人就能办得了的,是因为大家都有这个共识,所以才能成功。他心里一直感谢你们(宋注:当时配合王匡同志工作参与决策的,主要有陈翰伯、王子野、许力以、王益等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给他的支持。父亲还说当时印那些中国古典名著、世界古典名著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没有印书的纸。纸都在汪东兴同志手里。那些纸是准备用来印毛泽东全集的(宋注: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全集》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为此储存了一批专用纸)。在那种情况下毛泽东全集还能不能出,不能出的话,纸能不能动,这可是要冒风险的。我父亲就毛泽东的书(指全集)能不能出的问题去问过吴冷西同志,吴笑而不答。问胡乔木同志,他说恐怕很难。于是我父亲便连夜赶到中南海去请示吴德同志,要求动用印毛泽东的书的纸印中国和世界文学名著。经批准后,就动用了这个纸把书印了出来。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弄不好也是一个路线问题,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可是要被打倒的。”晓吟对她父亲这段经历还作了一点评论。她在信中说:“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可是中国人的历史感却不怎么强,容易遗忘过去。在后来人看来一切都很容易,可是对当事人来说真是迈一步也不容易,这是一场生死存亡、宠辱枯荣的考验。”

大约在1978年五六月间,王匡同志同我谈起他做出这几项重要决策的心情时,郑重、坚定而又亲切地说:“木文!看到出版界的同志那么压抑,出版事业那么萧条,我宁愿再一次被打倒也要这样做,也许有人要打倒我的时候我已经去见马克思了。”

王匡同志主持国家出版局的工作,也就一年多一点时间,然而他为打破禁锢,恢复和发展出版事业所做出的几项重要决策,不仅受到当时出版界的普遍赞誉,并使压抑多年的知识界为之振奋,至今还受到人们的称道。25年后,王匡同志真的去见马克思了,我想,如果马克思有知,他会对他的门生给予嘉奖的。作为那段历史的经历者,我现在只想说:王匡同志,我想念您!

(2003年12月19日于北京住所)

(此文原刊于《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年12月22日,本刊刊发时作者又作了修改)

征地 利益分配中的巨大黑洞

● 应笑我

归根到底,所有资源问题本质上都是资源产生的财富随着时空在各集团之间分配方式的冲突和斗争。农业部提供的数据显示,近两年,关于征地、土地流转等问题的信访始终占总量的一半以上。

今年7月,一位部委领导到南方考察,当地市长向部长夸耀说:本市新技术经济开发区没有花财政一分钱,就建成了全市最漂亮、最高档、最绿色、最适合居住的社区。这位曾在地方工作过的部长不客气地说:“这件事你蒙不得我,我了解这勾当:从农民手里贱征贵卖,你没花一分钱,也许还赚钱呢。这哪里是征地,分明是吸血嘛!”

很显然,一场名副其实的土地之战,已在中国从南到北的农村地区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具体事件的是非曲直,我们难遽判断。农业部提供的数据显示,近两年,关于征地、土地流转等问题的信访始终占总量的一半以上。

更锋芒毕露的“剪刀差”

近几年来,中央提出加快城镇化进程,城镇化发展很快,但由于国力限制等原因,实际工作中往往是片面强调城市建设,对城乡经济统筹发展,基本上是心有余而做不到。中国的财力、物力仍然向城市聚集。

当前,各大中小城市都强调加快城市化,将城市化进度作为自身政绩目标。推进城市化,就需要道路、住房等的建设。资金从何而来?自然想到“土地出让”。

据一些学者测算,建国后为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而推行的城乡二元化战略,主要通过粮食价

格的“剪刀差”。30年左右时间城市从农村“积累”拿走至少8000亿人民币。而近十多年间,通过“廉价征地”这一把“金铰剪”,城市从农村也就是从农民手里“积累”了2万亿元人民币。

很多城市发展规划“堂堂正正”的以打农民土地算盘为基础。如开发浦东时,向当地农民征地,一亩粮田补偿2.3万元,一亩菜地补偿2.8万元,再投入六七万元完成“七通一平”工程,等出让给开发商时,已高达二三十万元一亩。

据测算,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民蒙受了2万多亿元的损失,这些资金足以建设起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目前通过农村信用社渠道、邮政储蓄渠道,每年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以千亿计的资金还不算。农民一年辛辛苦苦打工或种地挣来的,却不能用于农民自身发展。城市用这些钱上项目、搞建设,反过来还要占用农民土地。

所以,让性情最好的人也要生气的说法就是“城市到了反哺农村的时候了”。其实只是说,不能少吸一点血!

全封闭、隔离式的城市化

近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振奋人心”的新闻: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超过日本,以1万公里的水平仅次于美国。据说,中国的下一步目标就是超越美国!中国是世界上耕地最为稀缺的第一人口大国,而国土面积近似的美国则是世界耕地最多的大国,其人口仅有中国的不到1/4!

高速公路征地是中国土地问题中非常奇特的一部分。对农民的补偿从每亩1万多元到引起群体事件的每亩千把块不等。但统统都是一次性

的,这意味着即使达到每亩2万元的高标准,对于一个农民家庭要真正从第一产业转移出去,也仅是杯水车薪。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高速公路征地成本低廉,它在中国成为带来巨额利润的行当。尽管一直有声音呼吁,但农民以土地入股高速公路仍然不被允许。

同高速路类似的是中国的民用机场,中国修建机场的热度完全可以同高速公路比美。二者除了都有暴利可图,都有形象工程的共同特点外,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农民牺牲最大,从中获益最少。而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和流动工人,则主要依靠早已不堪重负的铁路系统和普通公路辗转千里。

高速公路不仅切断了乡村之间天然的联系,很大程度上也切断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现在,从北京驱车经高速公路到上海,全封闭的高速公路及其绿化带,使你看不到中国农村的真实情景。于是,中国的城市同太平洋对岸的更为相似,但与高速公路两侧之外的绝大多数地区对比强烈,犹隔国境。

而作为城市化的基本部分,高速公路和机场对耕地的占领规模不下于城市圈地。莱斯特·布朗尖锐地指出:“汽车和农作物的土地之争已经演变成富人与穷人的争夺。政府用从全体人民那里征收的税款,为建设汽车产业基础提供补贴,事实上就是利用穷人的钱来保护富人的汽车。政

府为建设以汽车为主的交通系统提供补贴,就必然要占用耕地。从目前情况来看,发展中国家有汽车的人根本不可能超越少数富裕阶层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提供补贴就是利用穷人的钱为富人服务。”

也为城市居民说句话

描摹当代失地农民的画像,确实让人心酸。但若统而言之,城市居民是受益群体,却也有失公平。因为除了大家可以看到的高楼大厦和公共绿地外,大多数市民从中国的“圈地热”中受益有限。相反,城市改造项目对许多普通人而言,是一种现实和心理的挑战。

最近,海外传媒刊登了一篇《制造一颗经济定时炸弹》的署名文章,为国内《参考消息》所转发,在海内外引起不小轰动。通过这篇文章,人们才知道,在北京,平均每3000个市民就有一家房地产公司!全中国有超过3万家的房地产公司。常驻北京的政治经济学家及律师劳伦斯·布拉姆发表的这篇文章说:

“北京的地平线上已经可以看到零散的证据:开发商用光了预算,留下聚集尘土的混凝土框架,然后转移到另一个地点重复这一过程。”

“去年,北京有9000万平方米商品房没有售出,其中半数其实是上一年遗留下来的。今年第一季度内,未售出的商品房又增长了9.6%。但建筑狂潮仍在继续。”

“对中国房地产投资平均每年的收盘率是15%——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

“在北京,70%的利润来自转售土地和项目批准的过程。实际的建筑开发商通常购买经过多次倒手的土地。除了土地的价钱,房地产开发商还有‘间接支出’——基本都是腐败款项。”

“上海的台湾开发



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

商透露,为了得到批准和许可证,他们平均每月需要支出几十万人民币的娱乐费。”

这些黑暗的成本堆积成高耸入云的房价,需要一般人家两辈子积蓄才能购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统计也表明,80年代末以来土地转让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最保守的估计每年也达100亿元以上,“比走私造成的损失还要大”。

土地 :腐败的一大温床

中国的土地价值无量,仅国有土地一项,静态估算货币价值达25万亿人民币。土地资产数额巨大,具有价值增值功能,又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按照市场供求规律,土地的供给稀缺性与需求的无限性,便成了经济转型时期权力寻租商高额暴利的肥肉。翻看近年来有关贪官的报道,几乎每个贪官都与土地开发中的腐败有关,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马向东、于飞等等。

土地出让过程中寻租的形式也纷繁复杂。首先,当前很多国有土地仍然是通过协议出让或划拨形式,其间的不透明自然酝酿了寻租的机会。其次,因为不同用途的土地价格不同,于是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就成为寻租的一个途径。在房地产的市场化开发背后,是大量土地出让的非市场化,是行政价格与实际市场价格之间的巨额差价。这既是驱动不少地方政府大量卖地的动力,也是寻租行为产生的温床。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失地农民约在8000万左右,而且基本上属于失地又无恒业者。在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过程中,这些失地农民基本上可以通过在城镇打工获得起码的就业状态;但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在于,没有人能够保证中国经济特别是世界经济保持非周期性的繁荣昌盛。

中国土地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当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城市不断拓展时,土地价值飞涨后在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分配却被滞后的法律法规扭曲。同样一块地,种粮食和盖厂房,价值有天壤之别。在广东省佛山市,综合平均种植业、渔业等的年收入,当地一亩地的年产值为5296元。要按农民算法,去掉各种投入,会种地的人一亩一年能挣200元,不会种的到头来还得赔钱。但如果盖上厂房,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比如在佛



竖这样一块牌子,农民就拥有了在土地上的劳动权

山某村,厂房的出租标准是每年5.6万元/亩。

但在中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不能随意改变土地用途。按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郊区的土地,一般属于集体所有。而农村土地大致可以分为农用地和建设用地。按去年3月实施的《土地承包法》,农地的使用权可以进行交易;但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在法律上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限制。按现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这些限制,使农地所有者无法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相应收益。

这意味着,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如果要进入市场,或通过转变用途获得增值,只有一种途径,即改变所有权,将集体土地征用为国有土地,此后其使用权才可以有偿出让。恰恰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受到了集体性侵害。于是在一些地方,农地征用制度演变成城市从农村攫取利益的抽血机。制度本身的不完善是根本原因,当前迫切需要对征地制度进行改革。

(责任编辑 萧 徐)

蒙昧主义何以在革命旗帜下泛滥

一位学者的绝笔

冯建辉

编者按：

冯建辉教授是我刊的老作者，他为本刊写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凝聚了他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考，也表达了对本刊的厚爱。在他去世前一个月，仍抱病为本刊写了这篇绝笔之作。他逝世后，他的女儿寄来了他的《告别书》。现将这篇绝笔及其《告别书》予以刊发，以表达本刊同仁对冯教授的缅怀之情。

告 别 书

人生自古谁无死，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不要大家向我告别，我向大家告别，此信即做告别书。

我虽壮年身患重病，多次“死去活来”。但命运待我不薄，又给了我十几年时间，能在“垂死挣扎”中继续做研究工作。因此，想到要告别这个世界，心情坦然而平静。

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于一个转折的时代，童年亲历过旧社会的黑暗，又沐浴了解放的曙光。此后的几十年，感受了历史的辉煌，也经历了风风雨雨和转形带来的生机。从人生角度充分体验了世间的美好与智慧，也领略了世间的丑恶与愚昧。所有这些，促使我搞起历史研究。由于研究占据了我的大部分精力，无暇顾及“世俗风尚”，以至有时显得“不合时宜”或“书生气”，并且为此付出代价。然而到头来却值得庆幸——我没有浪费人生。在此告别之际，谨以我的两本书《从陈独秀

到毛泽东——中共六任领袖新视角》和《一个年代的反思——走出个人崇拜》，献给未来。它是我对一个时代的思考，也是我对未来的憧憬。

我的自画像：①青少年有时左得可爱、可憎、可怜，进入中年始明白，大事多动脑，深恶随波逐流；②人际关系，心中无“术”，似非木讷，实不肖为，乃书生气；③学术上常引司马、雪芹自勉，却少先辈之心境，未脱胎俗；④性格豁达与执拗兼有，碰了南墙不回头，反视南墙如粪土，阿Q精神。

别了，人生。向许许多多生命一样，我从“无”中走来，在历史的大潮中游渡了几十年，然后消失在日益远去的历史峰谷之中，这就是生命的乐章。我自豪，能够成为生命乐章中的一个符号。

冯建辉

2003年11月25日

一、革命诗人海涅 杞人忧天”

一百五十多年以前，马克思的朋友“参加了我们的队伍”的德国杰出诗人海涅，在《路苔齐亚》法文本序言中，一方面热情的高呼：“愿这个旧世界崩溃，这个好人遭殃、坏人得势、人剥削人的旧社会！但愿它遭受彻底的破坏”；另一方面也讲了一大段通常被称为对革命“误解”的话，深深的震颤了我的心。他说：

我承认未来时代属于共产主义的，我是用一种忧虑和非常恐怖的语调来说这句话的，我真到了那个时代，那个被无知的偶像破坏

者们掌握了政权的时代时,我总是惊恐欲绝。他们将要用胼胝的双手毫不怜惜地摧毁我无限心爱的一切美丽的白石雕像……;他们将要毁坏我的月桂树丛林,而在那里栽植马铃薯;……百合花,它将被从社会的土地上拔掉,除非它手里拿起纺锤来;而夜莺,那些无用的歌人,将被驱逐,还有,唉!我的歌集将被香料杂货小商贩用来做纸口袋,给未来时代可怜的老太婆装咖啡和烟丝。唉!我预见了这一切,……。

一个多世纪以后,中国大地上掀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潮,使诗人海涅的忧虑变为现实。在“破四旧”的口号下,除几本经典之外,成堆的古今中外优秀书籍如“纸船明烛照天烧”,碑林、庙宇等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被“革命的铁锤”砸个稀巴烂;大批文化人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在劳改所里饱尝皮肉之苦;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被赶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花园里的百合花、月桂树也未能幸免,它们揣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冤魂,被斩草除根,花园变为向日葵园和老玉米地。那个年代,知识成为无用而反动的代名词,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之后,成为社会底层的“臭老九”。相传著名学者梁漱溟曾作《吟“臭老九”》诗一首: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若马列生今日,也要揪出满街走。



作者在伏案写作

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著述不算少,几乎都是从政治层面上阐述,极少有从知识、文化层次上论及。这里,我想提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代表先进阶级的政党,一度如此狂热的“反文化”,搞起蒙昧主义呢?仅仅从某一项方针、政策的失误,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或左的知识分子政策等,很难做出完全合理的解释。我个人认为,作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知识观念的陈旧,思想文化战略的失误和高度集权体制下对人性认识的扭曲,是重要的原因。

二、政治家的知识观滞后

党的一些领袖历史上并不否认,甚至非常强调知识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 and 作用,如制定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等,并取得显著的成效。但从全局看来,始终未能统领大家形成全民族尊重知识、热爱知识的浓厚氛围,而轻视知识、藐视知识、反对知识的潜流,却始终流淌着,以至最后形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从领导角度讲,我个人以为其重要的认识原因在于,如何认识和对待历史的和现代的知识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突出的表现为:

崇尚经验,贬低书本知识。如认为“工农是最有知识的人”,“书读得越多就越蠢”;“读多了,害死人”等等。经验重要不重要呢?很重要,它是知识的基础。但它偏于感性和个别性,而书本知识即理论知识,是经验的升华,使知识由感性上升为理性,因此更具有普遍性,更为重要。随着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理性知识,即系统的科学知识占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了越来越突出的作用,以至有的学者认为:“知识的生产率已经成为(劳动)生产率、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相比之下,党的历史上,我们一些领袖由于自身条件的局限性,知识观明显的滞后了。

崇尚实践,否定教育。当年苏联就曾出现过一种舆论:“工人、农民受高等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变成第二

等人了”；“受教育竟是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业”。以至斯大林在苏共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曾批评“这些奇怪的同志将来会上颂扬落后、无知、黑暗、反动的地步”。不幸的是，在中国也曾出现过这一倾向，如认为：“读书总比宰猪容易得多”；“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坚定不再进学校”，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学校培养的许多人，成为修正主义的苗子，主张停办大学。

全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再加上一些领袖的倡导，使我国整个社会曾一度笼罩在“反文化”的蒙昧主义迷雾中。如政治上，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建设中，“1958年大跃进”以和科学“对着干”为荣的反科学倾向；思想上，以“知识分子头脑复杂”为耻，“大老粗头脑简单”为荣的反智倾向，等等，这些是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记忆犹新的。

党的历史上，我们一些领袖也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大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存在着如此强烈的反知识倾向呢？就认识论而言，领袖是杰出的人，也是普通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包括个性，不能不对他们的认识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印迹。有些人生长和生活于长期封闭停滞状态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所学的多为中国传统和西方20世纪初的科学技术知识，后来长期置身于革命事业，对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缺乏了解。他们的知识观念，也就是对“人”的认识，我认为基本停留在体力劳动和手工业劳动的水平，如“人有两只手”、“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人海战术”等等，对知识和科学技术在“人”的素质中的地位和作用，感知甚少，估计甚低，距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相距甚远，这不能不是出现反知识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文化战略失误

我以为，我们党一度的思想文化战略的失误，又把“反文化”倾向推向祸及有文化的人，即知识分子。建国以后，党在思想文化方面形成如下战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肃清帝国主义和西方文化影响，改造知识分子和文化事业，大规模宣传和灌输马克思主义。后来，又进一

步提出上层建筑和政治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指导思想，不仅把知识分子看成妨碍民主改革的消极因素，而且是妨碍工业化的消极因素，如认为：“知识分子改造是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于是相继开展起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如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思想，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梁漱溟的文化观，直到反右（派）斗争。尔后又“插红旗，拔白旗”，批判“白专”，矛头所指，几乎涉及学校的所有老师和学生。初期的运动，应当说对肃清西方殖民主义影响，振奋民族精神，在当时起了一定作用，然而，整个批判运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由思想文化转到知识分子群体，由思想清算转到政治斗争，由一般批判转到对人的政治惩罚。

今天回过头来反思，这一思想文化战略存在着明显的失误。它急于“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中绝种”，清除历史留下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实行两个“彻底决裂”（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实现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一统天下。这种思想上追求“纯而又纯”和经济上追求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一样，是在现实世界希望建造“空中楼阁”，它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实施中我们又以政权力量和政治运动形式，强制性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违背了思想的特点和认识的规律。正如一位伟人所说，思想是消灭不了的，思想只能改变。也就是只能以现有的思想认识为基础，通过学习和实践，逐步的提高和改变。这种急于求成的做法，还容易混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混淆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的界限，使许多人受到伤害，特别是传统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受到的伤害最大。

文化战略中有三个影响很大的口号，值得重新探讨和认识：

其一，关于“灭资兴无”。“灭资兴无”的“资产阶级思想”内含是什么？“无产阶级思想”内含又是什么？从历年来搞的文化思想批判看，“无产阶级思想”内涵是指集体主义的（排斥个性、个体），单一化的（排斥多样性），纯而又纯的（消灭各种矛盾），理想主义的（排斥现实利益），禁欲主义的（排斥物质利益）的要求和理念。凡不符合

这一理念的思想、行为,都被认为是 资产阶级思想和世界观”。

其二,关于“不破不立”。早在 1954 年周扬代表官方所作的《我们必须战斗》的动员文化批判的报告中,就曾讲到:“只有经过这种批判工作,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树立真正领导的地位。‘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个批判运动,同时也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建设的运动”。60 年代,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 年 5 月 16 日),即“5.16 通知”,进一步明确提出:“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这些提法表明:“不破不立”说,把新与旧、唯物与唯心以及不同学术学派之间的关系,统统视为你死我活、势不两立,这显然是片面的;“破就是立”,根本说不通。破坏是破坏,建设是建设,两者虽有联系,但破坏决不等于建设。几十年来的历史说明,要张扬马克思主义,仅仅批判唯心论是不够的,必须认真地下功夫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思想文化学术领域的问题,并从中得出有说服力的新的结论才行。也就是说,光有“破”是不行的,必须有“立”;“立”是根本;“立”什么?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立“绝对地位”、“绝对权威”,思想学术领域的权威、地位,靠主观的、人为的去“立”,是立不起来的,它是一种客观的社会评价和多数人的共识。

其三,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长期以来在学术领域,“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一直是革命与批判的主要对象,不管是批胡适、俞平伯,还是批胡风,他们的主要罪名都是贩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其实,唯心主义只是人们的一种认识路线。从人类发展史上看,唯心主义与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比较,它突出了人在认识世界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是个很大的进步。从一般的认识论角度讲,唯心主义是人们认识世界过程中,由于种种复杂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容易出现的一种失误。把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紧紧捆在一起,是把认识问题简单化、政治化、阶级化了。很容易造成一种误解,仿佛封建阶级没有唯心主义,无产阶级根本不会犯唯心主义错误。即使从学术角度讲,唯心主义也并非一无是处。凡认真读过几本不同学术流

派著作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有些“唯心主义著作”,十分深刻而有价值。相反,不少“唯物主义著作”,并不一定本本有真知灼见。列宁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正是对“聪明的唯心主义”著作的肯定。具体到一个学者、一本书,情况又十分复杂。有的总体上是唯心史观,若干问题的分析却能从实际出发,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有的总体上是唯物史观,若干问题的分析却陷入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这种现象难道罕见吗?

四、高度集权体制与知识分子问题

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度的高度集权体制,曾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一切行动无条件服从统一的指挥,思想上做“驯服工具”。林彪鼓吹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实际是不需要理解,只需要执行,完全把人当成了机器,当成了工具。人和机器、工具最大的不同,恰恰在于人有思想,执行要靠主观能动性。即使战争年代,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之一,也是发扬军事民主。柯庆施唱得调子最高:“相信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则是赤裸裸的蒙昧主义。一时期,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气氛:“大树特树领袖的绝对权威”、“紧跟领袖就是方向,紧跟领袖就是胜利”。全党只有一个头脑在想问题,大多数人只是消极的服从和紧跟,扼杀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精神。一个人从儿童起,接受的教育就是:“听话才是好孩子”。到了青年时期必须学做一切听从领导安排的“螺丝钉”,当了干部要处处与顶头上司“保持一致”,一切“紧跟照办”。

在当时这样一种气氛下,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显得格外不协调。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思想比较活跃,爱想问题,那时便往往被视为“思想复杂”、“不好领导”;知识分子有较多的知识:“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眼界比较开阔,思维方式上具有多元性,不习惯单一性,容易提出一些不同意见,那时便往往被领导视为“异类”;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式具有个体特点,每个人的脑袋都是一座独立的加工厂,习惯于发挥个人的独立性、创造性,反映在个性上往往“特立独行”,容易缺乏“集体主义”观念,这一特点又常(下转 26 页)

张仲瀚

从南泥湾到新疆军垦

● 刘良玉

从南泥湾屯垦到新疆戍边

抗日战争时期,张仲瀚原在河北沧县老家组织抗日武装,后编入八路军一二〇师,任津南自卫军司令员,1940年到延安,在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任七一九团团长的,参加了著名的南泥湾屯垦。

1949年,彭德怀率领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时,张仲瀚所在的359旅编入了一野一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张仲瀚任一兵团二军六师师长。张仲瀚与南泥湾有着深深的情结,他要把南泥湾屯垦的经验带到边疆去,他说“自己养活自己,让老百姓休养生息。”

1949年9月26日,兰州刚刚解放,彭德怀在布置下一步的解放大西北的任务时,又明确提出:“我们还有一个计划,就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今年一定要进军新疆,为明春开荒生产做好一切准备。”他指着一张西北地图说:“大家看看,西北有多大一块地方啊!地大物博,但却人烟稀少,极度贫困,还十分荒凉,需要我们从现在起就开始搞建设。……我们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改变大西北的面貌,这就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义不容辞的任务。”张仲瀚全神贯注地听着彭总的讲话,心里已把屯垦戍边,建设大西北视作己任,开始筹划了。当时他部下的一位团长谢高忠(后任兵团农二师师长、兵团副司令员,自治区副主席)回忆说:“当我随从张仲瀚首批进疆抵达南疆开都河畔的时候,我发现在听彭老总的报告之后,他已经把棋子捏在手中转了又转。而我们似乎还没有从昨天的战斗中走出来,张仲瀚已经跨进了明天的门坎。他这位先遣队司令随同带来了一批工程勘测设计和农业专业人员,我起初还大惑不解呢?”1949年9月25日,张仲瀚率全师到达南疆古城焉耆。在别人看来,这里是满目破败、衰落、荒凉的景象,荒滩连着草原一望无际,但张仲瀚却十分高兴。他对谢高忠说:“老谢,高兴吧!比南泥湾棒多了!天助我也。夺取政权搞建设是最高目的,这千古荒原,这半壁江山我们守定了,坐定了,干定了,有多少劲也能使得上。”这时,他对开荒造田,向土地要粮已经是迫不及待。他说:“自己养活自己,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给自己创造一块建国立家的经济根据地。”几天以后他就要求谢高忠陪他到周围去勘测。他说:“军令在身,任何忧郁、迟疑、等待都与我们的身份不相称。没有休整的机会了,你明天就和我一道去踏勘定点。”他要求谢高忠所属团部在开都河、铁门关一带定点设立司令部,就是后来的兵团农二师所在地。他还经常提到那些屯垦戍边的先驱者。他说:“只要发动同志干起来,你谢高忠比他左宗棠气派大多了,左公去后留下杨柳三千棵,叫诗人赞叹:‘引得春风度玉关’。我们要栽它亿万棵。我们要留住春风绿边疆。”焉耆是蒙古民族聚集居住的地方,张仲瀚在踏勘时,出入牧民家中,还拜访蒙古王爷,他们听说来人是人民解放军的师长,以大礼相迎。张仲瀚说:“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中有建树的兄弟民族,但放牧生活终不能使他们摆脱落后与贫困。……我们在新疆的解放军应历史的需要,必定要做先进生产力的带头人。”

在踏勘中,遍地是牛羊粪肥,张仲瀚立即号召全师战士挑起筐来去

街头巷尾拣肥,作春耕准备。这条指示不胫而走,成了当时的一大新闻,也感动了驻在当地的起义部队二十七师的官兵,师长陈俊为此专门拜访了张仲瀚,说:“将军此举不亚于给我一面镜子。陈某思之再三,夜不能寐。扪心自问,惭愧惭愧。”陈师长的来访,引起张仲瀚的深思。他对谢高忠说:“我压根儿没想到拾粪这件事会弄得满城响。看来当兵只管吃粮的思想毒害人们太深。”又说:“我得感谢南泥湾大生产,那是对我的一次委实重要的洗礼。今日重操农事,让部队拾粪积肥就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这说明拾得太少了,永远拾下去就变得平常又正常。”

和起义名将陶峙岳一起共创石河子市

1950年3月,张仲瀚调任二十二兵团,这是以新疆陶峙岳将军的起义部队改编的,张仲瀚开始任二十二兵团九军政委,后任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兼第九军政委,对团结、教育这支部队做了大量工作,使这支部队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策,感受到了共产党的伟大。他团结、尊重起义将领的作风,尤其受到传颂。他对陶峙岳司令员,陶晋初副司令员等起义将领在和平解放新疆上的作用,给予很高评价,并在工作、生活上给以多方面的照顾。他经常说“三人行,必有吾师”。他认为一大批来自起义人员的干部,他们钻研农业科学技术,亲临第一线指挥生产的刻苦精神和扎实作风,都是自己的楷模。他常说:“群众路线,党内党外都是一样。”他与陶峙岳一起下基层时总是开车门,让陶先上车:同行时,总让陶走在前面。

1954年,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赵锡光患病住院,张仲瀚特地从兰州请来厨师为赵做饭,打电话给北京的王震,找卫生部长李德全为赵寻找一个治胃病的秘方,找到后,王震派人乘飞机送到新疆。他经常到医院去看望,陪同家属在病房守护。赵在病危

中对张仲瀚说:“从你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的伟大。”

石河子垦区和它的中心——石河子市,今天已扬名中外,但人们不能忘记当年的开创者王震、陶峙岳、张仲瀚等为它付出的心血和艰辛。

1950年6月,王震派出了一批新参军的农业、水利技术人员到张仲瀚处报到,他热烈欢迎大家,并说:“全军就要开始生产运动,军队要有一个领导的机构,研究全军生产怎么搞,新疆有新疆的特点,这里能种什么,怎么种才能丰收,一定要搞好科学试验。”于是农业生产试验组很快成立了,从内地引进了几十个棉花和蔬菜品种进行试验。这年春天,张仲瀚和陶峙岳陪同王震在玛纳斯河流域勘察了五天。当时玛纳斯河大桥正在抢修,他们只好徒步前进,徒步过河,张仲瀚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我们是一同携手过玛纳斯河啊!”他们在茫茫无际的苇湖中仔细勘测到天黑,几乎迷失方向,幸亏警卫人员把他们找了出来,一个个混身上下沾满了泥浆和雪,由于穿了皮大衣和高筒毡靴,才没有冻着。张仲瀚掌握了玛纳斯河流域和石河子地区大量第一手资料,开始草拟石河子开发的初步规划,并制定在石河子建立一个新城的计划。王震说:“我们就在这里建成一个生产指挥中心,还要把它建成一座现代化的新城。”陶峙岳说:“王司令员如果同意,这件事就交给我吧!”王震说:“有陶将军挂帅,定会旗开得胜。”又说:“咱们此生的目的,就是要准备



1966年,张仲瀚(右)与王震在一起

干一番前无古人的事业,要让戈壁变绿洲,沙漠变良田。”

1950年8月,王震和陶峙岳、张仲瀚、陶晋初在石河子的土房子里讨论,规划石河子市的未来。以后,由张仲瀚主持制定石河子新城的规划,征求了许多专家的意见,他自己也亲自划出草图,对提出的方案和设计人员反复研讨。他多次谈到城市建设要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还要扩大工业区用地,讲石河子应当发展工业的必要性。张仲瀚还说,他在进疆的途中,就想按自己的考虑建设好一座城市。他开始设计的草图是手掌大的草图,以后逐步放大,最后成为万分之一的正式草图。

1952年由他领导重新编制的石河子城市规划,也就是今天石河子市区建成的格局。在石河子未建设前,几位领导借老百姓的房子住,随从人员要挖个地窝子住,张仲瀚也参加挖。他说:“干这个我是内行,你们没有赶上南泥湾挖窑洞,今天赶上了天山脚下挖地窝,非常好!明天的高楼大厦就从地窝子开始吧!”

石河子地区过去被认为是不能植棉的禁区。1951年,张仲瀚考察时一个连长从老家带来棉种种在菜地上,亩产皮棉20斤,虽然产量不高,但说明这里能种棉花。这使张仲瀚十分兴奋,连夜与陶峙岳商讨,第二天报告了王震,他们都为这一发现和可能建成一个大棉花基地而激动不已。经过认真讨论,并和技术专家签订合同,决定在1952年试种2万亩高产棉花的计划,结果获得亩产皮棉102斤的好成绩。这是一大创举,走出了前人没走的路。正是从这里开始,才有了今天石河子垦区和整个北疆地区几百万亩的国家棉花基地,棉花总产量占全国的1/5。

毛泽东点将,张仲瀚担任农垦部副部长

1954年成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设在乌鲁木齐,张仲瀚也由石河子移住乌鲁木齐。1956年,中央在讨论组建农垦部领导班子时,毛泽东点名要他担任副部长。

其实,张仲瀚和毛泽东交往并不多,但却给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仲瀚在北京上中学时,结识了梅兰芳等人,学会唱京戏。1940年12月20日,在延安的一次晚会上,他上台表演了京剧《四进士》。毛泽东、贺龙等中央领导看了这次演出,毛泽东悄悄问贺龙:“他就是那个津南抗日自卫军的司令吗?”贺龙点点头说:“就是他把日本鬼子搞得日夜不宁呢!”毛泽东听说他是719团团长时说:“好啊,好好当,要当好一个团长还要努力!”1943年9月,毛泽东视察南泥湾数日,也到了719团的驻地“九龙泉”。这里的泉水是有名的,毛泽东喝了九龙泉的水,张仲瀚还请毛泽东吃饭,所用的肉菜蛋,都是屯垦战士自己生产的,毛泽东夸奖说:“好!好!”这不就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吗?1944年5月1日,南泥湾垦区政府成立,张仲瀚兼任了领导职务。

十几年后的1956年,毛泽东不记得张仲瀚的名字了,他问王震:在延安时一个英俊的团长,会打篮球,个子高高的,又会唱京戏,那个人现在哪里?王震回答:他叫张仲瀚,现在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毛泽东说:他不可以当副部长吗?由于毛泽东点将,张仲瀚担任了农垦部的副部长,但仍兼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副政委(政委由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兼任),长驻新疆。

在1954年以后的17年间,兵团先后成立了10个农业师,逐步开垦出千万亩耕地。现在的兵团拥有各类企业700多个,有178个工农商并举的团场,二、三产业占50%以上,形成一批繁荣的团场小城镇,整个兵团是一个农工商一条龙的大型联合企业,生产着占自治区10%的粮食和40%的棉花,拥有在全国都有一定名气的棉纺、毛纺、制糖等先进企业。遵照毛主席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办好事的指示,张仲瀚说服大家,从1964年起,兵团每年拿出800万元帮助各族人民搞农田、造林、庭院、水利等建设。贺龙听说后,非常满意,说:“你们这笔钱花的对”;“这个钱越花的多些越对。这种事要长期办下去。”张仲瀚说:“我们把为各族人民办好事当作自己一辈子的终身事业。”贺龙说:“要两代、三代,世代代办下去。”张仲瀚还十分注意顾全大局,主动承担国家的困难。在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张仲瀚从自己开始,降低供应标准,压缩经费,让出财力物

力,接纳远道来兵团逃荒就食者 20 多万人,并为河南、河北、山东、甘肃缺粮区调运 4000 万公斤粮食。

1962 年夏天,张仲瀚在检查工作中,发现有人要农场精简职工遣返回内地老家,他立即批评此举,并说:决不能这样做。兵团要顾全大局,责无旁贷地主动为国分忧,兵团不为国家承担困难,让谁去承担呢?又说,回去后生活困难,不是还要回来吗?这无疑是要让职工携老带小往返折腾受苦受难吗?他立即制止了这一错误的行为。

为使戈壁变绿洲,张仲瀚狠抓植树造林、牧草轮作等改造盐碱地的工作,农田林网化,人进沙退,小城镇建设,成为兵团十分诱人的特色。他深入各个垦区,远行不问行路难。他在穿越塔里木沙漠时,汽车受阻,他下车自己推车走,途经古楼兰遗址时,张仲瀚感慨万千地说:“浩浩乎前不见古人!我们有责任建造出新的楼兰城。”以后建在那里的 36 团场就是他定的点,现在已是一座农牧结合的花果园了。50 年代初,他到阿勒泰新成立的农 10 师去视察,他极目远望,阿尔泰山就在天边屹立,额尔齐斯河边片片丛林,是辽阔无边的大荒原,他说:“开垦出来都是好地。这些人烟稀少的荒原,弱者是无法生存的地方,我们要给他带来繁荣和文明。”他为这里即将建立的一座新城起名为“北屯”,意为在新疆的最北边执行屯垦戍边任务。张仲瀚说过:“夺取政权后,让国土荒芜着,地不能尽其力,人不能尽其才,我们就会成为国家的罪人。”

在生产建设兵团组建时,由于不再列国防军编制,实行转业,一些同志很不理解,当时正值国家实行部队军衔制,兵团转业不再评军衔,对大家影响很大,有的发牢骚,说“军不军民不民,二转子,还不如解甲归田回老家。”张仲瀚为此作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写了首七言诗:“雄师十万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屯田,塞上江南一样好,何须争入玉门关。”这首反映他自己抱负的诗,也使他的同伴和下级深受感染,有些想走的人,又留了下来。

兵团表现在屯垦戍边上的成就,很快就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关怀。从 1954 年董必武第一个视察石河子开始,1958 年朱德来视察,1965 年周恩来、陈毅、贺龙也来了,还有国际友人胡志



张仲瀚在垦区考察

明、西哈努克,以及众多的国外观察家,张仲瀚常陪同视察。朱德说:“我来到了一个花园农场”,“来到这个农场真不愿走。”陈毅留下了“白杨梯堤护农地,水道纵横育稻苗”和“戈壁惊开新世界”的诗句。

周恩来早在 1962 年时就已十分关注兵团的事业了,并曾约张仲瀚一道去广州,为在那里召开的部队转业会议介绍经验,总理向张仲瀚直接询问兵团的详细情况。1965 年、1966 年,周总理对张仲瀚委以重任,要求他帮助即将在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建立新的生产兵团的工作。周恩来对张仲瀚说:“新建的农业兵团和林业兵团,由你管起来。以后要西北局成立一个关于农业兵团和林业兵团的领导小组,你参加这个小组,以这样的方式来管。”张仲瀚抽调数百名骨干去支援。在甘肃组建了农建十一师、青海农建十二师、宁夏农建十三师、陕西农建十四师。而这两个兵团受文革的影响,未能正常发展起来。1966 年,周恩来还指示张仲瀚派人员支援西藏建立生产建设兵团,张仲瀚立即筹建了 1500 人的骨干并派专人护送到西藏。因受文革影响,这批人员后来又返回了新疆。

毛泽东虽然没有去过新疆,但是他也深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起的重要作用。

1962年中印边境发生紧急情况时,张仲瀚指挥值班连队参加反击,有1万多人和400辆汽车,参与运物资和抢救伤员。这年5月,中苏边境发生边民外逃事件,张仲瀚挺身而出,说明真相,劝阻边民。此后,又在中苏边境一带,抽调3万多人,建起58个边境农场,实行“三代”(代耕、代收、代管),成为参与稳定边疆局势的一支重要力量。毛泽东听说后很是称赞,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了情况能打仗!我看有希望。”

周恩来曾对张仲瀚说:“毛主席和我有一个设想,把我国1/3以上的军队,改为生产建设部队。”可以看出,毛泽东、周恩来都十分看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功实践,他们都希望在边疆地区扩大这样的生产组织形式。

张仲瀚在“四人帮”横行时被管押8年,身体受到摧残,文革后期,他经毛泽东批准调入北京,由部队安排工作,任炮兵司令部顾问。不久,就住进了北京的海军医院,后又转入到301医院,再未出院。就是在这最后的岁月里,他仍然关心新疆的建设和开发。他曾向当时的总书记胡耀

邦写信要求恢复兵团,并在病床上为新中国的屯垦戍边事业留下了《忆新疆》和《周总理关怀屯垦戍边》等文章。《忆新疆》一文未完,即于1980年3月离开人世。文中留下一首长诗《老兵歌》,是从1961年写起,经过多年补充修改。这是一首反映兵团建设经验成就的长诗,诗文从“兵出南泥湾”“高歌进新疆”开始,以“江山空半壁,何忍国土荒”表达他的心愿,以“兵团多健儿,未离手中枪”表示兵团坚定执行屯垦戍边保卫国土的任务。

张仲瀚对到医院探望他的干部说:我想抓紧时间写些东西,写我们兵团的创业史,呈送党中央留给后人参考,尽我最后一份责任。张仲瀚不愧为一位发扬光大南泥湾精神和屯垦戍边优良传统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一位为西部的屯垦戍边自觉奋斗不息的将军。

(参考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魂系天山——缅怀张仲瀚同志》一书整理)

(责任编辑 致 中)

(上接11页)装,市区秩序早复常态。今美军突然要求在该处登陆,我方认为毫无必要,至于要求本军部队与当地政府撤离该市,尤属无法理解。因此,请美军总部转报贵方有关司令部转令烟台海面美海军陆战队,勿在烟台登陆。二、美军如未经与本军商妥,竟然实行在该地强行登陆,因而发生任何严重事件,应由美军方面负其全责。”

同日上午,我方把叶参谋长声明译成英文,作为中文的副本打印出来,准备派人送交美方巴贝中将。送信人还未走,巴贝、罗克和赛特尔乘小艇上岸。巴贝称,由于他向美军第七舰队金盖德上将建议,美方已批准他们不在烟台登陆,特来辞行。赛特尔少将和他的分遣队,仍留在烟台进行友好联络。我方当即把叶参谋长声明,及一大包连日来群众写的抗议书送交美方。巴贝回舰不久,其舰队就升火启航,只留下赛特尔分遣队“联络”。

10月9日,巴贝正式发表公报说:“美军将不在中国共产党所占领的烟台登陆,因该港已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控制。”又说:“烟台港已设有警察,秩序良好,该地已无日军、战俘和美

国拘留民。目前,美军登陆已没有任何军事理由了。”

10月17日,原驻扎烟台的伪军张立业部,窜入崆峒岛,捕截渔船,杀害渔民,烟台驻军于29日一举将其歼灭,解放了崆峒岛。期间,赛特尔为“避免参与中国内部斗争”,率舰去威海,不久也离威而去,再也没有重来。

至此,美舰在烟台登陆的企图和冒险行为,遭到了彻底失败。用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在其撰著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的话说:“美国人在烟台低下了头。但并非处处如此。十月十八日,美军包围并捣毁了八路军驻津办事处,逮捕了办事处工作人员,而且带往美军司令部。”

反对美舰在烟台登陆斗争的胜利,保住烟台,在战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重要的是控制了烟台及以西的各港口,保证了山东主力部队的顺利北上。从9月底至12月初,5万多山东主力部队和4000多地方干部,分别从烟台及以西的栾家口、龙口等港口,渡海北上,开辟东北解放区,为赢得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直至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责任编辑 萧 徐)

葡萄酒圣”张弼士的乡梓情

● 张振成

张弼士是清末民初一位被誉为传奇式人物的爱国华侨实业家,又是“实业兴邦”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尤其以创办驰名中外的张裕酿酒公司而奠定他在中国酿酒工业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在清末民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早期发展中有较大影响并发挥了积极作用。

艰辛的海外创业而后欲振翅高飞

张弼士,名肇燮,别字振勋,1841年12月21日(清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生于广东省大埔县黄堂车轮坪村,父亲张兰轩是清道光初年的秀才,在乡村当塾师,兼业医生,因家境贫困,张弼士只随父读过三年书,当他听说家乡有人在南洋发迹后,遂决计从商闯荡南洋,“创兴实业,为国外华侨生色,为祖国人民增辉”。

1858年,张弼士前往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做苦工,三年期满后到一家福建华侨的纸行当店员,因工作勤恳,聪敏能干而提升为买卖手,后又当上管帐先生,因工作出色,纸行的老板将女儿许嫁给他,后岳父病逝继承其遗产,改行经营经销酒类商行,又承办当地酒税和承包了新加坡典当捐务,不久又承办了荷属东印度一部分岛屿的鸦片烟税,还垄断了新加坡两个地区的鸦片专卖权,从此财富日增。以此为基础抓住时机开始大量的投资兴业活动。

当时南洋土地肥沃,适宜垦殖,而荷属当局极欲开发。张弼士看准机会,利用其自身优势雇佣华人开办垦殖公司,创办了裕和垦殖公司、亚齐垦殖公司、裕兴垦殖公司、笠旺垦殖公司、万

裕兴垦殖公司,1866年至1898年30年间,张弼士垦殖业不断发展,仅日里笠旺垦殖公司就先后建立橡胶园八所,直径百余里,拥有雇工数万人,可见规模之大,张弼士从中也赚取了丰厚的利润。随后张弼士又开办了矿务公司、远洋轮船公司、日里银行,组织过药材批发。此外张弼士还在南洋购置了大量房地产,张字号企业一时遍布南洋,张弼士在全盛时期,其国内外全部资产达到七八千万之巨,成为当时海外侨商中首屈一指的巨富。

张弼士发达后并没有忘怀祖国,当他成为当地华侨极有影响的人物后,英荷殖民当局拟对其封官赏爵以便为殖民当局服务,被他拒绝。说:“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也!”没有忘记当初的诺言而后拉开了大举向国内投资的序幕。

为国生辉的爱国情怀

19世纪末甲午战败后中华民族的危机日趋严重,清政府不得不改变过去的轻商抑商政策,尤其是海外华侨的经济实力也极为政府借重,清政府训令各省大臣广揽南洋富商回国投资并赐高官勋爵。张弼士毅然听从朝廷召唤回国投资。

回国后张弼士受到清廷的厚待,李鸿章、盛宣怀等重要大员鼎力支持其实业活动,慈禧、光绪先后三次召见张弼士,最后赏赐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职,同时张弼士向清廷提出振兴商务、发展实业的全盘计划。第一“中国商智未开,商力较微,而各国莫不藉商战以争利于中

原、商务一端,在我已有不能自支之势。居今日而思补救,因非招致外埠华商维持商务不可,振兴商务,尤非向闽、广等省入手不可”。第二在具体办法上,“如由商埠择其声望素罕之员,奏请特派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办闽、广农之路矿事,宜予以保护华商之任”。第三在发展步骤上,“先由督办凑集华款,认真提倡,选择要地,筑路一段,开矿一区,垦种工艺,创办一、二事以为程式,二、三年后著有成效,昭示大信,再劝华商出其资财承办各项公司。极力经营,由南而北,逐渐扩充”,如此“中国增亿兆之资,利权既挽,主权自尊,战胜之机,固不尽在折冲间矣”。表现了张弼士拳拳爱国之热忱,殷殷自强之希望,这一计划由此得以批准、推广。张弼士也因此被任命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1905年他身体力行率领一个考察团到南洋,劝说华侨回国投资。在新加坡出席数十人宴会,张弼士接触侨领和巨商,呼吁他们“勿分畛域”;“视为一体”,振兴实业,为国出力。由于张的特殊身份,每到一处,往往是“悬灯结彩,高挂龙旗,行者塞途,马车轰轰。观者如堵,极一时之盛。”可见张弼士当时的影响力。正是受这样有代表人物榜样作用的影响,大量华人回国投资,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经济发展。据统计,“1872—1894年一共办了100多个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而“1912—1919年华侨投资的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及房地产业多达1042家。”

张弼士病逝后,郑观应对其生平作了中肯评价,指出张公“所最难者,拥厚资不自暇,晚年已垂老,不憚焦劳,无非欲提倡实业,遂其救国救民之志”,这也正是张弼士实业经营活动重要思想基础。

在张弼士的民族爱国思想中,由于长期在国外接受不同思想文化熏陶,振兴实业、富强国家,其内容显然不是完全尽忠清

朝封建统治,也不是复兴汉族王朝,而是希望整个民族的强盛和繁荣。在这一点上与同时代保守的商贾相比显得尤为开明进步。

1904年湘、鄂、粤三省绅商士人要求废除清政府与美国签订的出卖粤汉铁路的合同,主张收回集股自办。在这次收回路权的斗争中,张弼士坚决站在商方一边。据当时报纸记载:《粤汉铁路》争回自办,粤人有张弼士侍郎肩任其事,鄂省复有南皮尚书鼎力主持,与湘绅同德同心,方谓可破中国向来敷衍迁就之积习,夺外蔑视之奸胆,申正义以绝阴谋,壮国威而保权利,在此一举。“清廷慑于群愤,收回粤汉铁路,允许商股自力,张弼士等人功不可没。”

但到了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极大触犯了商人利益,张弼士不断上奏朝廷,力言铁路国有不当,但未被采纳,因此他看透了清廷的腐败无能,转而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张弼士的儿子张秩掬参加了同盟会,张弼士此刻也很愿意结交一些革命党人,慷慨解囊,通过胡汉民捐助了孙中山白银30万两。武昌起义爆发后,张弼士又与张耀轩以南洋中华商会名义发动群众捐赠巨款。辛亥革命后张公又资助福建民军7万元。正是出于对张公资助革命的感谢,加之对其“实业兴邦”的褒奖,当1912年孙中山莅临烟台时遂题赠张裕公司“品重醴泉”。孙中山先生一生为企业题词较为罕见,其寓意深刻。

(责任编辑 萧 徐)

欢迎邮购《炎黄春秋》近年合订本

通 告

2003年合订本将于
2004年1月份装订完毕,如
购买合订本,请将书款汇至
我社发行部

1997年合订本 简装 无 精装 56元
1999年合订本 简装 51元 精装 56元
2000年合订本 简装 51元 精装 56元
2001年合订本 简装 51元 精装 56元
2002年合订本 简装 51元 精装 56元
2003年合订本 简装 51元 精装 56元

(以上均免收邮费并挂号邮寄)

周学熙 实业巨头 到北洋财长

● 段明艳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有两位著名实业家，人称“南张北周”；“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北周”指的是华北新式工商业的开拓者周学熙。

周学熙字辑之，号止庵，晚年号枕云居士，又号砚耕老人，1866 出生于安徽建德（今东至）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1880 年首次参加童子试，此后十余年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终于在 1894 年乡试中举，但后来的两次会试都未被录取。1895 年中国由于甲午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北京的知识分子“公车上书”，首先行动起来，要求变法维新，寻找富国强兵的新路。科举仕途的坎坷及时局的影响，使他毅然做出了弃举业投实业的决定。在父亲的支持和帮助下，1897 年他开始涉足实业，并顺利地当上了开平矿务局董事及驻上海分局的监察，负责监督推销开平煤炭。从此他潜心致力于实业，实践着“实业救国”的梦想。

从英商手里收回唐山细棉土厂，使之再度崛起

周学熙任职的开平矿务局是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新式煤矿之一，煤田蕴藏丰富，使用外国进口机器，所产的煤炭质量较好，发火力强，煤灰少。在上海时，他经常来往于温州、厦门、汕头、福州、澳门、广东等地，察看煤炭在南方的销售情况。虽刚刚涉足实业，就表现出了聪慧精干，很受器重，1898 年即升任开平局会办，后升为总办。在他的经营下，煤炭生产和销售都很顺利。

在南方各省督办煤炭销售时，周学熙注意到

由于各地纷纷建厂、建矿、修铁路，水泥的潜在市场很大，可国内却没有一家水泥厂，全部要靠进口，价钱昂贵。此前唐廷枢曾在唐山建立了“细棉土”（水泥的译名）厂，由于生产设备和生产方式落后，规模小，1893 年不得不关闭。周学熙经过认真的市场调查后，他认为国产水泥成本虽高，但还是要比进口水泥便宜，所以向清政府奏请重新开办唐山水泥厂。1900 年 4 月得到清政府同意，开始筹备建厂。

周学熙首先委任开平矿物局矿师李希明任经理，聘请德国技师汉斯·昆德为总技师，汉斯·昆德等人对唐山的土石进行化验，发现唐山土石是制造上等水泥的最好原料，一切准备就绪，水泥厂即将开工。就在这时 1898 年秋兴起的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京津地区，紧接着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当时周学熙因事又不在唐山，作为开平督办的张翼吓得躲在寓所不敢出门，开平矿物局乱作一团，恢复细棉土厂一事暂时搁浅。

八国联军入侵华北后，英德军队占了唐山矿区。在混乱中，英国商人和天津海关税务司官员德国人德璀琳联合，连吓带骗，从督办张翼手中，以极低的代价“买”去了开平矿务局和唐山细棉土厂，其中包括唐山、林西两座煤矿、承平银矿，天津总局的房屋，天津塘沽、上海、香港、广州等地的运煤码头及运河、轮船等。他们转手又卖给了英商墨林，墨林又转手将之卖给“东方辛迪加”，1900 年底组成开平矿物有限公司在英国注册，承接了开平矿物局的全部产权。

周学熙回来后，英国商人为了手续完备，又企图诱骗他在卖矿契约上签字。周学熙不顾威胁，断然拒绝签字，愤而辞去总办职务，表现了一

个正直的中国人的民族气节。

1904 年袁世凯让周学熙在国内负责办理“收开”的交涉,周学熙调来有关开平矿务局的所有案卷,经反复研究得出结论:由于张翼的出卖,开平新公司已经在英国注册的事实很难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努力收回部分权益的建议,也就是先收回他曾经试图复建的唐山细棉土厂。

原来,唐山细棉土厂在垫款抵押开平矿时曾与开平立约:如果一方不愿合办,可提前三个月通知对方,即可分办。这些资料原来都保存在汉斯·昆德手里,汉斯·昆德是个正直的工程师,他目睹英国商人骗取开平矿务局的经过,对这种卑鄙行径十分痛恨,便主动将唐山水泥厂的资料文件全部保管起来,拒不交给英国人。后来,他将这些资料全部交到了周学熙的手中,正是凭着这些文件和资料,周学熙收回了细棉土厂。

收回细棉土厂后,周学熙将它改名为“启新洋灰公司”。因旧厂股本早已亏蚀尽,他把旧厂固定资本压低折价,动用自己淮军银钱所的存款,按老股本十万元结清旧案,又借一部分官款,还招集商股,待商股招满后迅速偿清所借官款,使这一官营企业逐渐转为私营企业。

为了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洋灰公司创办章程》规定:“本公司资本,以 100 万元为额,凡系本国人民均可附股,无论官、绅、商、庶入股者一率均享受股东之权利。”

为了在市场上站住脚,周学熙注意改进技术,时刻关注西方水泥制造工艺的改进和新设备的发明,一旦有新设备能促进水泥质量的提高,他总是不惜重金买进使用。启新公司的水泥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公司垄断中国水泥市场达 14 年之久。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有名的建筑,都是用启新水泥建造的。

“以滦收开”,与英商斗争到底

1905 年起英商变本加厉掠夺中国矿权,他们不仅采了开平矿区所属的矿坑,还虎视眈眈地

注视着与开平矿区毗邻的滦州的矿源。周学熙认为如不先开采滦州矿源,该地区矿权势必旁落,北洋一切资源将被外国人掠夺。1907 年他向袁世凯呈递“陈开滦矿界文”的建议,请求创建滦州煤矿,通过开发资源,收回权利,即以“滦收开”,最终得到袁世凯的同意。袁世凯以北洋大臣的名义,转咨农工商部准予注册,并下令“滦州地方三百三十方里矿界以内不准他人开采”,使滦矿比开平大 10 倍,还明确该矿系为北洋官矿,为北洋军需服务,以后他矿不得援以为例。

由于直隶各界人士对英国人以卑鄙手段骗取开平煤矿都很愤怒,所以对中国人自办的滦州煤矿都积极支持,纷纷投资入股,在几个月的时间,“滦州煤矿有限公司”成立,周学熙担任总经理。他不等新式采煤机械运到,就先以土法上马开采,最先建成的是陈家岭矿井,随后又在印子沟、桃园、赵各庄、狼尾沟等地开挖了矿井,并在各矿之间建成专用铁路,安装电话。他还派人到德国订购适合滦州煤矿使用的最新式采煤机械,使煤炭质量大大超过了开平,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对开平煤矿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1909 年冬天,在新任直隶总督陈夔龙的支持下,周学熙再次主持收回开平煤矿的事务。由于滦州煤矿已将开平煤矿紧紧包围住,而开平煤矿本身的蕴藏也快要开采完了,经过与英国外交部和英国公司长达半年的交涉,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英国把开平煤矿交还中国,中国付给英商 178 万英镑。当时开平煤矿的股票市价已达到 170 万英镑,加上公司拥有的其它产权,实际上已超过 178 万英镑,可见收回开平煤矿不仅维护了国家主权,经济上对国家也是有利的。由于当年出卖开平煤矿的张翼从中破坏,掌握国家大权的摄政王听信了张翼的胡话,不同意由国家支付这 178 万英镑,而滦矿也无力承担这笔费用,收开一事功败垂成。

周学熙对张翼的卖国行为十分痛恨,他下决心和英国商人斗争到底。针对开平煤矿蕴藏将开采完的情况,他决定首先开采开平附近各矿的煤层,使开平的矿井无法向外延伸。面临着即将无煤可采的困境,英国商人多次对周学熙威逼利诱,周学熙都不予理睬。英国商人又通过英国领事向直隶总督施加压力,陈夔龙也都顶住了。英

国商人在无可奈何之际,施出了最后一招,凭借着经济上有英国财团的大力支持,挑起一场煤价大战,把每吨煤价价格降低几乎一半,而且还根据销量,附赠礼品,企图以此压垮滦州煤矿。周学熙果断地接受了挑战,也采取相同的降价措施。两家公司争相降价,最后每销售一吨煤,两家公司都要倒赔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对周学熙的斗争却不给一点财力上的支持。经过了近一年的价格大战后,双方处境都很艰难。最后英国商人改变了策略,开始大肆鼓吹“开滦合作”。他们在天津、上海的报纸上大造舆论,还专门花钱在天津办了张《北方日报》为“开滦合作”摇旗呐喊。同时,他们又从滦州煤矿内部进行分化瓦解,收买滦州煤矿的股东,要他们在董事会上提议放弃斗争、与开平煤矿合作。而滦州煤矿的一些股东,也因为公司亏损、无利可图,赞成与开平合作。

面对着重重困难,周学熙还是咬牙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准备与开平煤矿斗争到底。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滦州煤矿的股东们惟恐因为革命失掉自己的既得利益,纷纷主张向开平煤矿投降,企图靠外国势力保住自己的利益。周学熙势孤力单,最后只得痛苦地接受了与开平煤矿合作的谈判。当股东们一致推举他担任合并后成立的开滦矿务局总局督办时,周学熙坚决地推辞了。收回开平煤矿是周学熙的心愿,但在他的有生之年却未能实现。1948年,唐山解放,开滦矿务局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周学熙却已于此前一年逝世了。

创办“北洋银元局”,督办天津官银号

1901年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于八国联军的疯狂掠夺,天津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大批的银钱都被抢走,所以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制造货币、整顿金融。这不仅与整个经济界有关,也关系到能否巩固袁世凯的政治地位。袁世凯将周学熙调到天津,委派他为北洋银元局总办,要他尽快建成造币厂,铸出铜元。

周学熙四处勘察,利用一座寺庙的废墟,修建厂房,招募工匠,改造机器,亲自设计铜元的式

样,仅仅用了73天,就建成了造币厂,铸出铜元150万枚。袁世凯最为担心的财政问题被周学熙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圆满解决,对他大为赞赏。到1907年3月,天津银元局各造币厂共铸银元571万多元。由于铜元式样新颖,便于携带,人们都乐于使用,因此北洋铜元的流通区域不断扩大。既满足了市场流通的需要,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同时也打击了帝国主义、投机奸商和贪官污吏。

1902年,为了维持银根奇紧的天津金融,袁世凯在天津建立了一个官办金融机构——天津官银号(初为平市官银号),发行铸币、管制金融市场,并且准备以此为基础,联合绅商合股开设“天津银行”。筹措资本时,袁世凯试图官方不出钱,只用商人们的钱开办银行,自己从中渔利,结果绅商们都借故退出。袁世凯转而求助外国银行,也遭到拒绝。这时,周学熙提出天津官银号添设储蓄业务和商务柜,经营官民的存款业务,吸收社会游资,扩充官银号的资本,同时商务柜开办经营工商业的贷款、贴现和汇兑业务,并且发行银钱票。袁世凯遂任命周学熙为官银号督办。

他首先在人事制度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定人员,明职责,待遇与资格挂钩,形成了一个自下而上层层负责的责任网,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还编订了官银号各项规则八十条。例如在办公时,以公事为主,不准闲谈。即使休息时,也不许高谈阔论,干扰他人行事。

为了确保金融业务的正常进行,改组后的官银号还规定每年“官本所得息银,除准允督宪提用外,其余一切官本、护本、公债及各项存款,无论何次公用,永不能提支”。另外,无论是公司、局、所还是商号前来借款,必须先查明有无偿还能力,如果没有确切的偿还保障,概不出借。这条规定十分重要,它禁止了军政各方的硬性摊派和人情贷款,使银号避免了大量的呆账。

经过周学熙的改组,官银号扩大了营业范围,增加了营业项目,活跃了市面金融的周转流通,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促进了直隶工商业的发展,成为直隶全省重要的金融枢纽。袁世凯对周学熙格外嘉许,把北洋政府的行钞、铸币、财政、金融大权统统交给他掌管,周学熙成了真正的“财神爷”。

创办“京师自来水公司”，为京城百姓谋福利

清朝末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人口增多，北京城里的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越来越成为问题，特别是每年春秋两季，气候干燥，常常发生火灾，因为没有水救火而损失巨大。北京地下水因含矿物质较多，历代井水苦咸，水垢较多，不宜工业用水，也不宜食用。有识之士和工商业者多次奏请清廷设“京师自来水厂”，清政府也考虑过几次，但因为北京缺少资金，更无合适的经办人而始终未建成。1908年由袁世凯推荐让周学熙办理京师自来水事务。

他立即挑选肯实干、又有真才实学的人，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他们勘察水源，设计水厂，丈量水管线路，仅用一个多月，就完成了这项庞大工程的设计工作。招集商股的时候，为维护民族工业的利益，章程规定只招华股，不招洋股。由于这是一件同人民生计息息相关的大好事，又可为工商业发展提供用水的便利，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支持，招股进展顺利，工程很快施工。

当时国内还没有生产自来水器材的厂家，所有的设备材料都要进口。尤其是水塔建筑，连式样都要向洋商定制。周学熙采取向洋商招标的办法，天津、上海的几十家洋行争着要做这笔大买卖。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周学熙，有的买通了当朝权贵，以势压人；有的试图行贿收买经办人。周学熙对这些洋商洋行进行反复的考察和比较后，与德国商人开办的瑞记洋行签订了购置设备、承包工程的合同。然而，瑞记洋行在合同签订之后，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又在工程预算中做

手脚，企图提高工程费用。没想到周学熙对于整个工程的各个环节，甚至一些具体的技术性问题，都掌握得清清楚楚，每次都以精确的数字和准确的市场行情把德方驳得哑口无言。由于周学熙的精打细算，工程的实际费用比预算大为减少。

在施工期间，朝廷又发生变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养病”，自来水公司的工期也一推再推。尽管如此，经过22个月的精心筹划和施工，1910年2月，京师自来水工程终于全部竣工了。其施工速度之快、工程效率之高、花费之节省，在当时都是绝无仅有的。该工程开北京市水建工程之先河，孙河、东直门两座水厂和城内由干管、支管、终端水管组成的供水网络，构成了北京市供水方面的初步格局。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项工程一直在北京市区用水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在周学熙的实业生涯中，京师自来水公司也有着不同于其他事业的意义，这是最直接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一项工程。

两任财政总长多建树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组成了第一届



京师自来水公司

以唐绍仪为总理的“混合内阁”，醉心于议会制的唐内阁处处要行使议会的权利，最终被袁世凯解散。第二次组阁时，周学熙被补员成了财政总长。但此时的周学熙已目睹了前届内阁的短命，目睹了内阁大员走马灯似地更换，更目睹了频仍不断的内乱和外患。1912年7月他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就职。

对于袁世凯政府来说，财政困难是他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由于战乱而导致的百业凋零，加之国库空虚，外部帝国主义列强逼债又紧，国家经济已陷入绝境。周学熙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一上任他就像一架机器一样迅速地运转起来。他用不到10天时间，就向国会提交了《财政政见书》，以其20多年的为官经验，详细论述了当前国家财政危机的根源和解决的方略。同年11月、12月又撰写发布了《财政方针说明书》、《财政计划说帖》。这三个文件总括表明了他对国家财政发展的施政方针。论述之详细、涉及问题之广泛、恢复计划之宏大完备都是前所未有的。

为使国库充裕，他大胆地进行了税制改革。他首先指出当时税制紊乱的三点原因：一是穷者纳税繁重，二是富者不纳税。即一部分享有特权的巨绅富士独免纳税的义务。他认为上述两点很不平等，因此应实行平等纳税的原则。三是地方截留税收。他采取了集主要税源统归中央的办法，把大部财权收归国家。建立新的财政管理体制，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区分国家税和地方税。为落实中央与地方依标准分权收税的规定，提出在各省设国税厅，分属财政部，以综理国家税收。随着中央权威的增强，民国二年国库收入增多了。他解决财政问题的很多办法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为各届民国政府所采用。例如他曾带领财政部的部员们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编制出全国预算分表47册，在此基础上造出民国二年的年度出入总预算。自此以后，民国财政部开始了每年的预算表册的编制。

“实业救国”是周学熙一生的信念和追求。在改革税制的同时，他以“振兴实业”作为治本之策，因此当国家税收问题刚有起色时，他立即着手保护工商产业。他从国家预算的九亿元中划拨一亿元作为资助十种新兴事业的专款。他确信

如果这些计划能够实行，中国富强就会大有希望，但因政局突变，振兴实业的措施未能实行。在财政总长的第一任上，他还建立了中国银行，发行新货币，使全国流通货币得以统一。

1915年3月至1916年4月，在袁世凯的强拉硬派下周学熙第二次出任财政总长。为了继续落实前任时的主张，首先他大力整顿田赋：令各县划分地界，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和收成评出等级，按亩数分类编号造册，送交各县。各县按册载互相抽查，报省财政厅。财政厅造简明清册，送部核办。各省征收田赋一律按亩计算，放弃谷粮而改折收银元。结果民国五年田赋收入又增。其次，整顿盐务，执行第一任财政总长时制订的盐务稽核制度。对如期完成盐务改革的官厅给予奖励，对因循贻误玩忽职守者坚决撤职查办。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很快就取得了成果，民国五年的盐税收入大幅上升。他还实行烟酒公卖，开辟新税源。通过上述措施，使风雨飘摇的袁世凯政权在财政方面取得了暂时的相对稳定。

就在周学熙埋头于财政部工作的时候，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在爱国风潮日盛的日子里，周学熙度日如年，他请求辞去财政总长职务。袁世凯不许可，他就请长期病假，袁不得已，只好准他到北海“养病”，把他放在眼皮底下，便于监视。因为袁世凯怕他与反对帝制的人联络，更怕这个性情耿直的人公开反对帝制。直到袁世凯死后，他才恢复自由。

综观周学熙的实业界生涯，他为救国救民，以亦官亦商身份，兴办北洋实业数十年，创办的大型工业企业开创了华北地区工业近代化的新局面。到了晚年，随着北洋政府的垮台，他经营的实业或被四大家族吞并，或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这使他对实业救国绝念，最后笃信佛教，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作为政治家、实业家，他曾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竭力为挽救国家危亡，特别是濒临崩溃的国家财政进行过努力。但由于身处那个时代的局限，他无力承担救国救民的重任，更不能改变袁世凯所推行的独裁、卖国的统治。相反，由于形势所迫，他参与了“善后大借款”等饮鸩止渴、出卖国家利权的行为，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责任编辑 赵友慈）

什么是封建主义

● 余广人

“封建主义”本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便是封建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定义的阐释,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理解不同,学术界对中国是否存在封建主义社会,中国何时进入封建主义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的差别等问题一直存在分歧。“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汉封建说”等诸种说法,在学界的争论直至今天也没有停息过。本文的目的不是着眼于诸种观点的争论,而是个人试着从意识形态层面上阐释“封建主义”的主要特征,说明封建主义的主要思想内核。

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

不管学者对封建社会形态在中国开始的时间有多大的分歧,但对这种社会形态特征的描述

则是一致的,即这是一种等级制社会,是一种制度层面维护等级制,意识观念层面论证并确保等级制的社会。

从西周确立宗法制,实行分封制时,中国步入封建社会形态。周代实行宗法制、分封制,建立了社会性的等级制度,并形成了维系这种等级制度的思想观念——周礼。秦汉以后,作为社会的价值体系的核心等级制承接西周并进一步加强。

首先,秦始皇扫灭群雄,一统天下,建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汉代董仲舒更以“天人感应”学说赋予了皇权某种神意品格;“天子”作为皇帝的民间称呼的流行,从此确立了以“皇权”为最高权威的等级制,形成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等级制锁链。贾元春省亲,祖母、父母与之相见;“未叙家人之情,先行君臣之礼”——《红楼梦》这一场景便是生动的缩影。

第二,井田制被土地私有所取代,小农经济成为秦汉以后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形态。其生命的余脉,直至今天也没有销声匿迹。小农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使大多数人因拥有一小块土地而获得了对他人、对官府相对的自由,另一方面又无时无刻不在强化着社会等级秩序。

第三,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皇帝“执长策以御天下”,中央集权制下各级社会结构层层节制,使各级官僚具有维护的义



森严的紫禁城

务而权利则寥寥无几,等级制度贯穿于社会各级结构单元之中。

第四,隋唐以来的科举制代替了世袭制,为出身苦寒人士进入上层等级提供了方便之门,但也使等级的规则更为完备。

第五,从思想观念层面讲,秦汉以后尤其是唐代以礼入律以后,礼法入律;“礼”变为“理”,变为“天理”,作为调整全体社会成员关系的最高规范的三纲六纪确立下来,并被誉为是与天、地俱来的,先于天、地而存在的“天理”。因此,在漫长的封建主义统治中,以三纲六纪为核心的统治,基本上只有上对下、尊对卑、长对少的专制,只有下对上、卑对尊、少对长的绝对服从;“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而这种思想层面的观念,则构成了封建主义最核心的内核。

这种完备的森然的等级制度,构成了“封建主义”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专制主义。

专制主义的内核

作为封建主义特征的专制主义,其内核是思想层面上的所谓礼制。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中,居核心地位的是“礼”和“仁”。“礼”指《周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制度,即西周初期制定的一套十分详细的维护奴隶主贵族阶级利益、标志血缘关系、等级名分的礼仪规范和典章制度,具有强制性,成为维护等级社会秩序的工具。“礼”将社会中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从属关系,通过不同的礼仪形式规定下来,任何人不能随意僭越。礼制被封建统治阶级作为一种政治秩序、社会治理形式,从奴隶主贵族阶级那里承继下来。

“仁”指爱人,以“孝”、“悌”、“忠”、“恕”为主要内容。“仁”是为“礼”服务的。“礼”和“仁”的学说就是要严等级,重秩序,要百姓服从,以宗法作为维系社会的手段,用来巩固君主专制的社会。“礼治”讲的就是“人治”。“为政在人”。而“人治”必然表现为基本上不受监督制约的专制。皇帝是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就是皇帝的家,治理国家基本上是封建统治者的意

识观念,虽然有所谓制约部门,但对皇帝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的效果。

对于皇帝来说,维护自己的统治,防止王权削弱,强化和维持封建等级制是治理臣民、使臣民畏伏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君臣各有定分、上下皆有级别”的等级官制体现着高下、尊卑的统属、节制关系。按等级制组建的封建官僚体制,是用权力统治财产和一切社会资源的形态反映,整个社会权力结构是建立在一层对一层任命的链形体系中的,各级官吏的产生、官吏的仕途是由上边决定的,所以官吏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这个官僚群体逐层向上对皇帝负责,形成个人至上的人治体制,权力带着极大的个人色彩。封建专制造成权力私有化,集权专制为腐败打下了制度基础。权力的滥用既是王权的象征,又是腐败的体现。腐败是集权专制的伴生物。腐败的制度孕育出腐败的行为,制造出腐败的官吏。权力的私有化,使各级官吏在专制权力制度下,成为某一部门、某一地方的权力垄断者,使该部门或该地方成为他的权力的势力范围,成为他得以行使腐败行为的权力圈。权力的价值就在于能凭它榨取、掠夺社会财富。官府、官吏上下勾结贪污受贿、奢侈腐化成风,铺张浪费、习尚浮华成为时尚。

专制引发的恶果是整个制度的腐朽。官员的选拔虽有科举制度在装门面,但大量的行贿、走门路买官的事层出不穷,像捐纳——买官的方式,只要有钱,无官的可以做官,有官的可以升级,革职的可以复职,只要虚衔不想干实差的也可以穿着品官服饰。官职成了特殊的商品,金钱政治使得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朝廷虽设有监察御史之类的监督官员,其所上奏的呈文多被搁置一边,不少监察御史反因弹劾之事被罢官或下狱。官官相护,层层贪污,处处敛财,犬马声色,无所不为。封建集权专制下的官吏,将自己的官位、权力看作是分割到手的势力领地。利用自己手中垄断的权力,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吏治腐败摇撼了封建王朝的大厦,封建统治者便愈发强化君主专制,加强思想控制、镇压。控制和镇压使社会矛盾日益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爆炸性突变,这种突变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呈周期性的延续。

小农经济 迷信的温床

“小农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它是对中国秦汉以后社会普遍存在的小规模、封闭式、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结构的一种概括。“小农经济”结构单元的形态特征,使人们必然是一方面对一切超乎自身的外在力量深感无奈与敬畏,另一方面则强烈地渴望社会认同,渴望从社会认同中找寻到精神的归宿与现实生活的相互救助。前者主要表现为迷信,首先是对专制皇权的迷信,其次是对各式各样神祇的迷信。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家族观念,表现为对宗法制的服膺,从而不断强化着中国封建主义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等级观念。

迷信观念是不自由的一种表现形态。如前所言,封建社会是一种等级森然的社会。迷信观念是封建主义社会思想观念层面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封建主义的一大特征。

西欧的中世纪是基督教的世纪。在西欧封建主义社会中,基督教是全民性的宗教,全社会陷入了对基督教的迷狂,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世俗必须服从宗教,王权要由教会加冕,异端学说无立锥之地(令人恐怖的异端裁判所,伽利略被处火刑便是明证)。但是,由于西欧中世纪是基督教一统天下,人们迷信观念虽深但崇拜对象却相对单一,而中国封建主义社会则要复杂得多。

首先,在原始社会后期形成的对祖先的崇拜不仅一直没有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反而在宗法制、礼教等作用不断被强化。崇拜祖先,祈求祖先荫庇是中国封建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思想观念。其次,“天”作为一种最高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一直主宰着中国古代人们的心灵。董仲舒以“天人感应”学说改造儒学后,儒学虽说不上是一种宗教,但却成为具有某种神学的品格深入人心的学说。董仲舒所谓的“天人感应”,说到底还是在为对皇帝的极权崇拜摇旗呐喊,皇权成为人们迷信的对象。第三,农业经济尤其是小农经济下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一切可能影响人们生存的东西都成为神祇,土地神、谷神、河神到处存在,民间信念多而杂。第四,佛教传入中国后虽未成为中国封建主义社会全民性的宗教但逐渐中国

化,尤其是经一大批佛教徒以中国的方式宣扬、普及佛教之后,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封建迷信观念的理论依据和重要组成部分。第五,佛教的传入刺激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发展,并衍生出许多“邪教”,它们以民间为基地有组织地发展自己,更加剧了中国迷信观念的流行。因此,中国封建主义社会虽然没有出现过西欧那种全民性的宗教,没有那种全民性的宗教迷狂,但迷信观念一样十分浓厚,而且信仰更为复杂,用毛泽东的话说:“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及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组成的“神权”与政权、族权、夫权一起成为“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家族观念,表现为对宗法制的服膺。由宗法制衍生而来的等级制是调整全体家族成员关系的根本行为规范。在家族制度中,家族成员可以得到家族的认同,困难时可以享受其他家族成员的救助,但这有个前提,那就是他必须承认并服从家族制度,严格按家族制度中的长幼尊卑等级办事。家族制就这样通过日常生活时刻强化着其成员的等级观念。它是一种浓缩了专制主义等级制度、等级观念的社会组织机构,因而它是专制主义等级制权力机构在县、乡以下的延伸、拓展,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根须。西欧封建主义社会存在公社、自治城市这类社会自治机构,它们的自治是游离于等级制之外的真正的自治,正是它们侵蚀了西欧封建主义社会的肌体,并导致西欧封建社会的消亡和解体。而中国的宗法制则不同,它与其他社会组织结构是同质的,都是等级制的产物。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它的自治不仅不能侵蚀封建主义社会的肌体,反而成为封建主义社会的根须,使其生命力更旺盛。正因为家族与其他社会结构同质构造,共同撑起了中国封建主义社会大厦,有学者就将中国的封建主义社会归纳为一种与“中世纪欧洲和日本的领主封建制以及印度种姓制均相出入的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社会”。

迷信观念的盛行,使皇帝如同一尊神,各级官吏如同父母,人们只有顶礼膜拜和服从没有非议的权力。由迷信而产生的奴性因而也大行其

道。而宗法制的强盛，则使人们既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机遇，也有“株连九族”的厄运。

反对封建主义，反什么？

《炎黄春秋》曾发表李维汉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倡议反封建的高论，读来很令人感慨和深思。在那时候，我们已经立国三十多年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已经确立三十多年了，为什么这位革命老前辈还要发出令人感到很迫切的倡议？这是因为我们反封建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为什么远远没有完成？是因为我们在反对封建主义的问题上曾存在比较模糊的认识，走了一段弯路。

据有的学者研究，社会文明由三个层面的“同心圆”构成：最外层是器物文明层，中间是制度文明层，内核是价值体系即思想观念层面，最内层是该社会个性赖以生存的依据。把这种观点移到对社会形态层的研究，也是相通的。无论是社会文明，还是社会形态，生命力最顽强的是其内核——价值体系即思想观念层面。改变器物比较容易，改变制度较难，而破除思想观念则更难，而后二者的完成，才可以说得上是对一种制度的真正的颠覆。反对封建主义，不仅要从制度、政权上消灭它，最关键的是要从思想观念上消灭它。只有从思想观念上彻底消除封建主义的影响，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才大功告成。

1949年，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宣告了封建主义制度的消亡。按照毛泽东的思想“革命的主要问题是政权问题”；“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曾将封建主义社会制度的消灭等同于反封建主义历史任务的完成。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宣布“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并认为今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从此以后我们一直将资本主义作为我们



算卦 沿袭至今的封建恶俗

主要的反对对象，而基本中断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观念，使我们难以清醒地认识到，封建主义制度的消灭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破除封建主义思想观念，肃清封建主义思想观念的影响才是反对封建主义斗争中最艰巨、最重要的工作。所以，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李维汉才重提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

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两种斗争中轻重错位，对在中国生存了几千年拥有广泛社会根基的封建主义思想观念清算不力，对破除封建主义思想观念的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够，这是新中国50年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主要失误之一。可喜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李维汉认识到了，邓小平给予高度的重视了。如今，我们更认识到其紧迫性。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首次肯定“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存在，并将其置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之前，从而第一次摆正了反对封建主义与反对资本主义的位置，为今后的反对封建主义斗争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参见游翔、叶剑锋的《封建主义的中国特征与新中国的反封建斗争》）。

不过，认识到反对封建主义的紧迫性固然可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一蹴而就。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今天，二十多年又过去了。时不我待，路途依然遥远，重任依然在肩。

（责任编辑 吴 思）

法治 建国路上的两难选择

● 石碧波

一方面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法治似乎在资本主义那里

一个以马列主义为信仰、指导、目标的政党，其践行的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必然接着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个政党的纲领，即马列主义的目标最终是解放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而在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就不可能再迂回出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阶段，何况还有了俄国革命成功的榜样，走俄国人的路，就是当然的选择。

毛泽东早在 1940 年《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把中国革命区分为两个阶段：“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过程。”并根据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认为：“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多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然而，在当时的认识条件下，社会主义只要人民当家作主，工农掌权、工人阶级管理一切就够了。仿佛社会主义管理国家的原则只有“民主集中制”，而与“法治”无关。

从实践上说，政治上、外交上的“一边倒”，也给法治国家的建设带来了茫然。

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实际，使得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一边倒”的战略选择，即倒向苏联社会主义。“一边倒”既是中国革命历史



1954 年，毛泽东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的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国道路上的政治、外交的大抉择。

但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是容易的，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却是迷茫的。此时的苏联虽然从立法、行政、司法都取得了一定成功，但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还远不成熟和完备。单就立法上说，苏联的《宪法》以至《民法典》都贯彻了社会主义原则，强调国家利益，保护公有财产胜于私有财产。把一切法律都视为公法，不承认私法。强调的都是公权力的建设，而不是制约公权力，忽视、排斥私权利的建设。法律成为国家统治、管理人民的工具，而非相反。法律在此既不能体现资本主义形式的法治，也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实质的法治。苏联榜样尚且如此，刚入社会主义门的中国共产党的法治建设问题是可想而知的。

一方面废除了国民党的一切旧法，一方面又不能迅速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法

新中国成立后，当即宣布废除了国民党政权制定的一切法律法规，着手颁布自己的新法律。颁布的主要法律依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首先为国家机构建立了法律的框架。

但是，立法还十分不够。立法除了要面对国家机关外，还要面对活生生的五亿人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民间生活。这一时期的司法立法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就是刑法、刑诉法这样的一个国家要维持秩序所必备的法律也未能制定出来。可生活却是不以法律的制定与否为转移的。那么，生活中的矛盾以及违法犯罪靠什么来调整，中国共产党又习惯地依靠了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不去尽快领导制定、完善法律体系，其原因恐怕与其说是个时间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认识问题，即缺乏法治观念。看看当时马列经典作家以及社会主义教科书，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解释，几乎都没有法治这回事。

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赫鲁晓夫揭露出斯大林草菅人命、残酷杀害革命同志的问题后，在全世界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政治浪潮。毛泽东开始从政治制度上对斯大林现象进行反思。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回忆说：“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最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

那么，毛泽东当时到底想出了什么样的能够避免斯大林问题的路子呢？毛泽东当时曾讲过这样的话，说斯大林如此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385页）

然而，反思归反思，疑虑归疑虑。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时，毛泽东结合“波匈事件”大谈党内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并深有感慨地说：“我看还是列宁说得好。有人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于是，不仅有“反右”运动，而且跟着有了“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这样践踏法治的政治运动。

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开始，在党内，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都遭到严重破坏。法律本来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则由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来制定的。但此时党已完全不采用这种法定程序来推行自己的政策或主张，而是取而代之，包办一切。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1963年冬到1964年春进行的“四清”运动等如此全国范围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或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出的决议，都根本未经最高权力机关的批准、法定，也未经国务院通过，就作为全国的意志在全国执行。

1957年7月，中共中央做出了规定，地方司法机关向地方党委负责。1957年8月，铁路与水上运输法院被撤销。1959年司法部、监察部被撤

销。196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合署办公,由公安部党组统一领导,严重削弱了司法体制。这个时期党确定的政法工作路线是“服从党委领导,依靠人民群众,参加生产劳动,为全党全国中心工作服务”。这在客观上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司法机关的地位,直接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的进一步蔓延。

须知,法院是司法机关,检察院是监督司法的机关,公安则是政府的行政部门。法、检服从公安部党组,不仅不符合法治原则,而且直接违反了1954年《宪法》。《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司法独立原则,被批判为“右派分子借口审判独立,反对党的领导,以法抗党”。把强调依法办事和司法独立说成是“法律至上”的资产阶级观点,是“不要党的政策,搞法律独立主义”。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批判为“替坏人说话,敌我不分,为阶级敌人开脱、掩护”。

如前所述,在以党代议、以党代政的同时,自然也就以党的政策代替了国家的法律。道理非常简单,党的会议出来的只能是政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出来的才是法律,才有合法性。党习惯于发动群众运动,党的政策则是运动的行动指南。而这每一次运动的直接结果,只能是使人们更加重政策、轻法律,从而也就直接造成了对法律的削弱和破坏。

在实践中,“运动”中的党的政策自不必说,就是在国民经济管理中,也往往直接以政策代法律。1958年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召开的有少数中央领导和部分省市的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作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和《关于把小型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次工作会议并不具备决定党和国家重大事项的资格,但就是这样一个在党的一般工作会议上形成的决议,便可作为全党全国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贯彻执行。

这些党的政策本来可以通过全国人大或国务院的程序,转化为国家的法律法规,使党的决议、政策具有合法性,但党不习惯于这样仿佛在“背后”做工作,于是,其政策便从背后直接跑到前台,抢了法律的位置。

然而,事情的另一面却是党的领导人又在呼

唤法治。早在1956年6月,周恩来在向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传达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时就指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为劳动人民做了些有利的事,人民容易信任他,集权比较容易。因为集权比较容易,所以,专政也就有它的阴暗的一面,就是缺乏民主。要时常警惕这方面的缺点。

“两难”的结果是:人治风行,法治暗淡

新中国开国之初,“法治”一词在国家文件中曾不断被使用,而且,也为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所重视。周恩来在1950年11月签署的《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的指示》中说:“应广泛进行法治的宣传教育工作。”谢觉哉则强调说:“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法治,但我们却要我们的法治。”并认为:“民主和法制,对于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或是衰败灭亡,往往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起决定性因素的。”

基于党内高层这样的认识,党的“八大”把“法制”提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上,指出:“我们当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应当说,这是新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好的开局。但是,习惯了靠会议、政策、社论指挥、指导全党、全军、乃至全国工作的毛泽东、刘少奇等主要领导人,似乎感到了法律的繁琐与束缚,于是,干脆直截了当地在当时提出了“要人治,不要法治”。

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说:“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刘少奇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毛泽东后来还说:“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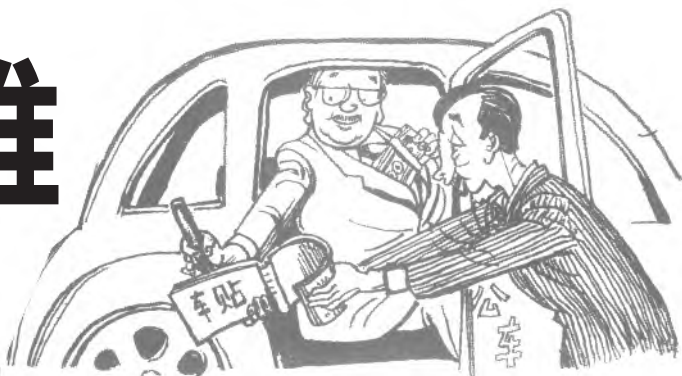
至此,法治被彻底抛在了一边,或者只剩下“专政”工具的职能了。(责任编辑 萧 徐)

超前思维

精神现象零拾之十一

陈四益 文 丁 聪 画

小丁 03.12.



先有事实,后有概念。这不错。思想总是存在的反映。没有桌子,就不会有桌子的概念。但是,已经有了桌子,要把它做得更实用、更美观、更经济,没有超前的思维是做不成的。

改革也像做桌子,想要做得好些,思维也要超前。我所说的超前,并不如学问家讲的那样玄乎。说白点,就是事情要想在前头,考虑越周密、越细致越好,不要事先大而化之,及至出了问题,付出了代价,再轻轻巧巧说一句:“就算付点学费吧。”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开初是不免的,但改革已经二十多年了,石头虽不免还要摸,至少有许多事情是不用摸石头也该知道深浅的了。

许多地方正在实行公车改革。办法多种多样,大致的思路是取消公车,改为对享用公车的人发放现金补贴。此事早有所议,后来好像因为意见不一,拖了下来。现在又试行了,想必意见大致已经趋同。

当初,这当初也不过五十年来,坐汽车(当然不是公交车)是一种了不得的待遇,地方上一个司局级就算一路诸侯,有车可坐;“京官”中司局级干部就轮不上了。调到北京,一样坐公共、骑单车。所以牢骚道:“工作越多,工资越拿越少,车子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出无车,牢骚自然不免,但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底子穷,没有那样多汽车,也是实情。所以牢骚归牢骚,干活归干活,就这样二十多年没有太大变化。国家用在公车上的花费,因为数量不多,似乎也还不是太大的负担。

近二十多年不同了。家底厚了,票子多了,你攀我比,买车也越来越阔绰。国家多方限制,又是卡指标,又是设“控办”,又是定标准,孙猴子仍旧可以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可见控制的法力很有限。司局级的单位不说了,就是一些处级单位,公车也不止一辆两辆,再穷的乡镇,没有汽车的大约也不多了。有了公车,就要有司机,于是不

但要养车,而且要养人,车辆越多,专职司机也就越多。一个大些的单位,动辄一个车队,还要设置车管处。养一辆车,增一个司机,加一个机构,一年要多少费用,谁都算得出来。公车数量大膨胀,单此一项,要开销多少国帑?何况这种公车制度,天然具有无限扩张的需求,就像官僚机构也天然具有无限扩张的需求一样,不从根本上改革,国家不胜负担。

改革公车制度势在必行。但在普通百姓都自己掏钱买车的时候,官员们为什么一定要享受补贴——听说数量还不小——实在也是讲不通的。不是按级别,工资已经拉开差距了么?或许,这是为了减少些改革的阻力吧,姑置勿论。不过有些事情还是要想在前头。

一是闲下来的公车如何处理?虽然不是没有原则性的意见,但操作起来,恐怕又是有“办法”的人三文不值两文地买了去,发一笔不大不小的“改革财”。

二是公车未必全能取消。只要留下一些,就有人补贴照拿,公车照坐,上行下效,过一段时间,又要治理,就像机构改革精简了人马,过一段时间,或以增设机构为名,或以临时借调为名,又重新膨胀一样。

三是公车取消,手中有权,自有人乘“轿”“进贡”,送车上门,就像过去送红包、送房子、送装修、送古董、送干股、送金卡、送会员证、送子女出国一样。明着不行就暗送,名目可以是借用、租用、试用、中奖或其他种种,好在汉语中词汇丰富,可以随意选用。于是,公车改革,又多出一条腐败的渠道。闹到人言啧啧,再来整顿,已输后手。

在一项改革方案出台的时候,制定防范借改革攫取国帑、牟取私利的方案,恐怕是同样重要的。察之既往,教训不少。公车改革,据说已有规定,但是否已经足以制止这类事情的发生,尚可研究。诗曰:

一山过后一山拦,改革也如过翠峦。
绝顶风光收眼底,途中处处有蛇蟠。

学而优则贾

——访中华儒商第一家

● 续志先

2003年8月中旬,我有幸参观了距太原百余里路程的榆次县“常家庄园”。回京几个月了,那集祖国南北风格大成的建筑艺术,那无处不在的典雅浓郁的儒商文化氛围,在我脑海中,留下了再也抹不去的记忆,促使我近日提起了笔。

过去经常听人说:“山西人善于经营,善于理财”,我从不以为然。因改革开放20多年来,山西经济发展滞后,也未曾听说山西有冒尖的企业家。但两年前参观了祁县的“乔家大院”,以后又参观了“平遥古城”和“常家庄园”后,我才认知历史上山西商人,确实精明干练,具有远见卓识,还真有一股闯劲!

据考察,山西商业资本,远在宋代已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一支中坚力量。到明代,其资本的积累,已相当可观。当时蒙古草原和松辽平原就成为晋商贩运贸易的新市场。晋商除普及内地的商业贸易外,他们还开辟了国外市场,俄国的莫斯科、彼得堡以及欧洲的其它地方。山西商人经商地区之广、人数之多,当时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在清代,兴旺发达二百年左右的晋商世家,就有榆次县常家,祁县乔家、渠家,太谷县曹家,还有平遥县众多富商巨贾。

在众多的晋商中,有一支数百年长盛不衰、堪称中国外贸第一家的名门望族,又是晋商中第一儒商的,就是榆次县车辋村的常氏家族。常氏始祖常仲林在明朝弘治年间从外地迁来车辋村时,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给刘姓大户牧羊。经过辛勤劳动,第三代才有了立足之地,建了自己的小小院落。常氏从第六代起开始经商,明朝末年,晋



常家家训

商已形成一定气候,常家也跻身小康。到第八代常威时,常氏商务活动开始走向兴隆。常威20岁起,只身徒步张家口经商,虽带有川资,但他坚持不用,沿途以算卦所得解决食宿。经过十年艰苦积累,由背着搭褡的“行商”发展成为拥有自家铺面的“坐商”,为后代的全面振兴打下了基础。清康熙年间,他们以河北省张家口为基地,发展到汉口、成都等地,创立了以经营布匹为主的十个“德”字号的商店,成为众商皆知的商界精英。乾隆年间,即18世纪中叶,蒙古与俄国对中国茶叶的需求日益增加,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开辟为固定的通商要津,敢为天下先的常万达(常威的第三个儿子),以超常的胆识,将目光投向这块荒凉的土地,开始踏上了万里茶路。常氏在福建省武夷山购得茶山经营,雇人采摘加工后,经陆路、水运、骆驼队运抵蒙古和俄国恰克图进行交易,行程达七千余里。以后又延伸至莫斯科,再远触欧洲,全程一万多里。据说常家当时加工茶叶的员工

就多达千余人。常家最兴旺时,国内、外商号扩展到大、小近百余家。在万里茶路上,从常万达到他的儿孙艰苦创业,坚忍不拔,从乾隆到清朝最后一个小皇帝宣统,历经七帝,长盛不衰。据资料记载,当时中俄贸易额中,茶叶占了94%,内中常氏一家竟占40%。他们既为国家开拓对外贸易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为常氏家族创造了巨额财富。

明末至清,是晋商走上辉煌的时期,由于他们积累了雄厚的资金,于是纷纷回到原籍盖房建院,且有相互攀比

之势。山西祁县晋商的“乔家大院”，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先修复的旅游点。那围在城堡式的高墙内，有各种雕刻和彩绘的300间青砖瓦房。张艺谋就选择在那里拍摄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电影。比起乔家大院来，榆次县的“常家庄园”，更是气势雄伟，别出一格，令万人瞩目。常家庄园占地60万平方米，屋舍4000间，楼房50余座，园林13处。其规模之大，构思的精巧，文化的厚重，雕饰的精微，人说可和明清皇家园林媲美。当时的常家庄园，有史家称是一座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的艺术殿堂。

可惜的是，这座经过常家几代人营造，集全国名匠智慧的庄园，由于政局的演变和连年战乱，尤其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近百年来，一天天走向消亡。这些晋商精美的宅院和园林多数荒废甚至人为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旅游业的兴起，山西省政府开始陆续拨款恢复修建晋商豪宅。2000年，准备复修常家庄园时，始知诺大的庄园，除了“山西荣军学校”购用的部分建筑保存较好外，所剩已经无几了。为了修复后庄园尽量保持原有风貌，不惜聘请能工巧匠，历经两年多时间完工后始对外开放。复修的总面积15万平方米。其中宅院4万平方米，园林8万平方米，走廊等附属设备3万平方米。其中主要建筑有：1山、1阁、2轩、4园、6水、9堂、8帖、13亭、23廊、27宅院。复修后的常家庄园面积虽只有原规模的四分之一，但原先的风貌还是大体上保存下来了！我们逛了以后，觉得这修复的庄园仍很豪华，其规模、其构思、其品位，比起北京清王朝留下的王公贵族的府第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天和我一起参观这庄园的还有北京众多学者。大家都注意到这个“常家庄园”不同于其他晋商豪宅的，是具有更浓郁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除建筑物的本身结构宏伟高雅，建筑物的木雕、砖雕、石雕及影壁、走廊、花墙及彩绘等几乎无一不精外，最突出的是那批汇集了历代名家书法的法帖群，令人叫绝。

过去我对“法帖”的含义不甚了解，经导游介绍，始知“法帖”是书法原作的艺术真迹的复制本，用以永久珍藏名贵的书法作品，并为后人提供学书的范本。它刻于木石上，是可以用纸拓下来的大型刻印版本。众所周知，中华书法艺术，乃世界艺术之中的奇葩，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对全人类文化所做出的独特贡献。数千年来，名家辈出，佳品充溢。车辆常氏做为清代以来著名儒商，对书法艺术自然情有独钟，他们收集的法帖共有八部，所幸这些珍贵的法帖全部保留下来，镶嵌在大院墙壁和走廊里。我先看了“清代名人名联帖”，来不及细看上面精妙的诗词和欣赏那潇洒的笔迹，只粗略地扫了一下那书法的作者，上面

有许多熟悉的名字：王文治、左宗棠、刘墉、翁同龢、林则徐、吴昌硕、曾国藩、纪晓岚、郑板桥、梁启超等，这部法帖一共包括了56位名家的墨宝，用深浮雕凸现在青石板上。它镶嵌在常家静园杏林的两侧和长廊上，高1.6米，长33米，占了11间长廊。“听雨亭法帖”，共收集了上至唐代，下至清朝中叶的共50名大书法家的作品。当今我国书法热潮中，全国书法学习班临摹的王羲之、颜真卿、欧阳询等名家的作品这儿都有。此外还有“四十四帝后帖”、“可园唐诗笔意帖”、“石芸轩帖”、“雍和堂恽寿画跋帖”等，我只记了一下法帖名称，来不及细看。

最后，我看到了“常氏遗墨帖”。这常氏几个字吸引我不自觉地停下脚步细读。这是常家学者自己的诗词作品。此时我想了许多。我原以为常氏做为富甲一方的世代商贾，才有可能凭籍巨资，将历代书圣的神妙极品广为收藏，使其宅院、园林，洋溢着诗情画意，并使其融入自己的生活环境。但当我最后看了用砖刻竖在墙上高1.8米，长33米的“常氏遗墨帖后”，才领略到常家自身也积累起了深厚的文化蕴藏了。中国素主“学而优则仕”。这常家以商致富后，自然看重子弟的教育，则重视学习。所以提出“学而优则贾”。这是他们的远见，子弟学了以后，要继续经商。这贾而学，学而贾，贾学结合，这内中是很有学问的。

从清初的常氏六、七世开始，常家就有了自己的私塾。到家业大隆的乾隆、嘉庆、道光三代，家族私塾开办到17所之多，这些私塾由全族共同承担聘师的各项开支，族中子弟就近入学。常家对教师的聘选非常慎重、严格，管理也精心、到位，所以常氏经商的精英人才，无一例外全由这全族公有的学堂中走出去。正由于学堂实行全族公有，而不是私家封闭，所以子弟们的求学氛围一直非常浓厚。到清光绪十三年，常氏学子还发起了“华诗社”，活动了13年，参加者近30人，入社之初，最长的23岁，最幼的只有14岁，其作品还汇集成册，择优选摘，印刷成精美的“华社诗集”四卷。据史料记载，常氏家族诗社，绝不是只凑在一起吟诗作对，而更多是一个文史学术团体，他们经常活动于太原关帝庙，在这样的环境中，培养出一批学有所成，乃至省内外闻名的学者。光绪二十九年，常氏又兴办了全省第一所民办新学堂，以后又继续办起两所女子学堂及全省惟一的常氏私立中学。

做为世代儒商，他们深知“兴国之之道在于用人，兴家之道在于育人”。为此他们有创见性地提出了“学而优则贾”的家训。他们对后人的要求极严，特别强调“儒学不精者，品德欠佳者，不准参加经商等社会活动。因此，其子

弟不但儒学注重功底,而且代代不乏精通书画的优秀学者。家族中进士常麟书,是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一生著书 56 部。常家还出了举人四名,参加过家族诗社的常赞春、常旭春两兄弟,同时中举。他们都是清代有名的书法家和学者。我想,即使是书香门第,一个家族中出了一名进士、四名举人的事例,在旧中国历史上也不会是很多

的。所以,常家不仅是三晋第一儒商,也堪称中国第一儒商。参观将结束时,我还看见挂在室内的一张图表,上面有现在散居在国内外常家的后代,其中有教授,工程师一二十人。我想他们处在祖国振兴的大潮中,肯定会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将自己所学,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自己的卓越贡献。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4.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3.80	4.00
胡耀邦与评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4.00
斯大林(上中下册)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	78.00	7.00
动荡岁月秘闻	温乐群等	72.00	8.00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1966-1978)	杨胜群 田松年	27.00	4.00
中共历史转折关头——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上下)	李 剑	49.80	6.00
外国人怎样评论毛泽东(全四卷)	萧延中	88.60	10.00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郭汝瑰 黄玉章	68.00	7.00
邓小平时代(上下册)	杨继绳	32.00	4.00
叶剑英非常时期	范 硕	36.00	5.00
刘少奇之路(全四卷)	胡长水 林蕴晖等	69.80	7.00
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	严 秀	12.50	3.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 们 肖思科	28.00	4.00
改革风云中的万里	张广友	20.00	4.00
航天情——永远的眷恋	彭洁清	16.00	4.00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季羨林	24.00	4.00
没有情节的故事	季羨林	25.00	4.00
枝蔓丛丛的回忆	季羨林	26.00	4.00
李锐其人	宋晓梦	28.00	4.00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凌志军 马立诚	23.80	4.00
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	凌志军	25.00	4.00
25年——1978—2002中国大陆			
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王 安	26.80	4.00
我向百姓说实话	李昌平	20.00	4.00
我向总理说实话	李昌平	23.00	4.00
影剧之王田汉—— 爱国唯美的浪漫人生	张耀杰	25.00	4.00
戏剧大师曹禺—— 呕心沥血的悲喜人生	张耀杰	20.00	4.00
白色花劫——“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大纪实	林 希	25.00	4.00
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	张 帆	25.00	4.00
中国人物年鉴	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	158.00	6.00
蒋介石评说古今人物	戎向东	29.80	4.00
十年来影响中国经济决策的论点	张国华	28.00	4.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苏共亡党十年祭》苏联和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解体?谁是苏共的掘墓人?俄国的改革与中国的改革有什么不同?本书在历史追述中回答了上述问题。由于苏联和苏共对中国和中共的巨大影响,作者的问题和答案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本书成为人们自我审视的一面镜子。

《斯大林》本书由苏联新闻社出版社 1989 年出版,作者曾任苏联国防部军事研究所所长。在洋洋上百万字、1470 页的巨著里,作者以详实的史料,勾画出一个革命者转化为独裁者的历史,考察了这个人留下的带血痕的时代。这是一个谎言、残暴、冷酷、梦想、巨大的悲剧和巨大的成就交织在一起的时代。书中充满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而这一切记录都源于扎实的可靠原始档案。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从皇帝官僚到土匪和小民,每个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利害考量,发展出独特的生存策略。本书以明清和民国历史为本,剖析了各阶层的获利模式和反抗策略,揭示出买命和卖命的逻辑,挖出了各种规则背后的终极规则。行文生动平易,读来让人后悔:我怎么没看透呢?

《中共历史转折关头——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上下两册) 本书是一本史料汇编,作者的阵容极其强大:从毛泽东、董必武到张国焘、陈公博,从张闻天到李德生和“林办”的秘书,中共十一次代表大会的风云变幻,听亲历者娓娓道来,分量和实感自是不同。书中还穿插了一些考证,例如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率等等。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炎黄春秋杂志社

本期：终审 杨继绳

执行主编 徐庆全

审校 赵友慈

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书画展在京举行



图一

200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河南、广东、天津、上海、河北、湖北、陕西、江苏等省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及炎帝陵基金会合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书画展，12月24日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举行。开幕式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文彬主持，常务副会长曲润海致词。出席的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顾问张铨秀、王定烈、胥光义、马少波、朱光及会领导黑伯理、冯征、吴塘、鲁淳等，还有著名书画家刘文西、权希军、汤文选等。本次书画展共展出来自十省市的书画作品160余幅，其中有出自萧克、李耀文、李吕、向守志等老将军、老同志及陈大章、张世简、喻继高等知名书画家之手。这次书画展寄托着对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的怀念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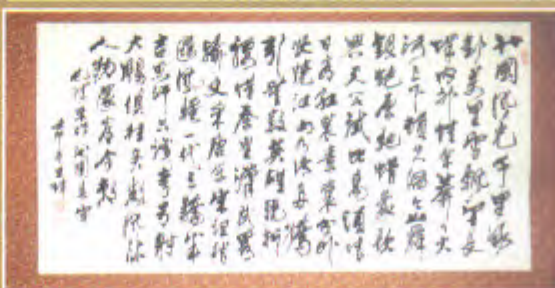
(陈思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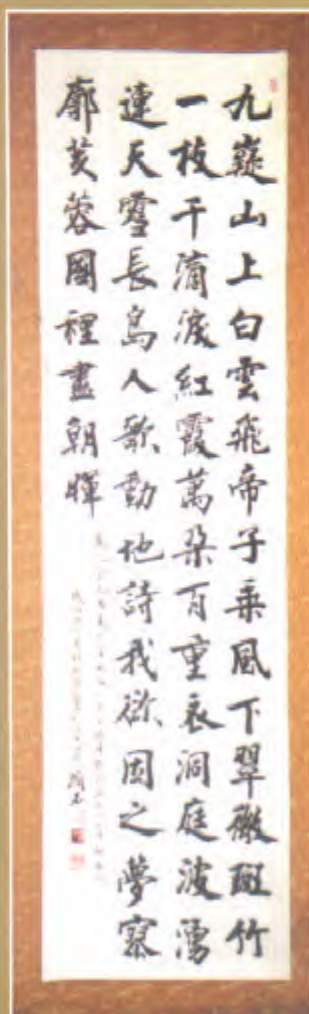
图二



图四



图三



图五

【图一】开幕式主席台

【图二】著名书画家王琦作品《沁园春·雪》

【图三】著名画家陈大章作品《万古长青》

【图四】画家燕凌作品《毛主席像》

【图五】书法家张瑞龄作品

炎黄春秋

2004/2(总第 143 期)

社长(法人代表) 杜导正

执行主编 李晨

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编 100045

电话 (010)68522852(办公室)

(010)68534879(编辑室)

(010)68532048(发行部)

传真 (010)68532569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J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版日期 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 4.80 元